



陳雲

朱佳木 迟爱萍 赵士刚 著

中国革命领导人文库
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中华名人协会主办

●中华名人丛书

陈 云

●朱佳木 迟爱萍
赵士刚 著

前 言

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杰出人物。20 世纪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民主富强新中国的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为民族兴盛、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代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为了弘扬中华名人的业绩和风范,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组织编纂了《中华名人丛书》。这套丛书以“图文并茂、篇幅精短”为特点,面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初步计划出版 100 本,每本介绍一人,文字限于 10 万字左右,照片 100 幅。首批 20 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昆仑出版社分别在 1998 年年内出版。

在这套丛书编纂过程中,得到有关方面专家、学者、出版单位和一些传记、画册原作者以及传主亲属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华名人协会

《中华名人丛书》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荣高棠 张黎群

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 新 金冲及 逢先知 姜思毅
龚育之 崔乃夫 蔡 诚

主 编：李维民

副 主 编：范传新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连儒 王 焰 冯 蕙 阮家新
刘增新 李海文 李海燕 吴殿尧
邱永生 沈学明 张 麟 张瀛丹
陈立人 范 硕 周均伦 周学之
郭可瑛 黄 瑶 萧超然 阎景堂
彭 红 谭德山

目 录

第一章	困苦童年	1
第二章	投身革命	7
第三章	地下斗争	16
第四章	红色岁月	23
第五章	特殊使命	35
第六章	延安年代	45
第七章	转战东北	61
第八章	初试锋芒	78
第九章	大展宏图	91
第十章	艰难行进	112
第十一章	逆境之中	140
第十二章	转折时刻	155
第十三章	再塑辉煌	169
第十四章	鞠躬尽瘁	194

第一章 困苦童年

1905年6月13日，陈云诞生于上海青浦练塘镇一户贫苦农家。陈云家里既无田地，又无房产。父亲陈梅堂，务农兼做手工业。母亲廖顺妹，祖籍广东，其父早年随太平军北上嘉兴，失败后在练塘成家，以修船为生；其母练塘泖东人，生有一女二男。陈云有一个姐姐，名陈星，年长他八岁。陈云两岁时，父亲病故，一家三口，全靠母亲帮人做散工及缝衣度日；四岁时，母亲因劳成疾，也离开了人世。陈云的外祖母怜惜陈云姐弟俩，把他们接过去和舅舅、舅妈一起过。陈云六岁时，外祖母病故。临终前，她叮嘱儿子廖文光，将陈云立嗣为子，并抚养好陈星。舅舅遂认陈云为养子，改陈云姓廖，名陈云。廖文光，俗名龙相，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爱好文艺，起初开了个裁缝铺，后因生意冷清，改营小酒馆，勉强维持生计。舅母是个勤快和善的妇女，但手脚均患风湿病，仅能料理家务。

陈云自幼丧父失母，过早领略了人间的悲苦。他性格内向、沉静，据幼时的伙伴回忆，常常是其他孩子在一起玩耍、嬉闹，而他则静静地站在一旁看。他从小就非常懂事，知道体恤大人的艰辛。舅母身体不好，他是舅母的小帮手，小酒馆劈柴、洗菜之类的杂物活，全由他承担。舅舅和舅妈都很喜欢他，把他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

1913年，陈云满八岁，舅舅送他进私塾，读《三字经》、《百家姓》等书，习毛笔字。九岁那年，舅舅又送他到镇上贻善初等

小学读书。他聪颖好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诚挚待人，深得同学信赖。平日下课后，他仍帮家里劈柴、烧火、担水、洗菜、打扫屋子，不仅使舅父母感到欣慰，也颇受街坊邻居夸奖。

1916年，陈云初小毕业。这时，舅母生了一个儿子，风湿病更趋严重，致使家境困难，陈云未能继续升学。次年夏，舅母病情好转，加上亲戚资助，陈云得以进青浦县立乙种商业学校读书，寄宿在县城内一中药仓库里。两个月后，资助中断，陈云被迫停学。这次在校时间虽短，但学会了珠算和记账。辍学回家后，陈云一面在家烧火、打杂，一面照顾体质孱弱的表弟。廖家小酒馆有一位常客，叫杜衡伯，是镇公立颜安国民小学的第一任校长。他见陈云总蹲在灶前烧火，便与陈云攀谈起来。杜先生发现陈云口齿伶俐，记性很好，初小学的知识对答如流，不觉引起他的注意。他向廖文光提出，要免费收陈云到颜安小学高小部继续学习。于是，陈云又有了上学的机会。

1917年秋，陈云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这所小学按照

新式学校编制和教学,除国文、算术外,还设英文、地理、体育等课,并聘请了一些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老师来校授课。陈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教学方法和进度,成绩依然名列前茅,并连获品学兼优奖状。在这里,陈云不仅能流利地背诵《古文观止》上的名篇,打牢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且接触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社会变革思潮,大大开阔了视野,在幼小的心灵中滋生了民族自强的情感。

陈云自小喜欢江南丝竹。离他家不远有个隐真道院,道院中有个小学士叫万隆泰与他相处很好。陈云平日做完功课和家务,常去道院,向万隆泰学拉二胡、吹箫和笛子。陈云还十分喜欢听评弹。镇上有个畅园书场,离他家也不远,他没事常去那里。由于没钱,就站在书场内的墙边听书,人称听“戩壁书”,也叫听“站书”。开始,是跟着舅舅去听,以后长大了,就独自去。由于记性好,每次听书回来,都能原原本本讲给别人听。从书中,他得到不少生动的历史知识,也受到真、善、美的熏陶。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波及到了陈云的家乡。在颜安小学组织的声援北京学生的活动中,由于陈云威信高,口才又好,所以很自然地成为同学们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们将高小部的师生组成救国十人团和宣传队,连日赴镇上街头、明园寺及小蒸等地,游行、演讲、募捐、表演短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罪行,号召乡亲们抵制日货。陈云参加了短剧《叶名琛》的演出。叶名琛是清末两广总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他既不领兵抵抗,也不弃城出逃,结果当了俘虏,被押到印度,死在那里。这出戏以叶名琛的下场告诫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反抗,只有死路一条。陈云

表演时很入戏，有一次演到表现帝国主义罪恶的时候，义愤填膺，脚向地上使劲一顿，手在桌上猛力一拍，把桌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年仅 14 岁的陈云经受了这场爱国运动的洗礼，也在运动中表露出很强的组织才能和沉着、坚毅的性格。

是年 5 月底，陈云毕业于颜安小学高小部。为了不再加重家里的负担，他放弃了继续求学的念头，想在外面找份工作，接济舅父母。正在这时，陈云在颜安小学的老师张子谦，受杜校长之托，通过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弟弟张子宏，替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找了个学徒的工作。年底，陈云离开练塘镇，登上了东去上海的小船。

到了商务印书馆，陈云被分配到发行所文具仪器柜当学徒。当时，陈云的个子比较矮小，仅比柜台稍高一点。一些老职工认为他做不了卖货的工作，文具柜主任说：“试试看吧！”

1926 年 6 月 13 日，陈云（后排右 5）同上海商务印书馆
虹口分店暨中国商务广告公司同人合影

陈云从小吃过苦,这点困难难不倒他。他在柜台前放了个长条凳子,站在上面,照样可以接应顾客。由于悟性高,又刻苦谦虚,所以,他很快熟悉了业务,受到老职工的称赞和信任。

商务发行所每天早晨8点钟开门,晚上8点钟收市,全天营业12个小时,加上从发行所到宿舍的往返时间,每天工作实际超过十四五个小时。许多工友下班后一回到宿舍就早早歇息了,而陈

青年时期的陈云

云却不同,总是最后一个休息,最早一个起床。每天清晨天未放明,他便起身读书、练毛笔字、念英语。在学徒的5年期间,陈云看遍了书店中的童话、章回小说、少年丛书,还利用业余时间到商务印书馆办的上海图书学校学习了三年。在图书学校,主要是学习中英文和书店店员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结业后,他开始有选择地阅读一些政治书籍,以探求救民强国的真理。所以,陈云虽然只有高等小学学历,却是当时发行所年轻同事中学识最渊博的一个。

商务印书馆内当时流行奢侈的风气,不少青年职工和学徒都受到传染。但陈云不为所动,总是保持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省吃俭用。学徒月薪很少,第一年两元,第二年四元,第三年六元。即使这样,陈云仍然能把钱积攒起来,除寄给舅父母外,还能资助有困难的同事。他待人谦和,一视同仁,在与同事相处中,偶遇意见相左,特别是对方明显不对,他也从不急躁

或大声争辩,而是耐心听对方把意见讲完,然后分析情况,说明道理,直到对方心服口服。他做事有主见,而且有很强的自制力。正是由于陈云有这些好的品质,所以他年纪虽小,却在工友中有很高的威望,大家有事都找他说,也以和他做朋友为荣。

1925 年初,陈云学徒期满,转到商务发行所上海虹口书店当店员,月薪 9 元。

上海四川北路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旧址

第二章 投身革命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次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宣布党委会总同盟罢工。上海学生联合会和总商会也宣布总罢课和总罢市。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五卅运动中,商务印书馆总公司宣布全馆停业两天。其编译所的编辑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等联合12个学术团体,创办了《公理日报》,对惨案真相如实报道,声讨帝国主义暴行。商务职工还成立了国人五卅运动后援会,为受难职工募捐。陈云作为商务的一名年轻店员,积极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举行的罢市、游行、募捐、义卖《公理日报》等活动。

几乎与此同时,在同事的介绍下,陈云开始涉足政治。他后来回忆道:“五卅事起,我还只是一个随着资本家罢市的店员,但此时已有商务之国民党员介绍我看三民主义。以前,我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看了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但紧接着,他又在同事的介绍下,前往上海通讯图书馆看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这个图书馆是由进步青年应修人、楼适夷共同创办的,旨在为要求进步、坚持自学的青年读者服务,五卅运动爆发后,秘密推广共产党的书刊,还常请共产党的领导人如赵世炎、恽代英、杨贤江等去作报告。陈云此时看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共产主义ABC》,他感到这些书的道

理比三民主义更好。

五卅运动后,上海军阀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大肆镇压工人运动,取缔工会组织,中共中央决定将总罢工转向局部的经济斗争,并把商务印书馆作为党发动罢工的重点之一。8月20日,中共商务印书馆罢工临时党团以“五卅”宣传队名义秘密召集会议,研究罢工的策略、步骤、方法,陈云和发行所、印刷所、编译所、总务处的40多名积极分子与会。次日,由他出面主持召开了有168人参加的发行所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会议。会议作出了举行罢工的决定,草拟了罢工宣言、复工条件和职工会章程草案,选举了罢工临时委员会。当时陈云虽然只有20岁,但由于平日公正无私,肯为职工办事,深得大家信任,所以被一致推举为委员长。22日,发行所首先宣布罢工。在随即召开的发行所全体职工大会上,又宣告了职工会筹备会的成立,并一致推选陈云为委员长。会议还通过了要求馆方承认职工会和改善待遇的12项复工条件。会后,陈云等人立即前往商务其他部门,协商配合行动问题。当天,印刷所和总务处先后宣布参加罢工。晚上,发行所职工会和总务处同仁会、印刷所工会开会,宣布联合行动,成立商务印书馆罢工执行委员会,陈云再次被推选为委员长。

8月23日,陈云代表罢工职工,在商务所属东方图书馆广场召开的4000人大会上,向馆方提出两所一处协商一致的复工条件。在他的推动下,编译所职工最终也加入到罢工行列。于是,三所一处罢工职工代表召开了联席会议,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了与馆方谈判的代表。馆方坚持先复工后谈判,使谈判一度陷于僵局。

商务印书馆是历史较长、规模较大的出版单位,商务职工

的大罢工自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上海《时报》在题为《职工会委员长之谈话》的报道中写道：据廖陈云声称工会方面认为应先承认工会，再开谈判；公司方面则表示增加俸金或容商量，但工会不得成立。“由此以观，双方相差太远，风潮当不能即日平静。”上海总工会、总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学生联

1925年8月24日，上海《时报》刊载的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大罢工第二天发表关于争取组织工会自由作为取得这次罢工斗争胜利的最基本条件的谈话

合会等6个团体还成立了商务罢工后援会，在馆方和职工方面进行调节。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更向商务当局提出抗议，表示如果不接受职工的复工条件，将号召全国停止使用该馆出版的教科书。在罢工职工的一致坚持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商务当局被迫让步，于8月27日晚

和罢工执委会达成协议，全部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复工条件。

罢工斗争胜利后，商务发行所职工召开全体大会，正式成立了职工会，陈云仍被推选为委员长。在此前后，他经中共早

1925年9月，陈云（前排左三）同上海商务印书馆
发行所职工会执行委员合影

期革命家、商务发行所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董亦湘和发行所第一位党员恽雨棠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在谈到自己入党时说道：“入党动机显然由于罢工运动和阶级斗争之影响。”“那时确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于我影响很大。做店员的人，有家庭负担的人，常常在每个重要关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要不止一次的在脑筋中思想上发生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克服，必须赖于革命理论与思想，去克服个人利益的思想。比如，当我在参加革命后，资本家威胁我时，我想到吃饭问题会发生危害，但立即又想到：怕什么？手足健全的人到处去得，可以到黄埔军校，可以卖

大饼油条，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没饭吃，归根结底，只有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以后，才大家有饭吃。”

五卅运动过后不久，反动势力向工人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反扑。1925年9月中旬，上海总工会被奉系军阀当局查封。10月，原属直系的军阀孙传芳赶走了奉系军阀，进驻上海，又查封了一批工会，商务印刷所的工会也在其中。针对这一系列事件，陈云在发行所职工会办的地下刊物《职工》创刊号上发表了《总工会是什么》和《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两篇文章，分别署名怀、民。文章指出：总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是与帝国主义对峙的，国内资产阶级一方面想借工人这支生力军对抗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工人势力太大。因此，工人运动处处受摧残。但其势力只有日日增加，是不会被消灭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为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进攻的革命先锋队，它有两重大责任：一是联络各阶级进行民族革命，二是解放自己。这一任务“只有大家集中一个团体，作共同有组织的奋斗，才有成功的可能”。这是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由陈云所写的最早的文章。

在反动军阀当局向工人运动反扑的气候下，商务印书馆当局也蠢蠢欲动。他们为了试验工会的力量，竟然违反劳资双方达成的协议，无理解雇上百名职工，并准备陆续再开除一批职工。发行所、印刷所工会几度交涉无效，遂酝酿第二次罢工。12月22日，两所再次罢工，由印刷所工人组成的纠察队在印刷总厂和东方图书馆门前守卫，维持秩序；陈云则代表罢工委员会向馆方提出复工条件。这次罢工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上海各报除了刊登馆方和工会方面各自的通告、宣言外，还刊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行业工会的支持信函。馆方仗着有军阀当局撑腰，派人要强行打开印刷总厂大门，遭到工

人纠察队拒绝。于是他们勾结军阀当局派出三个连的士兵和马队前往镇压,致使工人重伤 30 余人,被捕 40 余人。馆方看到事情闹大,遂答应部分复工条件。工会方面鉴于主要目的已达到,与馆方达成了协议,于 12 月 26 日宣布复工。

在五卅运动和商务印书馆的两次罢工中,陈云经受了阶级斗争的洗礼,同时也表现出了他对工人阶级事业的忠诚和杰出的组织才能。是年底,中共商务印书馆总支部成立,陈云任总支部干事兼发行所分支部书记、发行所职工会党团书记。商务印书馆既是陈云走向社会的起点,也是他步入职业革命

家生涯的开始。因此,陈云对它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1982 年商务印书馆建馆 85 周年时,陈云特题词一幅,以志庆贺。

1982 年,陈云为商务印书
馆建馆八十五周年题词

就在五卅运动渐入低潮时,由国民党领导的广东国民政府,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 1926 年 7 月正式北伐。为了配合北伐,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这三次起义,陈云都参加了。在第二次起义前夕,陈云曾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为准备起义在杨树浦英电俱乐部召开的会议。

次日,他又出席了上海总工会在此召开的各工会负责人联席会。会间,陈云和到会的另外 64 人被英巡捕房逮捕,关在提篮桥捕房。事发后,上海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

世炎立即组织营救；并由英电、老怡和工会出面向捕房交涉，说这些工人是请来开庆祝会的客人，如不立即释放，翌日将举行全市总罢工。在广大工人群众的压力下，加之陈云等均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被捕的 65 人于当晚全部获释。不久，中共上海区委鉴于北伐军已推进到嘉兴一带，决定举行全市总罢工。2 月 19 日晨，上海 15 万工人罢工，由陈云领导的南京路上各大百货公司店员工会参加了罢工。此后几日，罢工人数不断增加，中共中央遂决定将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整个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政治环境日益恶劣。为保存实力，坚持斗争，商务发行所党支部奉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市总工会的命令，通知该所部分党员、工会积极分子暂时离开上海，分别去常州、福州、宁波等地隐蔽。陈云等人移至宁波附近的余姚，并在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3 月上旬，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陈云等人离开余姚，返回上海。他不分昼夜地投入到研究、组织商务印书馆工人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工作之中，曾多次陪同周恩来、赵世炎到商务的东方图书馆视察地形。3 月 21 日中午，上海 80 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起义开始一小时后，陈云受上总派遣，同中共代表一起前往上海近郊龙华，与进驻那里的北伐军白崇禧部谈判，请求他们尽快前进，出兵助战。但白执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命令，按兵不动，企图等待工人与军阀两败俱伤时再进驻上海，以收渔翁之利。陈云等愤然返回，加入了决战的队伍。22 日下午 6 时，敌人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被攻克。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了。

正当上海人民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时，蒋介石的反革命面貌逐渐暴露，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 月 15 日，汪

精卫也提出“分共”，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失败。在革命危机存亡时刻，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实行了改组，领导了南昌起义，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布置秋收起义。陈云按照中共江苏省委指示，于10月初返回青浦，发动农民暴动。

此时的青浦，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遭到破坏，农会被迫停止活动，不少党员转移，农会骨干隐蔽，大革命高潮时被赶跑的大地主一个个卷土重来。陈云回到家乡后，顾不得看望多年来未见的舅舅、舅妈和弟弟，化名陈明，立即开始工作。他首先和青浦小蒸的地下党员吴志喜、陆铨生取得联系，召开了西乡农民运动骨干分子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商定以小蒸、练塘一带为工作据点，恢复和建立农会，开展抗租抗税斗争；然后，又与仍在青浦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黄渡特别支部书记夏采曦取得了联系，召开了东乡党员会议。陈云和吴志喜住在农民家中，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找积极分子谈话、开会，向农民宣传翻身闹革命的道理，并利用庙会向农民发表演说，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抗租斗争。经过一段时间，他们不仅在附近20多个村子里恢复和发展了农会组织，还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吸收了其中12人入党，建立了青浦西乡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192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建立青浦县委，任命陈云为书记。紧接着，青浦县委建立了农民革命军，陈云任委员。年底，陈云又被江苏省委指派为管辖松江、金山、青浦三县的松江区委的负责人。次年1月初，陈云按照省委制定的计

划,化名陈亨,领导了著名的小蒸和枫泾农民武装暴动。他在农民军攻占的新浜火车站,亲自将地主老财那里没收的银元分发给贫苦农民过年。暴动中,青浦和枫泾农民军的两位总指挥吴志喜和陆龙飞不幸被捕。陈云闻讯,立即组织营救。由于时间仓促,力量不足,组织上想尽各种营救措施,均未获成功,吴、陆两人终于被敌人残酷杀害。对战友的牺牲,陈云万分悲痛,直到晚年还深切怀念着他们。

当年小蒸农民武装
暴动指挥旧址

暴动失败后,陈云转移至浙江嘉善,继续坚持领导松江区的农民斗争。192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建立管辖松江、金山、青浦、南汇、川沙、奉贤、嘉定、嘉兴等上海周围十个郊县的松浦特委,陈云为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9月下旬,陈云来到练塘,秘密召开小蒸、练塘地区党员骨干分子会议,商量恢复青浦县委和整顿青浦基层党组织等问题。他在会上指出: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但也不能轻举妄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隐蔽斗争。由于行踪被敌人发觉,陈云乘渔船离开了练塘,旋即随松浦特委机关迁往上海,开始了在上海秘密环境下的战斗生活。

第三章 地下斗争

陈云来到上海后，中共江苏省委很快吸收他为省委农委委员，并指示松浦特委帮助省委解决经费问题。特委因此而参与领导了奉贤县委和金山县委发动的攻打庄行和新街恶霸地主宅院的农民暴动，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当时，中共中央从1927年底开始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已经被纠正，因此，奉贤和金山的暴动被认为是“盲动主义残余的复活”而受到批评。此后，松浦特委活动停止，陈云也因此被调任省委沪宁巡视员，负责对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南京一线地下工作的巡视。

1929年8月中旬，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省委决定吸收陈云、李富春参加省委常委工作；因为陈云对外县和农运工作较熟悉，决定由他担任农委书记；因为江苏省委直接领导上海市内各区委的工作，又决定由他分管沪中区委。他按照省委的布置，频繁地与各县来沪请示汇报工作的负责同志秘密接头，向他们传达省委的指示，及时在省委常委会上汇报他们反映的情况，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并根据省委决定，不断起草给各地的指示信，部署秋收、年关等时期的斗争任务。对于上海沪中区，他重点是抓药业、估衣业、报业等行业的群众斗争，要求各级组织一方面尽力恢复大革命失败后被勒令取消的赤色工会，另一方面不拒绝利用黄色工会系统发动群众。

通过三个月的工作实践,陈云逐步形成了对江苏农民运动的整体认识。1929年11月,他在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农委作了关于江苏农民运动的报告。报告分析了江苏农运的趋势,提出了党在领导农村斗争中的任务和策略。就在这次代表大会后,陈云被中共江苏省委执委会推选为候补常委,仍兼农委书记。不久,江苏省委为了在193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推动上海的总示威和总同盟罢工,成立了上海总行动委员会和各区行动委员会,陈云又先后被任命为法南区委书记和法南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他连日出席上海各区行委书记会议,积极筹划有关游行示威的各种准备工作。5月1日,上海数万工人、学生冲破租界当局军警的封锁,在南京路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和集会,显示了革命力量在白色区域的复兴,给了正在坚持斗争的红色区域以有力的声援,也给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随着局势的好转,党内“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1930年5月爆发了蒋、冯、阎之间的新军阀大战后,更使一些同志对革命形势作出了过高的估计。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并为此在各级成立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在这一路线下,江苏省委、省团委和上海工会联合会以及中央派来的人组成了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陈云没有被吸收进主席团,只被任命为总行委委员,负责外县工作,兼任上海闸北区行委书记。尽管他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但在报告情况和研究问题时,也像往常一样,保持着求实的作风。在上海各区委书记和军委参谋联席会议上,他汇报闸北区的情况,说那里的赤色先锋队虽已建立了24支,但都没有经过武装训练;宣传队名义

上有 27 支,实际上只有 12 支可以调动;宣传品印刷数量不少,但因交通问题没有解决,无法往下送;罢工布置比较成熟的只有一个厂。这在“左”倾情绪占上风的形势下,显然是一种低调的发言。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他们派正在苏联的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1930 年 9 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领导工作,取消了原来的暴动计划,撤销了各级行动委员会。陈云作为江苏省的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从此进入中央领导层,时年 25 岁。

六届三中全会也有不足之处,就是没有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理“左”倾错误,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但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王明、博古等却从宗派立场出发,打出“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他们不是批判李立三的“左”,而是批判他的“右”,实际提出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人干预下,中共中央时隔 4 个月,又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使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在实际上控制了中央的领导权。早在三中全会后,江苏总行委就已改为江南省委,管辖江苏(包括上海)、浙江、安徽三省的党组织,陈云任省委常委和组织部部长。四中全会前夕,江南省委在批判“立三路线”错误时,提出改组省委领导班子,并在新的名单中排除了陈云。中央政治局否定了这个名单,提出改组后的省委常委由刘少奇、夏采曦、王克全、陈云、何孟雄等组成,刘少奇为书记,刘回国前(此时刘在苏联),由王明代理书记。由于共产国际强调培养和提拔工人出身的干

部,而控制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等一批干部此时又在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所以,陈云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接着,江南省委和中央接受了陈云的建议,将江南省委又改为江苏省委,只管江苏省和上海市区的工作。在新江苏省委中,陈云仍任常委兼组织部长,并负责铁路总工会和上海的沪东、浦东、吴淞地区,以及外县松浦、沪宁地区的工作。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当天截获这一情报,立即派他的女婿刘杞夫由南京连夜赶往上海,找到中央特科的李克农。但那天刚好不是李克农与在中央军委工作的陈赓接头的日子,李便通过江苏省委的关系找到陈云,向中央及时转报了这一消息。中央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周遂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采取果断措施,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于当夜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安全转移,使国民党特务企图利用顾顺章一举摧毁中共中央的计划落空了。

193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整特别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5人组成(周恩来到苏区后,中央特委改由陈云、康生、潘汉年、陈寿昌组成),调陈云任中央特科负责人。在特科,陈云化名李介生,党内别称“先生”。这一时期,中央特科在陈云领导下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处理由于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而进行的中央机关的再次转移。(二)调整内部组织,撤销了负责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通讯联络的第四科,将电台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进行了精简缩编。(三)安排因顾顺章叛变而暴露面目的特科人员撤离上海。(四)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恢复中央特科因顾顺章叛变

而停顿下来的一些工作,发展了一些新的警报关系,如在法捕房、英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警务司令部等处建立了内线联系人。(五)继续惩处叛徒,如镇压了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六)解决顾顺章叛变后的其他遗留问题,等等。陈云受命于危难之际,指挥特科粉碎了敌人一个又一个阴谋,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和其他党组织安全的任务,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对于在那段险恶岁月和自己并肩战斗的同志,陈云始终怀着很深的感情。时隔 50 年,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中央特科工作者历史座谈会的代表,向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

1981 年春,陈云在北京会见参加中央特科
工作者历史座谈会的老同志

陈云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共产国际鉴于王明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也将前往中央苏区,故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经中央负责人商议,1931 年 9

月决定临时中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1932年3月，陈云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央特科改由康生负责。那时王明虽已离开国内，然而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仍然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白区工会工作自然难以幸免。但陈云自从主持全总以后，一方面全身心地投入到领导工人反对资方压迫、开除工人的斗争中，另一方面在斗争中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讲究斗争的策略，尽可能减轻“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

大概是由于陈云熟悉街道里弄，也可能因为他曾负责过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年底，正在担任全总党团书记的陈云接到临时中央的指示，要他去鲁迅家中将正在那里隐蔽的瞿秋白转移到其他地方。一天深夜11点多，陈云坐着一辆黄包车来到上海北四川路鲁迅先生的寓所。只见鲁迅穿着一件旧灰布棉袍，要许广平出去雇了辆黄包车，庄重而带忧愁的脸色，表示非常担心瞿秋白夫妇和陈云路上会被侦探、巡捕捉去。他问陈云：“深晚路上方便吗？”陈云答：“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

1932年底鲁迅在上海
的住地——北四川路
拉摩斯公寓

鲁迅将他们送到房门口时又说：“今晚上你们平安到达那里以后，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当他们开门下到二楼时，送他们出门的鲁迅才关上了房门。鲁迅是最受中国共产党

人尊重的党外人士之一，这一次见面给陈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惟一见过鲁迅的人。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当时陈云正在苏联，他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时，脑子里一阵轰轰的声音，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了几分钟。那身穿灰棉袍和庄重而带着忧愁脸色的鲁迅立刻又在陈云脑子里出现了，仿佛还在说：“深晚路上方便吗？”于是，他提起笔来，写了题为《一个深晚》的文章，以史平为笔名，发表在巴黎《救国日报》上。

鉴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决定将党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张闻天先行，博古、陈云随后跟进；康生去莫斯科，李竹声留下当上海中央局书记。至此，陈云结束了两年多的地下斗争生活，前往由共产党掌握政权的红色区域。

第四章 红色岁月

陈云同博古是于1933年1月17日由上海出发的。他们在中央特科的安排和护送下,先乘船绕道广东汕头,换乘火车至潮州,再乘火轮至大埔,在那里同中央苏区派来迎接他们的武装交通队员会合。为避开国民党的封锁线,他们白天休息,夜间走荒无人烟的山路。在途经福建与广东交界的永定县游击区域时,遇上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幸得武装交通队员将敌人引开,才使他们化险为夷。当他们终于由上杭县才溪乡进入中央苏区时,陈云躺到地上,望着蓝天,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

1月下旬,陈云同博古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博古主持召开了一个中央会议,决定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仍称苏区中央局(6月改称中央局),陈云为成员、常委。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也由上海迁往苏区,同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改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党团书记、副委员长兼福利部部长。当时,全总办公地址就设在瑞金县沙洲坝胡岭背村。

到苏区不久,陈云便同刘少奇一起去汀州检查指导工作,并开始纠正“左”的错误。1932年4月,苏区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陈云撰写的《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文章批评工会在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中机械执行《劳动法》,不问企业状况,一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强迫介绍失业工人入厂,到处举行有害苏区经济流通的总同盟罢工;要求重新审查

瑞金县沙洲坝乡胡岭背村的全国总工会旧址

各业的集体合同；指出必须向工人群众解释，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把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

为了纠正“左”的错误，陈云于6月又到福建汀州视察工会工作。汀州不仅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有“红色小上海”之称。巡视中，陈云发现过去工人与雇主虽然签订了许多劳动合同，但合同的条文大多照

抄《劳动法》和江西、福建两省工会颁发的斗争纲领,很多地方不切合实际,于是指导当地经营南北土特产的京果业重新订立了劳动合同。从汀州返回后,陈云撰写了《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文,详细介绍了他到汀州领导工人订立劳动合同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办法。由于新合同与实际情况相符合,赢得了劳资双方的欢迎和认可,很快成为中央苏区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的范例和样本,被普遍仿效、推广,从而改善了苏区企业的经营管理,促进了根据地工商企业的发展。

陈云还关心苏区国营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工会的工作。那年秋天,他前往瑞金附近的一个兵工机械厂,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调查研究,从产品产量与质量、设备与工具,直到行政与党团工会的关系、工人教育与福利状况、供给制能否改为经济核算制等问题,都作了了解。他发现厂长作风不民主,体罚工人,职工意见很大,便与有关部门研究,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宣布撤销这个厂长的职务。消息迅速传遍了所有的兵工厂,大大调动了工人支援反“围剿”战争的生产积极性。

1934年1月中旬,陈云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并作了关于白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会上,他正式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也称中央书记处成员),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此后,他对临近苏区的白色区域工作作了认真研究,先后撰写了《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游击区域(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等文章,为党的白区工作路线的转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

同年夏天,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排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实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屡战失利,形势日趋严重。为了摆脱极其被动和危急的困境,中共

中央书记处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前往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此事。陈云受中央军事委员会委派，负责军事供给和各项生产管理工作。由于工作组织得好，使三个月的计划两个月即完成。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率领党政机关、军委总部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对外称红星、红章纵队）从瑞金出发，红一、三、五、八、九军团随后从各自驻地出发。出发前，中央决定陈云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从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同他的谈话中，他得知红五军团的任务是担负全军的后卫任务。10月18日，陈云随红五军团从兴国县曲利出发，踏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

当时，红五军团的军团长是董振堂，政治委员是李卓然，参谋长是被中央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贬到五军团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全军只有红13师和红34师两个师，共6个团。陈云协助他们，边组织行军，边深入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21日深夜，中央红军开始突围，至25日，冲破了国民党军为堵截红军战略转移而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11月底，红军在广西境内抢渡湘江，遇上了长征以来最为惨烈的战斗。红五军团的殿后战斗更是异常激烈，陈云和军团首长为了组织和指挥战斗，曾6天6夜没有睡觉。12月1日，大部队终于渡过湘江。而五军团的部分部队仍滞留东岸与敌人激战，如再不迅速过江，将有被正沿湘江两侧迅速合拢的敌人分割包围的危险。陈云急书便信交刘伯承派人送至红13师师长陈伯钧等，催促部队迅速撤离战场，下最大决心，赶快

将队伍拉过湘江。红 13 师接令后,连夜急行军 90 华里,抢在敌人合拢前渡过了湘江。担任红五军团后卫的红 34 师却来不及渡江,师长陈树湘以下大多数壮烈牺牲。陈云为等部队,始终守在渡口,他见到在红八军团任中央代表的刘少奇尚未吃上饭,立即把自己的干粮送给他。这一仗,使中央红军由出发前的 8 万人锐减为 3 万人。

由于日夜行军战斗,陈云极度疲惫。一次,当他来到红 13 师 37 团时,19 岁的团政治委员谢良想办法搞来了一只鸡,煮了一碗鸡汤挂面,端给陈云吃。后来,谢良在西路军山丹战役中身负重伤,被锯掉左腿。到延安后,组织上安排他去苏联安装假肢,他到中央组织部办介绍信,刚巧遇到从苏联回国不久的陈云。陈云热情地留他吃饭,谢良怕麻烦老首长,一再推辞,陈云真切地说:“这顿饭非吃不可,长征路上你不是还请我吃过鸡汤煮挂面吗?”结果,陈云硬是把谢良留下,请他吃了一顿从苏联带回的马肠。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谢良拿着自己写的几本革命回忆录,到中南海陈云家中看望老首长。陈云让他把裤管卷起来,深情地查看了他安装好的假肢,也把自己刚出版的文选送给这位已是作家协会会员的将军。

湘江战役后,红军开始翻越越城岭山区。越城岭当地称之为老山界,是南岭山脉的一部分。陈云随红五军团抵达山脚时,

1984 年,陈云在家中与
谢良谈话

已是太阳西下之际。吃过晚饭，部队开始上山。他在一个连队的前面走，走一步停一步。由于天冷风大人倦，在凌晨两点露营时，不管地下是湿是干，大家横七竖八，倒地便睡。天未亮，部队吹号，起身，吃饭，继续爬山。关于这段经历，陈云后来在为宣传红军长征而假托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医口气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曾有详细的描写。

在红军过老山界之际，蒋介石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的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 20 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并布好了一个口袋阵。如果中央红军按原计划继续北上湘西，将钻进敌人设下的口袋。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力主部队西进，前往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原定计划，会议未取得一致意见。实际上，部队于会后仍继续西走，向贵州黎平前进。陈云因为随红五军团行军，距离中央纵队有好几天的路程，未能参加这次会议。18 日，中央政治局到达黎平后又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西渡乌江北上，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陈云也未能参加。在黎平，中央军委下令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中央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1935 年初，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陈云与刘伯承又被分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和司令员。1 月 15 日至 17 日，著名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到遵义后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黎平会议上确定的，但博古对此提出异议。当时，参加

长征的中央常委只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和陈云⁴人，所以，周恩来于会前找张闻天和陈云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张闻天表示还是应当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赞成张的意见，于是周恩来下决心，维持黎平会议的原议。陈云原先对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并不很了解，只是感到湘江之战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会上，他听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对博古、李德的批评，了解了情况，发言时坚决支持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

遵义会议会场

张。在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努力下，会议终于决定取消“三人团”，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正是这些决定，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和红军，奠定了长征胜利的基础。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常委决定由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

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会议的决议，陈云为此写了传达提纲。半个世纪后的1982年，中央档案馆翻出了一份缺少第一部分、也没有落款的档案，从内容上看是关于遵义会议情况的。他们

陈云在长征路上写的遵义
会议传达提纲手稿

找了许多与会者辨认，大家都说不清来历，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它送给了陈云。陈云看后，当即认出这就是他写的那份传达提纲的手稿，具体写作时间记不清了。后来党史专家从内容上判断，其形成时间大致为从威信至鸭溪的行军途中，也就是2月中旬至3月上旬。正是这份手稿的被发现，使人们搞清楚了许多过去说不大清楚的问题。

由于遵义会议将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改为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所以红军离开遵义后，改向川南方向前进。在土城一仗中，红军失利，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连夜开会，决定撤出战斗，东渡赤水西进，同时决定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会议一结束，他立即集中大部分卫生部、运输部的担架，赶到前沿阵地把伤员抢运下来，安置在镇内和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家中，并付给一定的医食费用；然后指挥军委纵队，把所有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机器和其他笨重物资，或销毁，或掩埋，或投入河中，但无线电台一台也没有丢弃。陈云彻夜未眠，仅用10个小时便完成了所有任务。

二渡赤水时，陈云负责指挥架桥。因桥未架好，部队改为乘船过河。为此，陈云事后常引为憾事。后来，陈云在《随军西

行见闻录》中写道：“赤军之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东，待川军发觉而折回时，赤军已渡赤水河而占桐梓、娄山关。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朱德、毛泽东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红军三渡赤水后，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

1981年7月1日，陈云同邓颖超交谈

阳，待滇军入黔增援时，又掉头西进，进入云南。那里盛产火腿，红军痛痛快快地解了一次馋，以致几十年过去了，陈云仍记得邓大姐当时送给他一个水葫芦和一把小勺。就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陈云同周恩来等人行军时，居然还截获了一辆云南军阀龙云派出给国民党“前敌”总指挥薛岳送军用地图和云南白药、宣威火腿等礼品的汽车，令红军喜出望外。

为了进一步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金

沙江,转入川西。在金沙江边的皎平渡,陈云和刘伯承被分别任命为渡河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和司令员。金沙江水流湍急,不能架桥,只能摆渡。当时,搜集的大小船只总共只有6条,而需要渡河的红军人马则有几万,且每小时只能往返三四次。所以,能否有条不紊地上船是成败的关键。刘伯承和毛泽东等在北岸指挥,陈云在南岸组织部队上船。渡河指挥部沿途贴出布告宣布,部队到江边必须停下,等待号声前进。每船被标明号码,并按船大小规定所载人数和担数。部队按指定船只,一路纵队依次上船,坐在事先指定的位置,即使军团长、师长也不能例外。船上除船夫外,还指定一人为船上司令员,大家均须听命于他。为了保证船工体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指挥部发给他们每人每天5元大洋;每昼夜开6顿饭,顿顿杀猪;还烧

云南省禄劝县金沙江皎平渡口和陈云于1992年
为红军渡江纪念碑题写的碑名

了一大锅鸦片，由船工随便吸取，不收钱；指挥部人员则每餐只以青豆为菜。由于组织工作周密有序，红军人马只用9天9夜就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渡江之后，陈云经常奉中央之命来往于各军团之间，传达中央及军委的命令。此前，陈云还兼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和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当红军先后进占会理和冕宁时，陈云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理会议；在冕宁的总政治部驻地接见了中共西昌特支负责人，向他了解西昌和冕宁地下党的情况，商量建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和组织抗捐军的事；随后又同周恩来召开了有当地干部参加的总政地方工作部会议，决定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会后还起草了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主持了几位地方积极分子入党的仪式。由冕宁继续向南走，红军通过了彝族区，又过了大渡河，到达泸定县城。在那里，他又出席了中央负责人会议。那次会议只作了两项决定：一是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早在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之后，中央为了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就决定让陈云和潘汉年去上海。潘汉年受命先走一步，后因上海党组织连遭严重破坏而前往香港，在那里等待陈云。红军逼近昆明时，有关部门曾安排陈云离队，经昆明去上海，但因故未走成。泸定会议后，陈云随队伍又走了七八天，并在行军途中围绕红军在川西北创立根据地的方针，写了一篇《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的文章，发表在中央和总政治部合办的《前进报》第一期上。当红军经过天全县，再往前就要翻越雪山时，他终于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离开了长征队伍。因此行的使命是绝对保密的，他未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

透露。临行前,他把随身携带的两箱机要文件交付组织处理,把蚊帐送给了张闻天,并委托张闻天的爱人同时也是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将一条毛毯和几件衣服转交给自己的亲人,说如果问起来,就讲“掉队了”。“掉队”,这是当时红军内部对于牺牲的另一种说法。就这样,陈云怀着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带着对战友们胜利到达目的地的衷心祝福和对他们的深切思念,悄悄地离开了大家,朝着相反的方向,踏上了赴上海的路程。

第五章 特殊使命

陈云是在 1935 年 6 月上中旬,于四川天全县灵关殿离开长征队伍的。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党中央有关部门在当地

今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镇

挑选了一名地下党员,担负护送陈云出川的任务。此人姓席,名懋昭,1933 年入党,公开身份为灵关殿村小学校长,有个亲戚是川军军官。陈云与他分别装扮成入川办事的江浙商人和川军军需人员,商定为避开追击红军的敌人,绕道荥经,转回雅安,再奔成都、重庆。

那天细雨濛濛,天色昏暗。陈云与席懋昭沿着田间小道,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走着。不一会儿,从后面跑上来一个人,只见他浑身是泥,慌里慌张,气喘吁吁。原来,此人是荥经县的

地主，在天全县任教育局长，当红军进驻天全时被捕。有关部门为了利用他给陈云起掩护和带路的作用，将此人押往灵关殿，陈云刚走，便有意让他乘机溜掉。待那个教育局长追上来时，席主动与之搭话，声言他和陈云是为了躲避红军而外逃的。教育局长信以为真，也讲了他的实情。于是，3人结伴同去荥经。由于他们走的全是山路，避开了敌人的追击部队，加之那个教育局长同这一带的民团很熟，碰上关卡，一律放行，所以第二天便来到了荥经。他俩在那个教育局长家中住了一夜，即折向雅安。

由雅安到成都，陈云和席懋昭走的是大路。他们一次又一次成功应付了敌人岗哨的盘查，终于在五六天后进入成都。陈云持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刘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胡先生一见陈云，万分惊骇，急忙把他安顿在客房住下，催他尽快离开。陈云在那里逗留了一夜，次日一早，便托人去成都《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一则《廖家骏启事》，内容为：“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个启事是陈云临行前与周恩来商量好的，是向中央报告平安的暗号。然后，他辞别了胡先生，在约定地点与席懋昭会合，先乘汽车后步行，前往重庆。到了重庆，陈云持刘伯承的另一封亲笔信，在一个药铺找到了刘的弟弟，在其家中住了下来。几天后，陈云获得赴沪的船票，在朝天门码头与席懋昭分手，坐上赴上海的轮船，顺流而下，胜利出川。关于这段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当两年之后陈云辗转到达延安见到刘伯承等阔别多年的战友时，曾向他们摆起“龙门阵”，引得大家笑个不停。

但是，当陈云到了上海，情况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当时，中

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已连续三次遭受大的破坏,许多人被捕,也有许多人叛变,仅从在报上登反共启事的叛徒名单中,陈云就发现有七十多人认识他。为防万一,他通过时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的章乃器,找到了当年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地下党员章秋阳,又通过章秋阳找到上海临时中央局的负责人浦化人等,了解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并开始研究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计划。不料,就在此后不久,上海临时中央局、江苏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浦化人及中央局宣传部代理部长董维键等均被捕。陈云通过章秋阳找到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通过她俩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取得了联系。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上海党组织被大破坏的情况后,电示陈云和由香港前来与陈云会合的潘汉年,尽快离沪赴苏。

1935年9月上旬,陈云与正在上海的中共(江西)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江西省委书记曾山,以及杨之华、何实嗣等,秘密搭乘苏联货船到海参崴。为遮人耳目,苏联当局派人把他们一行作为偷渡者押下船,然后,又把他们送上火车,于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此时,共产国际的七大已经闭幕,青年共产国际的六大正在召开。陈云同陈潭秋等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大会。大会闭幕后,苏共中央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接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王明和陈云、滕代远。

在莫斯科,陈云参加

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大楼旧址

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化名史平。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向西北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形，使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红军长征前失利的原因和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所在，了解了新的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英明和正确。后来，有人将他的这个报告加以整理，并增加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内容，冠以《英勇的西征》之题，署名施平，发表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后来还出版了小册子。这是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在世界革命阵营中最早宣传红军长征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人物的文献。这本小册子不是陈云的亲笔，但另一本小册子，虽然署名廉臣，却出自陈云笔下。那就是前面提到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陈云早在上海时就开始撰写它了，到了莫斯科继续撰写工作。1936年春，它先在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夏天又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很快便流传到国内的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使人们了解了所谓红军“已溃不成军”的真相，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的
单页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单行本

人们常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者，其实，当斯诺1936年7月到陕北采访时，陈云的这本小册子

已公诸于世了。

在莫斯科时,陈云同陈潭秋、曾山、孔原、滕代远等一批中共领导人一起,进入列宁学校学习,组成了一个特别班。特别班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还学习列宁主义问题、西方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党史和英文。学习中,陈云曾因成绩优秀而获得“突击手”的称号。在学习期间,陈云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专门培训中国抗联干部的八分校任教,授课内容主要是党的建设问题。在校的中国学生对陈云的讲课印象很深,当年的学员韩光后来回忆说:我们经常听王明、史平等领导人的报告,王明作报告总要捧着厚厚的一摞书,讲讲翻翻,翻翻讲讲,使人听不明白;而史平讲课,从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如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批评等等,使我们这些远在异国他乡的青年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以后回国才知道,史平原来就是陈云。

在列宁学校的学业尚未结束,陈云又领受了一项新的特殊使命——回国迎接西路军。早在1936年8月,中共中央为打通国际路线,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10月下旬,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紧接着,红30军、9军、5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2万余人相继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夺取宁夏战略计划得到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赞同,并通知中共有大批军用物资被运往远东的苏中边境,等待西路军前来取运。为了接应西路军,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一个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由陈云任团长,滕代远任副团长,另外配有翻译、电台技术和报务人员各一名。他们是10月份集中的,季米特洛夫为给他们送行,还

设了家宴。但因宁夏战役计划失败，过河部队西入河西走廊，所以直到12月8日，他们一行5人才离开莫斯科，前往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首都），在靠近新疆的霍尔果斯住下。在那里，他们住在苏军一位中校军官家中，看到了苏联当局为西路军准备的大炮、机枪和其他武器。但正在此时，爆发了“西安事变”，苏联方面最初认为这是日本人利用张学良搞的，决定那些武器不给西路军了。陈云知道后很是着急，当大家议论“西安事变”，说这下子可以枪毙蒋介石时，他却冷静地说：这个问题不简单，根据目前形势，蒋介石杀不得。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方面也改变了态度。

在此之前，西路军也遇到了挫折。宁夏战役计划失败后，西路军按照中共中央转告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改向新疆方向前进。中间由于苏联方面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将物资转运至新疆，西路军在甘肃中部停顿了一下。就是这一下，给了马家军以集结兵力的时间，致使西路军在高台一仗元气大伤。西路军决定成立以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余部二千余人，转入祁连山腹地打游击。不久，西路军余部的两个支队也失败，只剩下由工委直接率领的左支队。1937年3月23日，中央电示他们设法去新疆，并谓将派陈云等前往迎接。

4月中旬，正在焦急中等待任务的陈云终于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电报，要他们急速前进，赶到星星峡地区，接应西路军残部。陈云等人立即乘坐新疆督办盛世才派来的汽车，经伊犁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盛世才原本是东北军的下级军官，“九一八”事变后带一部分队伍撤到苏联境内，又由那里转入新疆，并夺取了督办的位置，当起了“土皇帝”。为了

寻求苏联的支持,以向蒋介石的“中央”闹独立性,他伪装进步,制定了“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⁶大政策。苏联为了在靠近新疆一侧有一个安全的边界,也在武器装备上给他以支援。由于有这层关系,陈云等到迪化后,立即通过苏联领事馆,与盛世才见了面,商定了迎接西路军进疆的方案。陈云也由此开始以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的名义活动。

此时,西路军左支队正且战且退,按中央电示向河西走廊西头、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前进。4月底,第一批指战员陆续走出了荒漠的戈壁滩,到达星星峡,受到新疆边务处的热情接待。与此同时,陈云、滕代远等随盛世才派出的装甲车队也由迪化出发,赶往星星峡。途中,陈云得知西路军已有人在星星峡出现,立即同那里的边务处通话,要他们转告西路军人员就地休息;还致电盛世才,请他派飞机空投衣物、食品和药品。那时,哈密一带由地方军阀尧乐博斯的匪军盘据,他们反对西路军入疆。所以,装甲车队在路上曾与他们的马队发生激战,并将他们击溃,扫清了迪化至星星峡的道路。

刚好是“五一”节那天早晨,陈云和滕代远等人乘车队抵达星星峡。这时,西路军左支队走到这里的已有400多人,其中军师一级干部14人,团以下干部70余人,无线电报务人员26人,医务人员23人,全体人员中党团员占62%。陈云与李先念等一一握手,向他们转达党中央的慰问,许多干部战士就像虎口余生的孩子回到母亲怀抱一样,止不住热泪盈眶。当天,左支队指战员就地召开了庆祝“五一”节大会,陈云向大家讲了话。他说:革命战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保存了有生力量,今后仍然会发展壮大,现在几百人,以后可以扩充成几千人几万人。凡是走到这里的人都经历了千难万险的考验,是多

少金子也换不来的。要睡好觉,吃好饭,把身体恢复好。他还要大家把原有的武器和衣服保存下来,带给共产国际,好让全世界看看,中国红军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斗争的。由于左支队每人领了一套衬衣、一套夹衣、一双皮鞋,还有新的枪支弹药,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过了两三天,这 400 余人在陈云、滕代远带领下,坐大卡车驶向迪化。5 月 7 日,部队进驻迪化一个尚未启用的纺织厂工人宿舍。按照与盛世才的事先约定,这支部队对外称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营,说是从关内新招来修公路的;指战员穿新疆军队的军服,戴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享受新疆部队的供给标准。为了稳定指战员的情绪,尽快恢复他们的体力,为赴苏联学习作准备,陈云同团以上干部一个个谈话,给连以上干部作形势报告;还同滕代远从代表团经费中出钱,给每人增加菜金和零用钱,以保证大家每餐有豆腐吃;将干部战士按文化程度分班,组织大家学习汉语、俄语、英语、数学、几何等。

后来,共产国际改变了让西路军余部去苏联学习的决定,西路军左支队也由纺织厂宿舍迁至迪化东门外的营房。在那里,部队进行了整编,西路军工委继续保留,左支队改为总支队,下辖 4 个大队,每个大队 3 个排,每排 3 个班,每班 10 人左右;另编一个干部队,直属工委领导。经陈云建议,中央同意总支队留在新疆,就地学习现代军事技术。随

乌鲁木齐的“新
兵营”旧址

后,陈云详细调查了盛世才驻迪化部队的机械化装备情况和军官学校的教学能力,同盛世才和他的苏联总顾问商定,用新疆军队的装备和苏联的军事教官,对“新兵营”进行培训。陈云又同西路军工委研究,决定以一、二大队为基础,学习汽车的驾驶、修理;以三大队为基础,学习装甲车、坦克的驾驶、修理;以四大队为基础,学习火炮的操纵;从各大队选调一些人进入军医学校和兽医学校进行正规学习。特别是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陈云经与盛世才反复谈判,终于使他同意由新疆航空队为八路军培训50名空地勤人员。陈云考虑这将是中共武装力量的第一批空军干部,为照顾原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都能有人参加,决定先从西路军选调30人,再从延安选调20人。于是,一个向现代军事技术进军的热潮在原西路军干部战士中掀起。这批人后来果然成为解放军各技术兵种最初的骨干,这不能不说是陈云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所做的一件很有远见的事情。

1937年10月底,陈云(前排左一)等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同毛泽东(前排左二)等人在机场的合影

1937年10月,毛泽东派秘书周小舟专程来新疆,商谈在迪化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经过陈云等人的努力,此事得到了盛世才的同意。中共中央决定陈云任办事处的党代表。但没过多久,中央又向共产国际提出,由于全国工作的大开展,急需领导干部,要求将中共代表团中的陈云等人调回中央。11月中旬,苏联派飞机将王明、康生等送往延安,途经迪化。于是,陈云搭乘这架飞机,一同前往。29日,飞机在延安降落。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萧劲光等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八路军领导人和机关干部、部队指战员、学校师生、当地群众共上千人前往机场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至此,陈云完成了特殊使命,在阔别中央两年后,重新回到了中央身边。

第六章 延安年代

陈云到延安后,出席了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会者合影。
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
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这个会后不久,陈云因过度疲劳,致使在阿拉木图犯过的流鼻血的病复发,只得停下工作休养。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从陕北公学挑选了一名女学员,调到他身边,一面对他进行滴鼻子药水一类的护理工作,一面帮他处理杂事。这位女学员名叫于若木,是山东济南人。在护理陈云期间,他们两人彼

此产生感情,成为了终身伴侣。结婚前,陈云对她说:我是个老实人,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和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婚后,于若木在写给远在英国的大哥的信中是这样向他介绍这桩婚事的,信中写道:“虽然他大了我¹⁴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个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幼稚无知。”

陈云同于若木在
延安的合影

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陈云通过阅读各地的书面报告或与回延安汇报工作的各地负责干部谈话,对党的组织状况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仅笔记就写了几十本。过去,由于党处在秘密环境和各个根据地被分割的状态,中央组织部只管中央所在地的组织工作,并不面向全国,进入延安后也是这样。陈云根据国共合作后的新形势,提出中组部要面向全国,掌握各地的情况,分别制定不同的对策。针对敌后根据地的情况,陈云提出要在战争中,在建政建军中去建党。针对国民党统治区即大后方的情况,陈云提出要在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执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任务,实行“党内小、党外大”的方针。针对日军占领区的情况,陈云提出了“领导机关要放在外头”的方针。1938年3月,陈云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截至同年

9月,南方有13个省先后建立了党委或省工委,拥有党员近7万人。而在十年内战结束时,党员由十几万减为了3万。在党员数量得到大发展时,陈云又及时向中央提出,要放慢发展速度,边巩固边发展,并在1939年8月参与起草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陈云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还兼任过一些相关的职务,例如中央党校校长(1939年底之前一段时间)、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长、华北华中委员会和南方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等等。早在西安事变前后,中共先后停止了共青团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在抗日根据地的活动,而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青年救国会等更具广泛性的组织来取代。为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38年5月决定各级党委都设立青年委员会,并由陈云任中央青委书记。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陈云就青年工作作了报告。无论是党的组织工作,还是青年工作,当时都遇到了一个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针对种种偏见,陈云经常提醒大家要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与会者合影。

后排右五为陈云

正确看待知识分子。他在 1939 年 12 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 2 次党代表大会上说：“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在此前后，他曾参与制定了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为了说明吸收知识分子工作的急迫性，他还提出了“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说抢夺知识分子是抗战中的大斗争，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他不仅提出这样的号召，而且身体力行，带头去做。留法肺科医生何穆和他当作家的妻子陈学昭由重庆到延安，陈云亲自出面试接待，征求他们对工作的想法，并安排何穆到中央医院工作、陈学昭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从事写作，还从生活上给予他们各种优待。不料一年后，何穆夫妇突然要求回重庆去。陈云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留下。得知他们仍执意要走，陈云便说：“你们一定要走也欢送，出去以后有困难，愿意回来，我们随时欢迎。”为表示诚意，陈云还请示中央，交给他们为延安采买医药用品和招收医务人员任务，介绍他们到重庆休养。过了两年，他们果然又回到延安，并带来了多名护理人员。以后，何穆担任过白求恩医院的院长，建国后还担任了卫生部的顾问。

对于干部工作，陈云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叫“热炒热卖”。意思是说，不仅要抓紧吸收知识分子，而且要抓紧对干部的短期培训，使他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了解党的路线，掌握一些最基本的政治、军事、党建知识，然后派到前方去，一方面缓解干部的供需矛盾，另一方面让干部尽快适应战争环境，在实际工作中提高本领。为此，陈云还为中组部起草了《关于延安几种干部培养使用的决定》，提出了训练干部的方法。那时在延安除了马列学院等个别学校的学习期限长一些外，其他学

校,如抗大、陕公、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学习期限都很短。中央组织部也从1938年开始,办了个党训班,每期200多人,先后办了8期。当时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和驻地部队仅有脱产人员5万人,而在校的学员就有1万人,并且还处在不断的流动中。通过这种办法,中央向各地先后输送了20万速成干部。

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把干部视为党的宝贵财富,十分关心爱护干部。他在《论干部政策》的讲演中,提出了组织工作的十二字诀,即: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抗战初期,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很多共产党人,为营救他们,中央于1940年10月决定成立救济委员会,内部由陈云负责,外部由董必武负责。陈云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在狱同志和救济工作的指示》,还主持制定了应付敌人自首政策的办法,规定要把叛徒与动摇分子严格区分开,对仅填写“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但出狱后继续革命并被证明是真正革命者的,可恢复党籍。当时,一些在国民党统治区与党失去关系的人和国民党监狱里被营救出来的人,到延安后都需接受组织审查。每遇及此事,陈云总要在他们的谈话中,告诉他们需要审查的是哪些问题,要他们正确对待。1938年,有两个青年干部奉命回延安,以为是进学校学习,但到中组部后,陈云十分坦诚地告诉他们,有人说他们是托派,因此要对他们进行审查。他俩一听吓坏了,一面急着申诉一面哭起来。陈云和蔼地说:先不要哭,要相信党,事情总会查清楚的。过了两个星期,陈云又找他们谈话,说问题查清了,没有那么回事。这两人后来每当谈起往事,都连连称赞陈云对干部政治生命的负责精神。陈云还提出,要把中央组织部办成干部之家。中央组织部那时没有信访室,来

找陈云反映情况的，都是先到干部科谈，需要陈云会见的，再约时间来谈。但常有一些“不速之客”直接闯入陈云的办公室，这时，陈云总是放下手中的工作，认真地听来者的诉说，并耐心地解答问题。有几次，秘书看陈云确实太忙，想为陈云“挡驾”，都被他制止了。他解释说：“人家来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我来解决，我一定要会一会。”他对来访如此，对来信也如此。一般来信，他要把解决办法告诉秘书，重要来信，他还要亲自处理。

陈云不仅关心干部，而且知人善任。有一位干部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不少人认为他有点“酸”，看不惯。陈云知道这位干部工作不错，只是因为工作环境的关系，待人处事方式与延安不同罢了，因此要求中组部的同志，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位干部，改变过去动不动就生硬地从原则高度批评人的习惯。他亲自把这位同志安排到统战部门工作，使这位干部的长处得到了发挥。毛泽东在对八路军留守兵团负责干部讲话时说：部队高级干部要团结人，领导主要应当注意和发扬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方面，消极的批评和斗争少一点。发扬人家的长处，不要夸大坏处，这一点陈云同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陈云虽然主张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大胆使用各种人才，但同时又十分注意对党员和干部的严格要求。作为中央领导人之一，他常去各类学校讲党建理论课。他抓住入党誓词中“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这句话，层层剖析，说明做一个党员，不能只是信仰共产主义，还要为之奋斗；而要奋斗，就不能怕牺牲，不能有了困难就打退堂鼓，要奋斗一辈子，奋斗到死。他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切身问题。他说：我们在根据地的党是执政

1939年6月1日,陈云(右四)出席延安抗日军政
大学建校三周年纪念会并发表讲话

党,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忽略群众也要向我们
要东西,因此要时刻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为群众谋福利。他要求
广大党员都要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他提出,任何党员都必须自觉遵守党的
纪律,党内不允许有特殊人物,也不存在特殊组织。文化人
入了党,就要按党员的标准来要求,如果基本上是文化人,附
带是党员,那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有一位新
党员叫刘力功,组织上决定派他到基层锻炼,他不去,坚持要
上马列学院。经过批评教育,他虽然同意到前方,但一定要到
八路军总部工作,否则就退党。陈云主持中央党务委员会开
会,研究了他的问题,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公布全党。事后,
陈云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一文,指出:只有严格的
纪律才能保证党的组织的统一,所有党员,不管是中央委员还
是一般党员,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陈云的这一

原则态度,在处理王明违反中央规定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王明到延安后,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候补书记,飞扬跋扈。当时中央规定,综合性院校的毕业生统一由中组部分配,专业性院校的毕业生由中组部分配一半,由业务主管部门分配一半。王明兼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拒不执行中央的这一规定,要求把女大毕业生 75% 的分配权划归女大和中央妇委。陈云为此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不能同意他的要求,劝他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指出:“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1940年3月19日,
陈云为抗大五期
毕业生讲课
的手稿题目

延安的环境相对安定,是学习的好时机,陈云对此十分珍视。有一次,他同毛泽东谈话,说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泽东则说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建议他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同陈云谈话,还是强调思想方法的重要性。以后,毛泽东第三次同陈云谈话,仍然说:犯错误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听了毛泽东的话,陈云在中组部内成立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自任组长,副部长李富春任副组长。小组正式成员有部的秘书长和各科正副科长共十余人,其他 30 多位干部参加旁听,被戏称为“后排议员”。他们从学习马列原著开始,先后学了《共产党宣

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以及《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联共党史》等教科书,有的还学了《资本论》,以后又学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为了解决学习和工作的矛盾,陈云规定早上吃饭早一点,9点以前自学,每周用半天时间集中讨论。毛泽东很关心这个学习小组,特地派他的哲学秘书和培元来作辅导。先后为这个学习小组讲课的还有延安的一些一流教员,如艾思奇、吴亮平、柯柏年、王学文等。这个学习小组由1938年底起到1943年初陈云生病时为止,坚持了4年多,在1940年延安举行的第一届“五五”学习节上还被评为了“模范学习小组”。

抗日战争时期,
陈云在延安

除了在中组部领导学习,陈云还反复强调全体干部学习的重要性。许多老干部文化低,认为打仗“一冲就行”,学不学无所谓。陈云讲:“要有两冲,第一冲军事,第二冲政治。”为了提高大家对理论学习的自觉性,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与一部分老干部不愿意学习的情况相反,延安不少新干部中有一种风气,愿意“长期学习”而不愿意参加工作。对这种偏向,陈云也不赞成。他认为,革命家只能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如果把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长期放在学校学习理论,既学不到理论,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为此,他又在《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社论,题目为《到什么地方去学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延安时代,陈云就大力倡导干部学习专业知识。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时,他到会祝贺,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共产党对于自然科学是重视的。科学要大众化,要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并与全国自然科学界取得联系。

1940年,陕甘宁边区发生春旱和秋寒,使粮食生产受到影响,特别是国民党于1941年初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使经济上的困难更加严重。于是,各边区陆续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那时,边区的各党政机关、学校、部队都要搞生产自给,中组部的荒地分在山上,陈云因为工作忙,加上身体不太好,上不了山,就在中组部驻地坡下的菜园里种菜。为了使庄稼长得好,他发起积肥劳动。开始,有些人不愿挑大粪,陈云就带头去挑。消息传开后,许多大学生争相加入积肥行列。《新中华报》报道说,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在第一次生产检查中,表扬陈云亲自参加积肥劳动,他领导的中央组织部积肥最早也最多。到了秋收时节,《新中华报》又报道说,中央组织部收获谷糜五十石,完成了当年生产计划。1940年初,边区政府同中央机关召开总结、给奖大会,陈云与毛泽东等人被评为了特等劳动英雄。到了1941年,中组部不仅超额完成了粮食生产任务,还办了杀猪厂、木工厂、织布厂、运输队和一个食堂,机关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一周可以吃到两次馒头和一两次猪肉。

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学习。其间,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组长的

学习研究组，陈云也是成员之一；同时还成立了高级干部参加的高级学习组。10月6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把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组扩大到250人，由任弼时、康生、陈云、李富春共同确定学习组名单及阅读各种文件的人员名单。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又决定成立以陈云为首的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1942年4月3日，中央成立了五个系统的分区学习委员会，其中军委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同时由王稼祥、陈云、李富春等九人组成了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各工作部门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与生活制度等问题，提出改进方案。5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的总学习委员会。6月8日，整风运动随之开始。整风学习文件共有22个，陈云在1939年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被列入其中。后来，这篇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并被印成单行本。

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出版发行的陈云撰写的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四种版本

在整风运动的同时,鉴于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自首和特务政策,特别是发现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计划地向陕甘宁边区派出特务,中央自1942年冬季开始进行审干,并于1943年3月决定把审干作为当年的中心工作之一,委托中央社会部拟定对有证据和重大嫌疑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监禁或监视的办法。接着,中央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对特务渗入的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在中央书记处之下成立了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具体由兼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负责。康生认为共产党内“特务如麻”,中组部在审查干部上右了,指责说:“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是怎么搞的?”7月份,他在中直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审干发展为“抢救运动”,造成许多冤假错案。1944年春,中央对错案进行了甄别平反。

1943年初,陈云得了心脏病,加上他在干部审查问题上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与康生的截然相反,所以从那时起便实际上离开了中组部,专事休养。毛泽东为了便于陈云恢复健康,特意安排他搬到枣园居住。在养病的一年时间里,陈云仔细研究了毛泽东的著作和为中央起草的文电,感到贯穿其中的基本思想是实事求是。为了弄清“实事”,他概括出了6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是指和其他人交换意见,既听下面意见,更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是指把各种情况进行前后左右的比较。所谓反复,是指问题初步决定后,再摆一摆,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听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也要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通过这些方法,尽可能做到全面认识事物,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同时,他还提出了9个字,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在晚年向人解释这几个字时

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

1943 年底，陈云与毛泽东、林伯渠参观了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展览会。此后，中央决定派陈云到西北财经办事处，担任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西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于 1942 年年

1943 年 12 月，陈云同毛泽东、林伯渠参观
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展览会

中，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西北两个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办事处主任是贺龙，实际工作由陈云主持。陈云在工作中十分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当时，边区布匹、棉花一半以上需要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口，为此必须向国民党统治区出口才能换取在那里流通的法币。但边区经济落后，能够出口的东西很少，所以经常处在入超状态。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决定改变原来外贸分散经营的方式，对重要的出口物资特别是盐，实行统购统销，对主要的进出口口岸实行统一管理。1944 年关中平原新棉上

市时,陈云指示各口岸统一提高棉花收购价格。这一招果然灵验,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原本是要防止货物流入边区的,可是为了赚钱,却让士兵背着棉花到边区来卖,有些一夜背三趟,封锁线变成了“转运站”。

在金融工作中,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是货币发行问题。陈云对边币发行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提出货币发行“不要冲破饱和点”的原则,即货币发行要待流通的实物相平衡。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实际工作中,为边币发行量找到了具体的限度。金融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边币与法币的关系问题。边币是“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发行的独立货币,但有人以为只要靠政治手段就可以使边币彻底脱离法币,从而保持边币的“独立性”。陈云认为这种愿望很好,但并不可行。他认为,既然边区经济离不开进出口,也就离不开法币;既然边区经济落后,存在一个很大的进口需求,边币也就只能跟着法币走。他对两种货币比价与进出口商品物价之间的变动关系作了细致分析,提出边币币值不能稳定在物价上,而只能稳定在与法币比价上。陈云还提出要利用法币贬值的时机,提高出口货物价格,出口黄金,买进法币,少进货物;利用法币升值的时机,抛出法币,买进物资和黄金,使边区政府从中赚取了大量差价,以充实银行的准备金,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奇迹。

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期间,陈云领导财经办事处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又提出了留有后备的财政方针。他在1945年2月召开的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提出财政工作的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在保证需要方面,他提出的方针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

三。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边区工农业生产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金融物价趋于稳定,进出口贸易达到了平衡,政府积蓄了充足的物资,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开辟新解放区、扩充部队、增加装备,奠定了坚实的家底。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陈云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字紧排在毛、朱、刘、周、任之后。陈云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对他在延安时代主持过的两方面工作发表了意见。关于组织部的工作,他说: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

陈云同贺龙在中共七大主席台上

一股骄气。这些人之所以骄傲,是因为看到自己有功劳。对功劳应当怎么看?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个是党的领导,第三个才轮到个人。个人有没有作用呢?有作用,有时还有很大的作用,但却不能把个人作用看过了头。关于经济工作,他指出:现在我们就转到城市了,但部队走的时候,要注意防止把东西糟蹋了、浪费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劳动创造的,所以要把农村家务保存好。将来进城,没有机器恢复经济很困难,所以要把城市的机器保存好。毛泽东在

七大讲话中,当讲到中国革命胜利后将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时,对陈云关于保存机器的提议十分赞赏,要大家一定记住这一点。

就在中共七大开过两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然而,两种命运、两个前途重新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一个新的使命又在等待陈云去完成。

第七章 转战东北

为了欺骗国内国际舆论，也为了争取时间，以便将远在大后方的军队空运、海运到华北、华东、华中和东北，蒋介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的真诚愿望，为了戳穿蒋介石的诡计，毛泽东决定飞往重庆。临行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在他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早在8月下旬，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就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派出部队挺进热河和东北，从日伪手中解放了山海关，并于9月6日进驻沈阳。由于苏联政府此前根据雅尔塔协议，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苏联要将东北主权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同时也明确了苏联在东北享有的特殊权益，因此，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自己的代表卫斯别夫上校前往延安，向朱总司令转达口头通知，要求八路军在苏军退出前不得进入东北，已经进入的部队要退出苏军占领的地区。他们过去没有和八路军联系过，所以要冀热辽军区进驻沈阳的部队长曾克林随机一同前往延安。9月14日上午，飞机在延安降落。下午，刘少奇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晚上又讨论了答复马利诺夫斯基口头通知的问题和全国军事部署问

题。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最后决定成立由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组成的东北中央局,以彭真为书记,立即赶赴东北开展工作,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原来准备南下的10万部队2万干部,也转为挺进东北。为了使东北局领导人与驻东北的苏军打交道方便,还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中将军衔。

散会后,陈云稍事准备,即同彭真、伍修权、叶季壮等人一起,趁天未亮,上了苏军返航飞机,向东北飞去。中午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时,飞机滑出了跑道,一头扎在旁边的稻田里,陈云由座位上被推进驾驶室,幸好未伤。9月17日晚,他们一行乘火车前往沈阳,中途在皇姑屯换乘汽车,于次日清晨进城,下榻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陈云同彭真等一到沈阳,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会见冀热辽军区所部先期到达东北的领导干部,听取随苏军返回东北的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等人的汇报;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布置当前的工作;与关内

各个根据地来的干部谈话,分配他们到各地建立领导机关、掌握当地政权、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的任务;安排人员接应渡海而来的八路军山东部队,筹划部队的战略分布。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陈云初步掌握了东北的实际情况和苏方的基本立场,并在10月9日东北局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谈了对东北形势与党应采取的方针的初步看法。他说:帝国主义是不会叫我们平安占领东北的,蒋介石的军队和美国人是

一定要来的。苏联会支持我们,但要在不影响其和平政策的前提下。我们的斗争利于持久,不能轻易进行没有把握的决战。要利用苏军尚在东北的有利条件,迅速打击国民党的内应势力,迅速扩兵。

随后,陈云根据中央关于要加强北满工作的指示,离开了沈阳,先在长春住了一个月,建立了党在吉林、合江(今属黑龙江省)两省的领导机关,通过苏方搞了一大批关东军的武器弹药;接着便去哈尔滨,根据中央指示,组建了中共北满分局,任分局书记。此时,由美国军舰运输,国民党的两个军已在秦皇岛登陆,占领了山海关,正沿北宁线攻击前进。国民党担心东北的大城市落入中共手中,一方面要求苏军暂缓撤军,一方面在美国帮助下加紧向东北运送部队。而苏联碍于国际条约的限制,通知中共方面退出中长路沿线及各大城市。

11月21日晚,陈云就能否不退出哈尔滨问题,与苏军驻哈市卫戍司令卡扎科夫中将进行了最后的交涉。次日,他致电彭真和不久前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林彪,说苏军要我们撤到城外,但仍要我领导机关、地方干部、警察留在市内工作;我们的方针仍然是将主力部队和军事干部分散到各县,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肃清土匪,建立政权,同时在全市争取群众,孤立国民党,以造成重入哈尔滨的条件。随即,他率中共北满分局、松江(今属黑龙江省)省委、松江军区机关人员,携带各种重要物资,撤到了哈尔滨以东50公里的宾县,将分局机关设在一所教堂里。

就在陈云撤出哈尔滨的同一天,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一封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的电报,其中说:彭真、林彪来电告,苏方要他们退出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他们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

陈云在宾县住所

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指示精神与陈云的思路完全吻合，因此，他同刚刚到达哈尔滨参加北满分局工作的张闻天、高岗交换了意见，由他主持起草了以他们三人名义致东北局并转中央的电报。电报指出：苏联对满洲的政策是既要把大城市和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又要援助我党的发展，因此，由我独占满洲的可能性没有，要在满洲占优势，还须经过艰苦斗争的过程。我们基本方针应该是，在集中必要的武装打击锦州、沈阳前线的国民党部队的同时，迅速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分散到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建立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外围及其铁路干线两旁广大的巩固根据地。由于电文较长，电报在 11 月 29 日、30 日分两次发往中央。中央在收到第一天的电报后即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后来，毛泽东就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又询问了一些在东北的领导干部的意见，于 12 月 28 日为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指示电，明确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的城市和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重

心是以清算汉奸、减租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工作，并要将正规部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方针既定，陈云放开手脚，领导了创建北满根据地的斗争。

开展剿匪斗争，是创建北满根据地的重要一环。中共进入东北初期，由于缺乏经验，收编了一部分土匪武装。结果国民党一来，这些“明投八路，暗投中央”的土匪纷纷叛变，成为根据地的心腹之患。陈云一到北满，便着手抓剿匪工作，认为这是在苏军未撤而蒋军未到时，北满决定胜利的关键。1946年初，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下辖东满、南满、北满军区，陈云任北满军区政治委员。当时，北满军区中只有两个半“老连”。为此，他不断建议东北局派主力部队迅速北上，并不断催促接受北上任务的359旅和山东第7师昼夜兼程前进，说他们“早到一天，对北满形势及部队本身发展关系极大”。到了1946年4月，北满地区大股顽匪的大部分均被消灭，嫩江、龙江、合江、松江、牡丹江五省（今分属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绝大部分县城都被东北民主联军掌握。

除了剿匪外，创建北满根据地的另一项关键性工作是发动农民群众。那时，在东北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头脑中，以国民党为“正统”的观念很深，而对共产党则缺少认识。因此，陈云在北满分局的各种会议上反复告诫干部：国民党绝不会满足于接受三大城市，他们一定要独霸全东北，一定要用武力消灭我们。我们现时的力量比国民党弱，要在东北站住脚跟，必须依靠东北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而要使农民认识我们，就要给他们实际的利益。基于这一认识，他向各省发电，询问最能发动群众的口号是什么；还向木兰、通河、方正三县派出民运工作团，摸索发动群众的经验。经过调查研究和总结经

验,陈云提出:要在一段时间里集中使用关内来的干部,以便尽快培养出本地干部;在乡下要住贫苦农民的家,学习群众方言;要产生当地的群众领袖,推动群众起来自己干;要通过斗争从经济上削弱、政治上打垮旧的政治势力,清算出的财物要迅速分给群众;对手无寸土的季节零工,减租减息不解决问题,增加工钱也非实惠,关键是要把日伪统治时期的开拓地、满拓地分给他们。通过这些措施,北满的广大贫苦农民被充分发动了起来,他们积极组织民兵,并踊跃送子当兵,以保卫胜利果实。

就在陈云领导北满军民建立根据地之时,国民党军沿中长路步步向北推进;而东北局自从沈阳撤出后,也随东北民主

1946年,陈云(左四)在中共中央东北局、
东北民主联军高级干部会议上

联军主力步步向北转移。1946年4月,民主联军主力在四平打了一场恶仗,暂时把国民党军阻挡在了四平一线,但终因敌众我寡,在牺牲了8000人后,主动撤出了战斗,迅速移至松花江以北;东北局亦于5月下旬由长春迁至哈尔滨。此前不久,

苏军按计划从哈尔滨撤出，北满部队顺利进占了哈市。以后很长时间里，松花江成了国共双方的实际控制线，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国民党军始终未能越此雷池一步。

东北局机关迁入哈尔滨后，同北满分局合并。6月中旬，中央决定林彪为东北局书记，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并以他们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为了进一步统一东北全党的思想认识，东北局常委会议委托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稿，提交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7月7日，东北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故又称“七七决议”）。决议针对一部分干部由于国共双方达成了在东北暂时停战的协议而产生的侥幸取得和平的思想和迷恋城市的思想，指出要准备长期艰苦奋斗，肃清强调城市轻视农村的观点，克服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号召广大干部“走出城市，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去”。这个决议经中央修改后批准，成为中共领导东北解放战争的纲领性文件。由于它的传达贯彻，1.2万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使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大大前进了一步。

扩大会议结束后，东北局决定设立东北财经办事处，作为东北解放区经济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由陈云任主任。工作刚刚开了一个头，军事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位于辽宁和吉林东部的南满根据地告急。原来蒋介石为了和共产党争夺东北，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集中8个师十多万人的兵力，于10月中旬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大举进攻。这时，在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只有三纵、四纵两个纵队和两个独立师，合计4万余人，敌我力量悬殊，不得不放弃安东、通化等重要城市。到了11月中旬，南满根据地只剩下临江、长白、濛江、抚松、

1947年，陈云同萧劲光在临江合影

辑安(今集安)5 个小县,形势十分危急。东北局意识到,如果南满丢了,不仅可以使敌人集中兵力对付北满,而且将使东北解放区失去与关内的海陆交通联系,故决定成立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以加强南满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力挽狂澜于将倒。陈云考虑,南满得失关乎东北全局,意义实在重大,所以自告奋勇前往。东北局经过请示中央,决定任命他为南满分局书记,并由萧劲光和他分别担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0月31日,他们乘一列火车,由哈尔滨出发,取道佳木斯、牡丹江、图们、平壤前往南满。当他们绕了一大圈,到达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时,已是11月27日了。

陈云、萧劲光一到临江,立即找干部谈话,了解大家对形势的看法。当时,由于部队不断的撤退和根据地的日益缩小,大多数干部情绪低落;南满部队领导为防万一,做好了主力部队继续撤退到北满的准备,更使人心浮动。在一次为祝贺朱德

60 大寿的干部集会上,陈云发表讲话,分析了当前不利局面中的有利因素和历史的大趋势,鼓舞大家的斗志。随后,他召开了南满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宣布了南满分局领导成员的分工,传达了党中央、东北局对南满工作的指示,要求干部无论来自哪里,也无论先到后到、有无部队,都必须团结一致。鉴于根据地太小,难以作战,陈云提议派一部分主力部队到敌后,创造游击根据地。

为了贯彻南满分局的决定,萧劲光于12月11日在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七道江召开了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在主力部队去留问题上发生了两种意见的争论,两三天没个结果。而这时国民党军3个师正在集结,准备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形势不容这种争论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于是,萧劲光给陈云打电话,请他亲自出马,拍板定夺。当时,陈云正患感冒,听说此事,立即坐上火车,由临江连夜赶到七道江。到后,他顾不得休息,与两种不同意见的干部分别谈话,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一直谈到凌晨3点。

第二天会议一开始,陈云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做了?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大家讲完后,他说:同志们要我来拍板,我就拍这个板。我们不走了,一个人也不走,留下当孙悟空,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接着,他深入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劣和主力去留的利弊。他说:东北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朝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下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牛尾巴是关键。坚持南满,可能使我们损失一半人,甚至四分之三,但可以使南北满保住犄角之

势，牵制住敌人4个军，使他们不敢放手进攻北满。相反，向北满撤，部队在过长白山时要损失几千人；撤到北满，敌人追过来，还要打仗，又要损失几千人；而且失去了南满，北满也保不住，部队还得继续往北撤，撤到了苏联境内，早晚有一天还要打回北满，打到南满，那时，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要损失几千人。另外，主力走后，留下的部队和地方武装，也会受到很大损失。前前后后加在一起，损失的人也不少。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然后，他又从敌情、我情、军情、民情和全国与东北的形势等几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坚持南满的可能性，使在座的人心悦诚服，异口同声表示不走了。就这样，要不要坚持南满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的问题是，由哪支部队担负深入敌后的任务。四纵领导人表示，尽管他们有不少困难，但如果需要，他们愿意去。陈云一听，马上表态同意，并问他们有什么困难。他们提出兵员不足，缺少冬衣，不久前新开岭战役的俘虏尚未安置完等等。陈云表示无论需要什么，首先保证他们，并当场向有关同志作了交待。至此，七道江会议取得了圆满结果。事后，有人把陈云在会议上下三个决心称作“三槌定音”。

会后，陈云为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领导人连续起草了致东北局的电报，汇报了南满准备打烂坛坛罐罐、吸住敌人、使之不能北进的决心与军事部署；同时建议北满出兵南下，相互配合，粉碎敌人进攻南满的计划；请求北满支援一万吨粮食，并为南满部队输送新兵。1947年1月5日，北满部队集中3个纵队和3个独立师的兵力，越过冰封的松花江，向长春、吉林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南满部队由于大踏步深入敌后，和敌人打运动战，加之南北满相互配合，南拉北打，使敌人顾此失

临江军民夹道欢迎从前线归来的人民子弟兵

彼，不仅四次击败了敌人优势兵力对临江的疯狂进攻，而且在不到半年时间里，相继收复了辑安、通化、安东，恢复并扩大了南满根据地的地盘。这一胜利扭转了东北战局，改变了敌进我退的态势，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全面反攻奠定了基础。

在四保临江的过程中，萧劲光在前方指挥打仗，陈云在后方主持地方工作，一方面积极做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努力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在战斗吃紧时，陈云和萧劲光都解散了自己的警卫班，身边只留下一两个警卫员。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情绪，陈云多次召开南满分局会议，从端正思想方法、健全党内生活等角度，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他在会上讲到要避免思想上的片面性时，再次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的六字诀。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感到有困难的，决非在人事，这我完全可以对付，困难在于军事，我毫无经验。发生争论时，我无从说话，必须弄清事实，弄清利害，才能下决心。本来懂得军事的人，有许多问题是常识问题，但对我来说，却非下大力去摸不可。这件事比在北满不知苦多少倍，尤其因为军事常常逼在眼前，非迅速决定不可，

1947年8月,陈云(前排右二)在通化同
中共中央南满分局、辽东军区领导人合影

而且我不能不管。但勇气是有的,现在正鼓起勇气来补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所未上的课。”事实说明,这一课,陈云补得很认真,也很有成效。萧劲光在回忆录中写道:敌人第四次向临江进攻时,我军由于连续作战,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形势很严重,又产生了怎么打的问题。陈云主持召开分局、军直干部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认为无论战争多么残酷,也要打下去。陈云“反复问大家,对这样的决定后悔不后悔。大家一一表态‘不后悔’。于是,他诙谐地一拍桌子说:‘我们学上海交易所的规矩,(拍板)成交了。’”

陈云在主持地方工作时,最为重视的是土改工作。在他看来,这与战争的胜负有着直接关系。因此,他考虑,在敌后首先是保护当年分地所得之粮,使农民增加对土地斗争的决心;其次是解除国民党来后的一切压迫;再其次是要农民在明年种上所分土地。1947年夏,南满分局组织了2000名干部,连同北满派来的4个工作团一起下乡,开展大规模土改运动。早在

陈云由北满赴南满途中,他就土改运动中一味求快、造成“半生不熟”,即积极分子成份不好,群众未真正发动起来,假清算,假分地,地主虽然被打倒但在心理上仍统治群众等问题,给东北局写信,提出这类地区的土改要重搞。东北局接受了这个意见,于1946年底发出《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的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把“夹生饭”煮成“熟饭”。所以,南满在大规模土改初期,采取点点前进、求透不求快的办法,运动进行得比较稳。但后来,当群众有了八路军好、国民党军坏的经验后,情绪普遍高涨,迫不及待地请工作团去;同时,南满在久战之后,也亟待补充兵源和动员群众支前。在这种情况下,运动速度加快,一方面大部分地区分了地,10万农民报名参军,另一方面出现了“左”的错误,如一些地方没有巩固地团结中农,对佃富农与旧富农未加区别,把富农与地主一样对待等等。这些问题,在东北其他地方以及各解放区也有程度不同的发生,对此,中央给予了及时纠正。关于南满土改中的错误,陈云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80年代,有关部门在编辑他的文选时,他坚持把这篇报告收进去,充分表现出他不粉饰、不委过的高风亮节。

1947年底,陈云在圆满完成了坚持南满的任务之后,回到了哈尔滨。在此之前,东北局为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已成立了以陈云为主任的财经委员会。陈云回到哈尔滨后,着重抓了6项工作。第一,纠正忽视城市工作特别是生产工作的倾向。在一份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他明确指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第二,纠正新接收企业中只重视工人、忽视职员、甚至不加区别地乱打击职员的“左”的倾向。为此,他在1948年二三

月份召开的东北职工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以后又在七八月份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国营企业职工问题的决定》。第三,纠正正在粮食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禁止粮食自由流通的错误做法。第四,解决工业生产缺乏计划性的问题。根据他的建议,东北局决定制订 1949 年年度计划和 1949 年及 1950 年的两年计划。以后,他把很大精力用在了对这两个计划的制订上。第五,纠正制定工资标准中的平均主义现象。第六,纠正不按经济办法管理企业的倾向。他指出,在国营、国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工作中,主要是贯彻企业化原则和实行管理民主化。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一定要有经济核算,要考核成本,计算原料和机器消耗。他说:“我们解放区的同志只会当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我们干革命是内行,但办工厂是外行,这就需要向内行的人学习。”

辽沈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大会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并选举陈云等⁵³人

1948年9月,陈云在吉林省陶赖昭
松花江大桥典礼上讲话

为执委会委员。大会之后,陈云在执委会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此后不久,长春宣告解放。为了使北满的部队、物资更快捷地运往辽沈前线,东北野战军工程部队在苏联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修复了松花江上的陶赖昭铁路大桥。10月24日,陈云在大桥通车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就在陶赖昭通车典礼之后的第4天,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最后一支重兵集团廖耀湘兵团被全部歼灭。这样一来,沈阳解放便是指日可待的事了。沈阳是当时新解放城市中最大的一座,能否接管好,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考验。10月27日,东北局常委会决定委派陈云为全权代表,负责接管沈阳的工作,并组成以陈云为主任,伍修权、陶铸为副主任的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第二天召开的军管会会议上,陈云就接管的方针、任务、方式、方法、应注意事项等,讲了半个小时话。他指出,接收的原则是自上而下,按照系统,统一接收,一切财

产、物资、人员、文件均原封不动，先接收，后分配。军管人员要兢兢业业，把接管工作当作是“进京赴考”。沈阳有美、英、法领事馆和记者，对他们要采取慎重而适当的政策。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但不是把他们一脚踢开。要对工厂职工和公教人员、城市贫民发放生活维持费、救济费，允许中间派报纸继续出版，让旧警察在缴械后继续上岗维持秩序。随后，他率领从各部门

沈阳各界人民群众集会，庆祝全东北解放

抽调的 4000 余名接收人员，乘火车离开哈尔滨，于 11 月 2 日进入沈阳。由于准备工作做得细，接管工作非常顺利。工厂、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房屋、设备器材、仓库物资一般没有遭到破坏。进城第二天就通了电，第三天电话全部接通，第四天与外地的邮政通信恢复正常，第六天各系统接收工作基本完成，市场开始营业，工厂纷纷开工。不到一个月，接收工作全部结束。11 月 28 日，陈云将上述做法及对接管工作的一些设想电告东北局并报中央。中央认为这个经验甚好，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阅读，并要求各战略区按照陈云的提议，事先准备好接收大城市的工作班子。

1948年11月底,东北野战军80万大军启程,分三路入关。行前,陈云为他们筹集了30万吨粮食,相当于每人700余斤。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陈云即乘毛泽东号机车牵引的火车赶赴北平,与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薄一波开会,商讨东野入关后的后勤供应等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由西柏坡致电东野总部,请罗荣桓前去面谈,并说如果陈云的会议已完,则请同来一叙。会后,陈云与罗荣桓一行分乘数辆中型吉普车前往西柏坡。这是自1945年9月离开延安后,陈云第一次与中央书记处的同志相聚,大家见面后分外高兴。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第一句话便说:“四保临江啊!”周恩来问起粮食问题,陈云表示,除东野进关时带走的30万吨,还准备了20万吨,以备平津两市的急需。周恩来听后甚为满意。

当时,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中央正在酝酿成立一个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财经委员会。派谁挂帅好呢?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了陈云,当即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当书记处就此作出决定后,周恩来通知陈云,要他回东北,把工作交待一下,尽快来中央工作。陈云回到东北后,除加紧组织制定东北全区1949年经济计划外,又在沈阳以及鞍山、抚顺等十余个城市,进行了工矿企业的调查。陈云考虑,调到中央后,再来东北就不那么容易了,想利用还没离任的机会,多了解一些东北特别是新解放城市的工作情况,故此耽搁了去北平的时间,以致周恩来几次打电报催他。

1949年5月上旬,陈云完成了东北1949年经济计划草案的审议,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路途。

第八章 初试锋芒

1949年5月14日清晨，陈云抵达北平，住进北长街一所年久失修的二层小楼。由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尚未成立，所以他先通过原有的中央财政经济部抓工作。一些老熟人问他，进关以后打算怎么干？他的回答很谨慎，也很平淡，只说了一句：“安下地盘后试一试。”然而正是这一“试”，“试”出了全国的物价稳定、财经统一，“试”出了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

5月31日，上海解放。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会议，宣布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财委。早在年初中央决定由陈云主持中财委之后，毛泽东就当面向薄一波提出，要他到中财委任副主任，协助陈云工作。薄一波表示愿意，说这样能多学习一些东西。

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了中财委成立会议。接着，他又在中财委第一次全体干部会议上讲了话。

刚开始，中财委只设立了计划局、统计局、劳动局、合作事业指导局、私营企业管理局等几个部门，组建了以内地调剂为主的粮食、花纱布和以出口为主的猪鬃、土产等10个公司，外加一个进口公司，机构、人员短小精悍。为了使各中央局和各大区财委、各中央局和野战军的负责人及时了解全局情况，他建立了旬报制度。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还建立了集体办公会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
中财委)成立时的合影(前排左六为陈云)

议制度。为了胜任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重担,他除以原中央财经部和华北财委的部分干部组成中财委的班底外,还以“不拘一格”和“五湖四海”的方针,从各大区、党内外选调各种精通专业知识和有经济管理经验的人才。例如,计划局的局长副局长一共七位,局长宋劭文是华北调来的,副局长朱理治、曹菊如是东北调来的,杨放之是华北调来的,而孙越崎、钱昌照和孙晓村则是党外民主人士。他认为著名化学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侯德榜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请侯担任了中财委高级技术顾问。在他的一再敦促下,著名经济学家、浙江大学校长马寅初也担任了中财委的副主任。他还推荐章乃器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在中财委内留用了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 15 位高级专家。

在中财委的班子搭起来之后,陈云受中央委托,于 7 月 19 日前往上海,一方面调查和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另一方

上海解放前夕，市民用自
行车带着一捆金圆券去
采购日用品

面在那里召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领导干部开会，研究解决全国的财经问题。当时，通货膨胀自 1937 年开始，已在中国肆虐 12 年之久。到 1949 年 5 月前，上海物价指数同 1948 年 4 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时相比，竟上涨了近 14 万倍，纸币几乎变成了废纸。与此同时，为了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军要继续向全国进军；为了稳定人事，人民政府要接受大批旧政权的公教人员，救济灾民和

失业的工人、知识分子；还要拨出经费抢修铁路，兴修水利，提供生产贷款等等。这使中央财政支大于收，不得不超量发行货币。然而，更大的挑战还是来自国民党和投机资本对新解放城市的捣乱与破坏。国民党倚仗美国的支持，用军舰对大陆口岸进行严密封锁，并不时出动飞机对大城市进行轰炸。搭载陈云一行的专列在临近上海时，就遭遇到国民党飞机的骚扰。对新中国本来就抱有敌意的帝国主义在一旁幸灾乐祸，同情新政权的国内外朋友对收拾这个烂摊子缺少信心，投机资本家则想乘此机会与共产党较量一番，大捞一把。他们说：“共产党军事上 100 分，政治上 80 分，经济上打 0 分。”因此，能否治住通货膨胀这匹脱缰的野马，成为对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的严重考验。陈云通过成功指挥“银元之战”、“棉纱之战”、“米粮之战”，彻底打垮了投机资本，向世人宣告，共产党人不

仅能够打天下,也能够坐天下。

“银元之战”是在陈云赴上海之前,坐镇北京指挥的。解放军占领上海后,以1比10万的比例,用人民币收兑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但在收兑工作结束后,人民币却没有真正成为市场上的流通币,取而代之的是银元。原来,上海的投机资本利用居民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心理,任意抬高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在短短十天内竟上涨近两倍。商家纷纷用银元标价,人民币被拒收,形成人民解放军能进城而人民币进不了城的局面。为了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市场,上海市人民政府不得不抛售10万银元。但这些银元被投机势力悉数吃进,没起作用。接到华东财委的报告后,陈云于6月8日签发中央财经部致华东局、华中局电,指示他们严厉打击银元投机活动,明令禁止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流通,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和税收一律收人民币,通过各人民银行检验资金。华东财委和上海市政府先通过报纸、广播电台发表社论和领导人讲话,要求投机分子立即停止犯罪活动。在规劝无效的情况下,上海军管会于第三天派出军警,一举查封了投机分子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与此同时,上海方面采取了电报提出的各项经济措施。不出一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银元之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投机资本的活动很快又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从6月10日到7月21日的一个多月中,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与此同时,上海工商界面临原料缺乏、资金短缺、销路呆滞、企业亏损、劳资双方关系紧张等一系列严重困难,停工歇业的工厂竟占工厂总数的20%多。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更是放出谣

言,说什么“中秋节要回上海吃月饼”,“春节要来上海吃年夜饭”,扰得人心惶惶。陈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7月22日抵达上海的。他一到,首先调查了解情况,随后于7月27日至8月15日,主持了有五个大区财委干部参加的财经会议。

会议分为四个小组,即综合组、财政组、金融组、贸易组,集中研究克服当年财政困难和保证上海重要物资供应的办法。会议期间,陈云作了重要讲话和总结报告。鉴于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封锁,棉花等原料供应不上,有人主张将上海的纺织厂搬到内地。陈云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但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全封锁死。从香港、天津、大连、满洲里可以出口,广州解放后还可以从那里出口;帝国主义之间也有矛盾,你不做生意,他要做生意;即使纱布出不去,还可暂时囤积起来。至于棉花,只要把外地的存棉运来,并组织好收购工作,是可以解决的。另外,纺织厂的搬迁并不那么容易,要有厂房和动力、机械等辅助工业为条件,不能因为暂时有困难就搬走了事。所以,会议决定不搬厂,全力维持生产。

上海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粮食供应问题。当时上海有550万人,每天需粮400万斤,缺140万斤,是靠市民自己的储备米补充的。陈云指出,常州以西、芜湖以及皖北的早稻已经下来了,价格比上海低,如能运来,再过40天,上海的粮食就可接上。为预防这些地区的早稻不能及时运到,还准备从东北、华中等地调来1.2亿斤粮食,9、10两个月各6000万斤。针对常州、皖北等地以“粮食运走了,农民没有粮食吃”、“粮食会涨价,有害国计民生”等为理由而禁止粮食出境的情况,他要求各地一定要开放粮运,让粮食自由流通,以维持上海的供应。他说:“天下没有那样傻的农民,把粮食都卖光,自己等着

饿死。”

上海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运输问题。当时从外往里运的东西多,主要是煤、粮、棉,其中最大宗是煤炭;由里往外运的东西少,主要是纱布、纸烟等。而铁路的蚌埠至浦口一段,每天只能开十四五对列车,除设备本身的问题外,还有为防空袭而避免列车过分集中的原因;河运的大轮船都拨出去供解放台湾用了,剩下的主要是小轮船和木船。因此,陈云指出:“现在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来。”后来,他把解决上海的问题形象地概括为抓住“两白(粮、棉)一黑(煤)”。为此,他提出了要列车缩短徐行和错车距离,加添错车点,放长支线,增加通讯设备等提高铁路运力的措施,以及要花钱多造些船的意见。

关于克服全国财政困难的问题,陈云认为首先必须明确,解放军的军费以及与军队作战有关的开支要保证;旧政权的人员要接受,不能裁减。那么,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剩下来的办法只有两种,一是继续发票子,二是发行公债。陈云指出:“多发票子,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实际上有钱的人并不保存很多的现钞,吃亏最大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人。”而少发票子,就得发公债。陈云提出发行 240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1.2 亿银元公债的主张。他说:这个“数目并不算多。蒋介石剩下那么一点地方,还要发行 2 亿银元的公债。”当然,公债要折实,以牌价为准,分三年还清。

上海财经会议制定了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方针,对于解决上海的物资供应和全国的财政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会议结束以后,陈云继续在上海逗留了十天左右,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分批座谈财经问题,征求他们对发行公

债的意见。离开上海那天，他还到上海市总工会筹委会扩大会议上讲了话，着重分析了如何正确对待私营企业的问题。他说：私营资本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现在，国营企业中的工人是主人，已经没有了剥削。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一方面仍受剥削，另一方面又是新中国领导阶级的一分子。因此，他们有权利要求实行劳资两利，但也有义务遵守劳资双方订立的契约和政府保护私营企业的法令，努力完成生产任务。他指出：有些工厂可扶可倒。“有人说：‘倒就倒吧，迟倒不如早倒。’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工人来说，在业无论如何苦，总比失业好。对那些一定要倒的工厂，工人、工会、资本家要好好协商，如何协助失业工人渡过困难。”

建国初期的陈云

上海财经会议之后的两个月，全国物价相对比较平稳。但陈云清楚，投机分子正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而财政赤字很大，还要增发货币，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根本稳住物价是很难

的。10月3日,在即将大规模发行货币之际,陈云报告中央:今后物价有发生剧烈跳跃之可能。果然,从10月15日起,投机资本在囤积了大批粮食、纱布以后,在上海、天津再次发动了一场涨价风潮,并迅速波及华中、华北,进而导致全国物价猛涨。面对物价涨风,陈云电示东北,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到北京,要求他们保证每天发一个列车。到11月13日,陈云认为全国平均物价比7月底上涨近两倍,已有稳住的可能,于是起草了一份电报,要求各地采取紧急措施,全力稳住物价。电报共提出12条措施,其中主要是:调运集中粮食、纱布,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然后于11月底12月初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收缩银根,各大城市开征税收,暂停除中财委和各大区财委批准之外的一切银行贷款、工矿投资和收购资金的支付,迟发地方经费半月或20天,叮嘱部队后勤不得将军费投入商业活动;为教训投机商人,在抢购风盛时,乘机抛出冷货呆货,待他们吐出主要物资时再乘机买进。电报写好后,当晚上报中央。周恩来阅毕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毛泽东看到后,当即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于是,电报发往了各地。

11月底至12月初,中财委一声令下,国营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城市一齐大量抛售粮食、纱布等主要物资。投机商开始不知是计,大量高价吃进,但随着国营公司的货物越抛越多,价格越压越低,才感到大势不妙,只好以低价向外抛售。这时,国营公司反过来买进,大批投机商因无处借款,资金周转不灵,纷纷破产,有的甚至跳楼自杀。上海资本家事后表示:“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

训。”这次成功的战斗，史称“米棉之战”。

10月涨价风潮被稳住后，陈云对通货膨胀问题依然穷追不舍。他认为，问题的中心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有人要求少收税，又要求物价稳。陈云说这办不到，因为少收税只能多发钞票，多发钞票物价就会涨，两者比较，还是多收税为害小些。还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可以刺激生产。陈云回答：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因为物价波动大，任何人也不愿拿出钱去经营工业，资金都囤积在物资上，劳动者也跟着没活干，这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另外，他认为投机资本还有力量，它们突击的将是沪、京、津三地，突击的物品是粮食和纱布。为了应付春节后商店开张时的涨价风，必须对粮、布两项预有对策。他指出：“粮食、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之大小。”由于上海存粮太少，不到一亿斤，陈云提出，要设法从苏、皖、浙和东北、华中、西南加紧调运稻米，力争在春节前存米达到4亿斤。不出陈云所料，投机商在春节前又大量购进粮食，使物价上涨了近一倍。他们盼望着春节后开市大捞一把，但万万没想到，正月初五“红盘”开出，粮食价格不仅没涨，反而大幅度下跌。原来，上海提前增设了许多国营粮店，一下子抛售了2亿多斤大米。投机商人无可奈何，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大米全部吐出，弄得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兴风作浪了。1950年3月以后，物价平稳下来，国民党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这匹脱缰的野马，在共产党人手里，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便被制服。

在平抑物价的同时，陈云着力抓的另一项工作是统一财经。当时，全国财经管理仍然延续过去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所实行的以分散为主的体制，收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有亏空，势

必要多发钞票,这不仅会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而且难以办成具有全国性的大事,不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云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年底,中国大陆除西康、西藏地区外都已解放,实现全国财经统一的客观条件业已具备。他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又为《人民

1954年7月,陈云同

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

日报》起草了《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决定实行后,国家财政收入的状况迅速得到改善。至此,建国初期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他还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赞扬陈云的理财能力,写下一个大大的“能”字。

恶性通货膨胀被治服了,但由此又引出了新问题。由于财政紧缩过猛,从1950年4月开始,货币流量减少,流速降低,商品滞销,接踵而来的是私营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工人失业激增。1950年4月12日,中财委召开党组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讨论对私营企业的政策问题。陈云说:“我们既然在经济上承认四个阶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就要让他发展,有困难就要帮助。”他说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放宽税收政策,一种是银行给贷款。前一种办法,好处给在明处,因此还是

前一种办法好。为了扶持私营工业,陈云提出加工、订货,合理确定工缴费的办法。为了扶持私营商业,陈云要求合理划分私营范围,国营商业除掌握少数重要物资外,其他商品让给私人经营;批发和零售价格要适当,使私商有利可图。他比喻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一头是解决工商业困难,一头是稳定金融,不要碰破一头。

1950年6月6日,中共召开七届三中全会。当时任弼时病重休养,中央决定陈云参加书记处工作,并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组成三中全会的主席团。会后不久,任弼时逝世,陈云正式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陈云也在会上作了《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的发言,他指出:只有在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办法下面,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会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在全

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的发言。左为刘少奇

国迅速展开。到了下半年,私营工商业开始活跃起来。陈云在总结 1950 年工作时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统一财经之后,物价稳定了,但东西卖不出去,后来就调整工商业,才使工商业好转。六月以前是统一,六月以后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1950 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解放军解放了西康地区,为进军西藏打开了大门。1951 年 5 月,陈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主持了同以十世班禅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的谈判,双方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另一件大事是,鉴于美国出兵武装援助南朝鲜,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威胁中国安全,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然侵犯中国领土台湾,中国人民组成志愿军,于 1950 年 10 月 19 日进入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陈云坚决支持党中央、

1951 年 5 月 4 日,陈云(前排右二)、郭沫若、黄炎培同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前排左一)步出客厅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及时考虑并调整了国内经济工作的方针。当月中旬,陈云写成一份《非常时期的工作布置》的提纲,提出:明年财政概算方案的基点要放在战争上,财政收支要“战争第一,市场第二,其他第三”。

1951年4月4日,陈云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当谈到当年财经工作要点时,他强调指出: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今年国家财政概算的方针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毛泽东在这个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直到1952年底,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仍然强调要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和实行,对于保证抗美援朝的胜利和全国市场的稳定,以及有重点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建设方面,陈云起草了以他和薄一波、李富春名义向中央作的1952年财经方针的报告,提出应在不放松收入的条件下,转向管理支出;在不放松财政金融和市场管理的条件下,转向工业、农业、交通方面。财经干部比较熟悉的本领已经不够用了,不熟悉的工作,如工业建设、经济计划等等,必须迅速努力学习。这表明,陈云已经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拟定建设计划、准备干部上来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

第九章 大展宏图

在经济恢复工作进行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已经开始为大规模经济建设作准备了。1951年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为了贯彻这一思想,会议决定着手编制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成立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聂荣臻、宋劭文等6人组成的编制领导小组。

“一五”计划前后共编制了五六次,具体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陈云主持下进行的。1951年2月政治局会议后,陈云就开始领导中财委进行编制了。对于编制的指导思想,陈云在那年先后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谈到了一些。他讲的意思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不仅要计算1953年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情况,还要考虑那时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考虑国防的需要。第二,要考虑农业的需要。第三,要考虑老百姓的需要。不能只办重工业,不办轻工业。第四,要考虑文化教育的需要。开工厂要有工程师、技师、熟练工人、职员,勘察地质要有地质人员。第五,要考虑各种经济成份所占的比重。在轻工业中,国营比重很小,纺织业中的纱锭只占全国纱锭的40%。有些资本家想让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业,包袱都让政府背,他们赚钱。不能这么办。五种经济成份同时存在,但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要使私人经济跟着走,有一个条件,就是国营经

济有相当的力量。

1951年,编出了“一五”计划的第一稿。1952年6月底,又编了第二稿。随后,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一五”计划同苏方交换意见,争取援助。周恩来和陈云在那里紧张工作了一个月,两次会见了斯大林。他们回国后,李富春领导留下来的人员继续工作。根据苏方提出的一些意见,陈云组织中财委和国家计委的力量,于

8月24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向列宁墓敬献花圈。前排左起为周恩来、陈云

1953年初编制了“一五”计划的第三稿。6月,李富春回国,随即由国家计委组织力量,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四次编制。1954年初,毛泽东要求重新编制“一五”计划,并为此成立了以陈云为组长,包括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托夫、陈伯达在内的8人小组。8月,在陈云主持下,8人小组连续举行17次会议,对“一五”计划草案(初稿)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讨论和修改。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3人共聚广州,集中了一个月的时间,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认真审核。11月,陈云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又用11天的时间,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陈云作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得到会议的原则通过。同年

1955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
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6月,中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计划草案又作了适当修改。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的编制,陈云从始至终全力以赴,不少项目是他亲自召集技术人员和有关干部认真审议后才决定具体方案的,有时为了选厂址,还要多次讨论,反复比较。为第一汽车制造厂选厂址时,曾有过各种意见,如设在北京、石家庄、太原。陈云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主张再放远一些,设在西安。后来,他向专家请教,还到一些地方实地了解情况,才知道这些根本不对头。因为如果汽车厂年产3万辆,每年电力就需要2.4万千瓦,而西安只有9000千瓦,光建电站就需要几年时间;钢铁需要20多万吨,而石景山钢铁厂要在五六年以后才能生产这么多钢铁;木材需要2万立方米,而在西北砍木头,山都要砍光;运量需要100万吨,而西安到潼关铁路的年通过能力不超过

200 万吨,光汽车厂就够它运的了。最后确定,汽车厂只能设在长春。

“一五”计划把力量集中在建设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 156 个单位和由限额以上 694 个单位组成的工业项目上,它作为基本任务,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思想。为什么中国要选择这一种战略呢?仅仅是因为向苏联学习吗?对此,陈云在

1957 年 10 月 16 日,陈云
视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发动机车间

1955 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回答。他说:我国农业是落后的,铁路和其他交通设备也不足,都需要发展和扩建。但能够使用的财力有限,不能平均使用。而且,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为发展农业而大量供应化肥、农业机械、柴油、水利工业设备;就不可能为发展交通而大量修建铁路,供应铁路车辆、汽车、飞机、轮船、燃料和各种运输设备。另外,要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必须扩大轻工业,但现在由于缺少农业和重工业原料,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再者,我们还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需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这一切决定了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

陈云在编制“一五”计划的过程中,一再强调必须遵守按比例发展的思想,并提出了综合平衡的思想。他说,制定工业发展的速度,不能只考虑工业本身的情况,还要考虑工业与农业、工业与交通运输、工业与科技教育,以及工业内部的重工业与轻工业,重工业内部的冶金、煤炭、电力、化工等部门之间

的比例关系。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惟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我国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去,计划中的平衡势必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1954年5月,他在各大区财经负责人会议上讲到中国工业化特点时说:“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的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是长期的,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掠夺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是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我们说按比例,是从长时间来算的,从短期看,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而已。”

由于“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正确,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及时纠正了急于求成的偏向,因此,尽管投资规模空前,建设项目众多,但在总体上做到了比例适当,布局合理,进展顺利。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一年完成,到了1957年,更是超额完成了各项指标。五年内,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于旧中国100年形成的固定资产的近两倍,初步改变了中国经济以农为主、工业以轻为主、工业设施过多集中在沿海的状况,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基础。“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平均每年递增11.3%,而同期物价指数年均上涨只有1.1%,人民生活水平年均提高将近7%。经过多年后回头看,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发展普遍感到满意。

就在人们集中力量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发生

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件。事情是从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开始的。那次会议原定要讨论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打算只开半个月，但实际上变成了主要讨论和批评新税制的会议，由6月开到了8月，长达两个月。高岗于1952年调到中央兼任国家计委主席后，个人野心膨胀起来，把刘少奇、周恩来视为他实现野心的障碍，因此，在财经会议上鼓动一些同志“放炮”，对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并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曾说过的和毛泽东意见不太一致的话都安在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明里“批薄”，暗里“射刘”。在高岗的鼓动下，有些人甚至把新税制的错误上升到了路线的高度，认为这是路线错误，说中财委内也存在两条路线。与此同时，于1952年调入北京担任中组部部长的饶漱石，也与高岗一唱一和，在同期召开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借批评安子文之名，“讨伐”刘少奇。

后来,毛泽东发现会议走偏了方向,要周恩来尽快做结论,并让他“搬兵”,就是把在外地的陈云、邓小平请回来参加会议,给薄一波解围。当时,陈云因病正在外地休养。有人去看望他,同他谈到财经会议的情况,他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7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8月6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一方面批评了新税制的错误,另一方面为薄一波说公道话。同时,他还主动承担责任,检查自己没有就税制改革的复杂性提醒薄一波。邓小平回京后,也指出不能把新税制说成是路线错误。他们讲话后,周恩来的结论就好做了。8月11日,财经会议召开大会,周恩来作了总结报告。第二天,毛泽东发表了讲话,表示也要为新税制的错误承担一定的责任。财经会议的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高岗、饶漱石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财经会议后,中央考虑适当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曾设想政府采取部长会议制形式,党内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高、饶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这是他们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大好时机。高岗忽而造谣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让周恩来搞部长会议,让他搞政治局;忽而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担任,还要陈云去向毛主席反映,遭到陈云的断然拒绝。接着,他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东南一些地区煽动高级干部,捏造所谓“军党论”,将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白区的党”两部分,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说现在是“白区的党”掌握党中央和国家机关,应彻底改组,由他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回到北京后,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

问题定下来，惟恐自己当不上副主席，便找陈云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被陈云顶了回去。他还找邓小平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邓小平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陈云和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反映，引起毛泽东注意。

1952年，陈云同
邓小平在颐和园

12月19日，陈云受毛泽东委托，离开北京，沿着高岗走过的路线，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当地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

同志通报高岗以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在杭州，陈云到林彪住所，向他当面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他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他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以后再与他联合的话。林彪听后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与此同时，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因要休假离京，提议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在讲话中对高、饶发出了严厉警告。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不点名批判了高岗、饶漱石。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作了重点发言。陈云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号召加强党的团结，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我们对于执政党内的状况不能盲目乐观，加强马列主义教育、毛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与会者合影(前排右五为陈云)

主席健在,这些都很重要,但也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而且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可靠的、可传到子孙后代的办法,就是提高几百个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负责干部的革命觉悟和嗅觉。大乱子要出就出在这几百人里面;出了野心家,能否迅速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全会之后,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对他们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揭发批判。

1953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中共中央作出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决策。根据在东北解放区和建国以后主持财经工作的经验,陈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粮食。1952年夏至1953年夏的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入虽然比上一年度增加了9%,但支出却增加了32%,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主要原因是城镇人口比1950年增加了1600万,吃商品粮的人多了;土改后,农民自己消费的粮食比过去增加

了；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国家用粮要到市场上收购，粮食形势一吃紧，私商就抬价，一般高出牌价 20% 到 30%，国家经济实力很弱，无力承受这样的价格，也拿不出钱来给城镇居民补贴。1953 年 6 月，粮食部就此问题向中央作出报告，毛泽东要求中财委拿出解决办法。当时，陈云在外地休养，中财委和粮食部的同志经过研究，草拟了几个方案，因为考虑到农村干部以及农民的接受程度，都没有提到征购。几个方案经中央审阅，提交给全国财经会议粮食组讨论、修改。陈云回京参加完财经会议后，即拿出很大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9 月里，他连续十几天，召集中财委有关同志开会，议出了 8 种方案：第一，只配不征；第二，只征不配；第三，原封不动；第四，“临渴掘井”；第五，动员认购；第六，合同预购；第七，各行其是；第八，又征又配。经过反复比较、权衡利弊，陈云认为前七种方法都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采取第八种方法。当然，陈云也估计到，这种办法要做不好的话，也会发生逼死人、农民打扁担以致暴动的事，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只有向美国、加拿大、澳洲买粮食。而我们一年的外汇收入全加起来，总计不过 3 亿美元，只够买 300 万吨粮食。那样的话，先进的机器设备就不能进口了，工业化也不要搞了。

10 月 1 日晚上，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向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讲了他关于粮食征购和配售的建议。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大力支持，毛泽东也赞成，并当即决定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由陈云负责起草会议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会议的决议。陈云连夜把会议通知写好，毛泽东次日作了修改。当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此事，由毛泽东主持，陈云作报告。大家一致同意陈云提出的办法。

10 日,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不致引起恐慌,对外未用“紧急”二字。陈云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是现在惟一可行的办法。有人问,别的办法还有没有,是不是还可以想一想别的办法。陈云回答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我想过了。开始从改良主义想起,想了好久改良主义的办法,最后还是想到了这个最彻底的办法。”全国各大区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一致认为实行征购和配售是调剂粮食产需矛盾的最佳方案,并对粮食征购和配给政策的贯彻充满信心。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称不好听,希望改一下。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售也相应地被称为“计划供应”,二者简称“统购统销”。在布置粮食统购统销时,陈云又向中央提出对食用植物油和棉花实行统购统销的建议。中央批准了陈云的建议,于 11 月 15 日作出了《关于在全国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于 1954 年 9 月 9 日通过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

正当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1954 年 9 月在北京召开。陈云向大会作了题为《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发言,对有关

1954 年 9 月,陈云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作《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发言

问题给予了充分说明。陈云说：国家规定的牌价充分照顾了农民和消费者利益，是完全公道的。过去一年，国家在粮食收购和供应中，甚至拿出 2 亿元补贴了运费和杂费。而且在国家销售总数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卖给缺粮农民的。为了保证国家进行有计划的建设和保证农民走向富裕生活的道路，对计划收购要长期实行下去，但计划供应只能是暂时的措施，只要消费品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要取消。在这次会上，通过了国务院组织法，根据周恩来的提名，任命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十人为副总理。会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八个办公室，陈云负责领导工业、财贸、交通、农林、水利、国家资本主义等六个办公室的工作。中财委完成了历史使命，就此结束工作。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国家收购粮食有了保障。但是，一些地方却出现了购过头粮的现象，加重了农民负担，激化了国家与农民的矛盾。到 1954 年底、1955 年春，全国各地几乎是“家家谈粮食，户户谈统销”。为了解决出现的问题，陈云决定亲自到农村进行调查。1955 年 1 月，他来到多年前领导农民暴动过的江苏青浦小蒸乡，会见了自己的特约联系农户，拜访了烈士家属，看了米店、粮仓，找农民、商人、小学

1955 年 7 月 21 日，陈云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作《坚持和改进粮食统购统销》的发言

教员、居民、干部座谈。调查结束后，陈云向中央提出了农村统购统销中的“三定”政策和办法，即定产、定购、定销，在一个粮食年度里，连征带购的粮食总数三年不变；各地要根据产量确定统购数字和卖粮户的留粮标准，确定统销数，留出周转粮。“三定”的办法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7月21日，陈云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的发言。此后，统购统销政策又经过一些修改，终于在全国稳定下来。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切断了粮食、棉花市场方面农民同资产阶级的联系，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也为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创造了条件。到了1953年，国民经济已经完全恢复，国营经济也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得到很大发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三反”、“五反”运动中又揭露了资产阶级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本性和不法资本家破坏国家经济秩序的行为。所有这一切，促使党中央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由利用、限制改为了利用、限制、改造，同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一化三改”。

在中央书记处的分工中，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这件大事，是由毛泽东亲自抓的，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则由陈云主持。他担任了中央对资改造十人领导小组的组长，是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按照“总路线”规定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至少要用10年至15年时间。所以，在1954年，陈云一方面抓紧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另一

方面强调对五种经济成份的统筹安排和对私营工商业稳步、逐步改造的方针。

关于私营商业,陈云提出:对兼营批发的,一般转为零售商;对专营批发的,凡能继续经营的让其继续经营,凡为国营商业需要的可让其代理批发业务,凡能转业的辅导其转业,凡无法安置的可连同职工由国营商业录用;对零售商,应使其保持一定的营业额,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对某些商品的经营可作适当退让;对坐商和摊贩,要逐步采取代销和经销形式,把它们发展成国家资本主义的零售商;对私营进出口商,应尽量采取联营、经销、代进、代出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发挥其在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贸易方面应有的积极作用。关于私营工业,中财委于年初召开了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决定在几年内先分期分批把 10 人以上私营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这一方针实行的结果,把生产容易安排的大户合营了,剩下为数众多的小户日子更不好过了。年底,国务院召开第二次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陈云提出,凡是国营能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的,就让出一部分。他在讲话中还说:限制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步子常常走得快了一些,要调整一下;手工业合作化宁可慢一点,搞得太快会出毛病。然而,1955 年下半年出现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促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速度加快了。

当时,从客观上看,这种加快的要求已经出现,形势已经形成。首先,私营企业如果长期停留在加工订货的办法上,生产就不可能进一步提高。因为加工费是按成本计算利润的,成本越高,则资本家的利润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就不愿意降低成本,也不愿意节约原料,还会用增加工资等办法提

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及大中城市党委负责同志会议,并作《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

高成本。其次,“一五”计划的建设需要全面计划,只是国营部分有计划,而私营部分没有计划,则国营的计划往往要被生产无政府、无计划的私营部分所冲破,使国家很被动。再次,尚未公私合营的12万多户私营企业大多数是小的、落后的企业,如果要国营的先进的企业把生产任务让给它们,在经济上显然不合理。于是,只能进行行业改组,或者合并,或者淘汰。而这势必触及所有权问题,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也因此变得不可避免。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集中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陈云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人物的重要讲话,并作了题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就这个问题讲了六点意见,说明了现存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进一步转变的原因,提出了在转变中应当实行的五项措施。这五项措施是:第一,原有工厂和店铺的

招牌最好保存下来。第二,所有资方实职人员都要安置起来,不要让有经营能力的资方人员坐冷板凳。第三,推广定息的办法。第四,组织专业公司。第五,要分期分批地进行改造,不要一声号令就立刻全面铺开。

陈云同毛泽东、周恩来在
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要趁眼前没有战争的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会后,不少城镇的资本家申请公私合营,人流日夜不断。1956年1月15日,北京天

安门广场上举行集会,工商界代表向毛泽东报告北京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讯。接着,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也都纷纷报喜,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连挑担卖糖豆的也公私合营了。那时,陈云正患感冒。面对这种群众运动式的改造高潮,他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三点需要注意的问题。他说:第一,实现公私合营,需要清产核资,安排生产,改组企业,安置人员,组织专业公司,这些工作都还没有做。先批准合营,等于把要做的工作放到后边去做。因此,全行业的合营工作仅仅是开始。第二,对不雇店员的小商店,本来的政策是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高潮一来,他们也递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没有办法,只好批准。但是,这样一搞,他们就和国营商店一样了,干不干二斤半,一律发工资,到点关门,他们的积极性降低了,居民不方便了,国家也背上了包袱。因此,应当长期保留他们独立经营的方式。手工业者、摊贩等等,要求加入合作社,也

只能是挂个牌子,报个名就算了。第三,公私合营后,私营工商业由于没有了竞争,有可能把以前好的东西也改掉,只愿生产大路货,不愿生产数量少质量高的东西。因此,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应该在一个时期以内照旧维持不变。

在陈云的建议下,国务院2月8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确定所有私营企业和手工业在批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以后,一律照旧经营,半年不动。至于半年期满以后怎么办?陈云说:所有企业的改组都不应该受时间的限制,都要分批分期逐步改造,而且都要在有利于生产的条件下进行。各地各部门的任务是,对没有改组的企业要准备改组方案;对合并错了的企业要逐步调整。国务院的这一决定,制止了盲目合并的趋势,纠正了当时的某些混乱。对于盲目合并的原因和责任,陈云在3月30日全国工商业的家属和女商业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分析,给予了明确回答。他说:原因有两条,一是认为集中是高级,单干是低级,难以到社会主义;二是只考虑合在一起管理方便,不考虑应不应该合并。比如修理自行车铺和理发担子,合起来之前,到处都有,老百姓修车、理发都很方便。后来认为一家一家干是低级的,合起来才是高级的,统统合并。结果,高级是高级了,但找半天找不到修车和理发的地方。关于责任问题,陈云说:有人讲责任在下级干部,上面的经是好的,就是小和尚嘴歪,把经念坏了。这种说法不对。主要责任在领导干部,首先我要负责。下面干部有错误,责任也在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向他们讲清楚,国务院没有下过修理自行车铺和理发担子不要合并的命令。为了克服公私合营后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毛病,陈云提出了五条改进措施:第一,对有些商

品,如百货中的一部分,国家不再统购包销,不好的,就不要。第二,对商品的设计人员,像工厂的工程师、时装店的设计师,要给予奖金。第三,优质优价。第四,要设专人负责质量,一般要由经理或副经理担任,并且最好要由工商界人士担任。第五,要供给好原料。

在设法纠正公私合营带来的种种弊病的过程中,陈云进而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是否意味着质量下降、品种减少?他讲:“人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大路货,许多有特色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在大胖子买不到袜子,小孩子买不到皮鞋。难道说社会主义就应该是大路货吗?当然不应该是这样。”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陈云认为,问题就出在为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政策而制定的一系列措施和方法上。他说:这套办法避免了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的竞争,制止了投机活动,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但是,这套办法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因素。现在,绝大部分私营企业已经实行了公私合营,情况已经改变,因此,这套办法已经不再必要了,应当改变。

为此,陈云开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考虑一种新的体制模式,这种模式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他在7月21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农产品采购厅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讲:“有的同志说: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道理。”他又说:“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不走这条路,我们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路。我看要试一下,摸一个时期,也许可能从中找出一

条好的出路来。”8月18日,他在全中国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苏联的生产无论大小一律纳入计划,我们可否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在主要产品方面有计划,对次要产品搞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不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市场。总之要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显然,这已触及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核心的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成绩毕竟是主要的。正如陈云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所说:“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工商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来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例的……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幸福生活的胜利。”正是在这种胜利的喜悦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捷报频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气氛下,中国共产党于9月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八大上,陈云就自己前一阶段的思考,向大会作了一个系统的发言,题目就是《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在这篇发言中,他全面分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方面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具体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跟上而产生的种种错误,提出了纠正错误的五条措施。这些措施是:第一,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把由商业部门向工厂加工订货的办法改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售商品的办法。商业部门对有关国计民生、规格简单的商品继续统购包销,而对品种繁多的日用货,逐步改

为选购。第二,工业、手工业、农业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和经营,纠正盲目集中、盲目合并的现象,以适应人民消费方面的多种多样和经常变化的需要。第三,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除对粮食、经济作物、重要农副产品继续实行之外,对其他农副产品,如小土产,要允许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第四,要使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改变把价格稳定简单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冻结物价的现象,实行优质优价,允许新产品提价和一部分小土产随行就市。第五,对某些产品只制定参考性的上缴利润等等指标,让工厂按照市场情况生产。在上述措施的基础上,陈云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总体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篇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上的最初尝试,由于当时可供商品较少,用选购代替统购包销还只是个设想,实际上并没有做到;特别是后来发生了“左”的错误,更使这一探索被迫中断。但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对 20 多年后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产生过实际的指导作用。

八大之前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正式确定了党中央设立副主席和总书记。毛泽东在提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时说:“至于陈云同志,他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

陈云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
在中共八大闭幕会上

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在八大之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邓小平在讲到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历史时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在这个领导集体中,陈云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举世公认的独特作用。

第十章 艰难行进

80年代初,陈云在回顾建国初的经济工作时说:“从1949年到1956年,我们党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三大‘战役’:统一经济,稳定物价;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从低级形式到最后完成。”“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但从1957年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分歧。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使陈云被错误地认为思想“右倾”、“保守”而受到排斥和冷遇。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不可能再像建国初那样“放开手脚干”了,而只能是边检讨边工作,尽力把因为“左”倾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艰难的环境中负重行进。

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把对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扩大到了经济建设领域。他对国务院各部关于编制15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设想不满意,认为落后于形势发展;对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也不满意,认为指标低了,投资少了,速度慢了。在这种形势下,各部门纷纷修改1967年的远景指标。原定15年的计划要提前在5年内完成。这样,1956年的投资计划就必须追加,导致资金、物资、市场的全面紧张。面对这股突如其来的建设高潮,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以及主管经济工

作的几位副总理,出于本身的责任,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要防止和反对盲目冒进的问题。于是,1956年,在组织当年的生产建设中,在编制1957年的计划和“二五”计划草案中,展开了冒进和反冒进的斗争。

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批评了“急躁的苗头”,反对“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要求领导者要用冷水洗洗“发热的头脑”。陈云在三天后召开的国务会议上说:工业高潮来了,很好。但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不能回避。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尽了力了,不叫“小脚女人”。5、6月份,刘少奇在主持讨论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预决算报告时,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并把这一方针写进了李先念向全国人大的报告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中。6月12日,陈云与周恩来共同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1955年决算草案和1956年预算。陈云说:今年预算不但没有结余,还要动用上年10亿元结余。预算不平衡造成现金不平衡,现金不平衡就要多发钞票,估计发行量是解放以来最高的。如果消费品生产跟不上,物价就要上涨。7月上旬,国务院常务会议连续开会,讨论“二五”计划草案。8月份,周恩来、陈云又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审查国家计委根据7月会议精神新编的方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最后敲定,1962年粮、棉、钢三个指标分别为5000亿斤、4800万担、1050万—1200万吨。当周恩来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发现粮、棉指标作了增加,立即把数字又改回来,并在旁边注明:“粮棉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到了年底,周恩来和陈云又把注意力放到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上。为此,国务院于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连续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国家经委提出的控制数

字。陈云说：建设规模究竟应该多大，是个根本性问题。他还说，宁愿慢一点，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接着，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就1957年年度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作了报告，并总结了执行“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会后，在陈云主持下，国务院对计划指标作了进一步压缩调整。后来，陈云总结这一时期的教训时说：我当时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

反冒进从1956年一直延续到1957年初。1月8日到10日，毛泽东连续三个晚上召开小范围会议，座谈1956年的经济工作。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四人发言，一致认为这年的经济建设“冒了”。陈云还在发言中，着重谈了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问题。过了几天，中央召开省、市党委书记会议，陈云将他那篇发言作了充实，作了题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这篇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总结了“一五”建设特别是1956年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关于通过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来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观点。讲话中还提出了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一些制约方法，主要是：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必须平衡，而且略有节余；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的生产部门最低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部分用于基本建设；三，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还必须瞻前顾后；五、要注意农业对经

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讲话指出：编制“二五”计划，必须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这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特别是从暴露的矛盾中寻找。例如，要研究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先行部门与其他工业部门的关系，钢铁工业与机械工业的关系，民用工业与军用工业的关系，建设中“骨头”与“肉”的关系等等。他说：“建设规模大小必须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和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陈云这篇讲话中提出的思想，后来被中国经济学界称为“国力论”，与不顾客观比例关系、急于求成的思想形成了鲜明对照。

正是从“国力论”的指导思想出发，陈云在 1956 年上半年和 1957 年下半年，为解决由于冒进而引起的副食供应紧张和一部分商品涨价问题提出一系列主张。他于 1956 年 11 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提出适当提高生猪和其他副食品收购价格等解决办法；于 1957 年 7 月在 13 省、市蔬菜会议上讲话，提出大中城市郊区要有足够的蔬菜种植面积，在外地还要有蔬菜生产基地；于同年 8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言，提出必须提倡节制生育，从中央到省市都要为此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号召共产党员不生第三胎，减价甚至免费提供避孕药具；于同年 9 月粮食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

1985 年 12 月
22 日，陈云书写
的手迹

1958年6月,陈云在兰州市郊桃林农业
生产合作社视察

粮食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的最重要的物资,市场是否稳定,主要看粮食局势和粮食价格是否稳定,粮食工作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必须引起全党重视;于同年同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提出要大力发展化肥和化纤工业,以增加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播种面积。他指出:“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如果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我们前进的后腿。”“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

还是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陈云从1956年下半年起,多次提出,解决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不能只在商业工作内部找原因,而要从整个财经工作上找原因。中共八大之后,他兼任商业部部长。11月,他在商业部部务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

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同时,他也对商业工作本身提出了几条意见。他说:商业工作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这是人民的大事,不要看不起这些。“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为了改进商业工作,也为了端正整个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他在1957年1月的商业部党组会上提出了学习哲学的建议。他说:学习理论,最主要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你们都有经验,但思想方法不对头,经验就提不高。他指出:“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有些同志不花时间去弄清全面情况,弄清事物的本质,而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发议论,作结论,这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应该用90%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来决定政策。”他还说,要取得正确的认识,一定要听不同意见,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

由于反了冒进,1957年的综合平衡工作做得比较好,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二五”计划也制定得比较合乎实际。然而,毛泽东对反冒进从一开始就是不满意的,只是当时注意力在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所以没有表示出来。1957年下半年,波匈事件过去了,国内的反右派斗争也基本结束了,一些工厂和农村还出现了生产迅速增长的新势头。毛泽东由此更加相信反冒进是错误的,便在9月中共八

届三中全会上开始了对反冒进的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 40 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不了解现在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1958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南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更加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说反冒进使 6 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要反反冒进;还说平衡是相对的,只有把平衡不断打破,事业才能前进,应当搞积极的平衡;并在小范围讲,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那次会议,陈云因病没能出席。事后,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要对财贸工作中的“错误”负主要责任。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反冒进的同志“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 50 米远”;还批评国务院领导同志不让政治局和他本人“参与设计”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总让“强迫签字”。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再一次批评反冒进,武断地认为 1956 年下半年的反冒进造成经济发展的“马鞍形”。会议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正式作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并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用 15 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陈云在大会发言中,又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后接着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随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兴起,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从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反反冒进,那以后,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被破

1958年6月,陈云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坏,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地位也在事实上被取消。

“大跃进”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动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958年改进经济管理体制中,急于向地方放权,大批原属中央的企业下放给省市,地方上盲目建设的积极性发展起来。建国后,在统一财经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这一体制为顺利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束缚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弊病。1957年初,为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央曾经成立了由陈云为组长,包括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在内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当时,各省市区要求下放企业管理权、基建审批权、财政包干权和物资分配权的呼声很高,而中央部门对此颇有顾虑。陈云一方面赞成适当分权,认为中国一个省等于外国一个国,如果地方机动余地很少,是不能长久的;另一方面,又提出要考虑到下放以后全局的综合平衡工作。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了改进管理体制的问题,陈云

1958年7月7日,陈云
视察武汉钢铁公司

在发言中指出:职权下放后,地方也可能发生不顾全局的倾向,因此既要适当分权,又要加强综合。会后,陈云亲自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这三个规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后,并未立即实行。毛泽东出于发动群众、推进“大跃进”的考虑,督促有关部门于1958年6月作出了《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于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央管

理的近900个企事业单位被下放到省市,导致企业原有生产协作关系的混乱和计划的失控。与此同时,为了集中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权,中央于6月10日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中央财经小组虽仍由陈云任组长,但由于它本身不掌握经济工作全局性的决策权,所以,面对迅猛下放的局势,很难有所作为。

“大跃进”在工业上的表现,重点是贯彻“以钢为纲”的方针,发动全民大炼钢铁。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确定1070万吨的时候,已经是近7月份了,一年过去了一多半,而钢产量实际上只达到380万吨,剩下的700万吨要在另一少半时间完成。毛泽东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便在8月中旬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办钢铁。他给陈云打电话,要陈云召开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确保全年钢铁

生产任务的完成,少一吨都不行。于是,陈云召集有关负责人和各省工业书记开会,研究用剩下的四个月时间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措施。

为了使国家经委集中力量抓年度生产进度,毛泽东在北戴

1958年10月3日,陈云视察
哈尔滨亚麻厂

河会议期间,提议把基本建设工作从经委和计委中分出来,单独成立一个基本建设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从9月中旬起至年底,陈云把主要精力用于这项工作,并先后到天津、哈尔滨、西安主持了华北、东北、西北协作区基本建设工作会议,还到杭州召开了全国基建工程质量现场会。通过这些会议,他为减轻“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当时,基本建设战线面临着三大问题。一是基本建设战线太长,仅1959年一年安排的基建投资就超过了“一五”时期5年的投资总和,因此原材料缺口很大,形成了原材料供应与生产需求的尖锐矛盾。二是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央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7个协作区,要求各协作区在“二五”计划内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各省借此机会也纷纷定计划、上项目,提出要建立各自独立的工业体系,导致基建规模不断膨胀。三是为了实现基本建设上的高指标,各省市和建筑工程部所属勘察设计及建筑安装单位,大搞群众运动,实施快速施工法,造成工程质量下降,事故频繁发

生。针对第一个问题,陈云提出了基本建设项目排队的主张。针对第二个问题,陈云提出建立工业体系首先要从全国开始、其次才是协作区的主张。各协作区基建工作会议结束后,陈云的讲话被整理成一篇文章,发表于《红旗》1959年第5期,题为《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文章进一步指出:在一个省、自治区内,企图建立完整无缺的工业体系是不实际的。工业的发展,应当考虑当地的资源条件和经济特点,勉强办那些办不到的事情,不积极办那些可以办到和在全国范围内迫切需要的事情,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针对第三个问题,陈云一方面在为国家建委起草的《报告》中指出:今后开展快速施工的运动时,要强调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和施工中的技术组织管理工作;另一方面,于12月到杭州,主持召开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现场会,回到北京后,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送上有关材料和自己的讲话记录,并在信中指出:目前基本建设工程总的情况是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只讲“多快省”,不讲“好”;不适当地片面地强调节约,把不该破除的规章制度也破除了;只注重搞群众运动这一面,放松了业务和技术管理制度这一面;任务很大很急,新工人和设备与之不相适应。1959年1月8日,中央批转了陈云在杭州现场会上两个讲话的纪要,并在通知中指出:这两个文件很重要,解决了目前基本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提高工程质量是必须引起全党严重注意的大事。

1959年春,中国不少省份出现了粮、油和副食品以及其他生活用品供应不足的局面。尽管陈云已不负责主持经济全局的工作,但仍然以极大的注意力密切关注人民生活问题,想方设法予以解决。他在2月份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会

记会上说,没有油吃同没有蔬菜吃一样严重。同月,他在建委主任办公会上再次强调,农业提出的问题重于一切,并嘱咐建委对农药生产必须早做安排。4月份,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请陈云转告毛泽东:鉴于粮食单产没有预计那么快,省委决定今年尽可能少减或不减粮食播种面积;另外,水稻不能太密,太密了有危险。陈云认为周小舟讲的意见对,当即打电话与谭震林商量,建议就保持粮食种植面积和密植问题发一个通知;同时致信毛泽东,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4月30日,陈云就缓解市场供应紧张问题致信中央财经小组成员,指出:今年粮食不管增产多少,都必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改善人民生活,吃还是第一位的,这方面有缺口,很难有其他东西可以弥补。为了发展养猪、养鸡、养鸭,他提出,国营、集体、个人三种形式同时并行,三条腿走路。中央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发出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要求第一书记必须以抓农业生产为中心,扩大粮食春播和夏种面积;养猪以集体喂养和私人喂养并重,把80%—90%放到承包单位和交由私人喂养,对私人养猪要在饲料、劳动时间等方面给以必要安排和照顾。

从1958年底起,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开始有所觉察,在11月初的郑州会议和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要求“降温”、“压缩空气”,承认包括他在内,犯了“冒失”的错误。北戴河会议时,1959年钢产量定的是2700万吨至3000万吨。对此,陈云先在9月中旬华北协作区基建工作会议上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10月份,他又在东北协作区基建工作会议上指出:明年钢铁产量一下子上去那

么多，铁路能否适应，值得怀疑。后来，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纠“左”，在随即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被降为了1800万吨至2000万吨。对于这个数字，陈云觉得还是难以完成，建议先不要对外公布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但这个建议没有能及时转达到毛泽东那里。1959年1月初，周恩来和邓小平请陈云去摸摸1959年计划安排。在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讨论时，陈云再次提出，完成2000万吨钢的指标有困难。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于这个新的指标心里也不踏实，在1月中旬约请陈云、彭德怀、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谈话。陈云表示：“1959年生产计划指标过高，难以完成。”毛泽东听后说：那就拉倒，至于这个总路线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毛泽东有意改变高指标，提出请陈云讲讲话。陈云不摸底，以为毛泽东又要他检讨，便在2月份召开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会上，检讨了自己把困难看得多了。3月底4月初，

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将1959年的钢产量确定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为1650万吨。会上,当毛泽东得知武昌会议上陈云提出过不要公布四大指标时,怪有关同志为什么不把这个意见告诉他。他在讲话中号召学习海瑞精神,特别说道:我1月份找中央几位同志谈经济和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在武昌,对是否发表1959年粮、棉、钢、煤指标的问题,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今年1月,也是他正确。他的话很有一些同志抵触,我就赏识。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

会后,毛泽东对压缩后的钢铁指标仍然不放心,委托陈云进行研究。陈云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多次听取冶金部关于钢铁生产总的情况以及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问题的汇报,同时约相关部门的同志谈话,反复询问和交换不同意见,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经过近10天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后,陈云提出: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为1300万吨,相应的钢材指标为900万吨。5月11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详细说明了上述意见的理由,指出: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退到可靠的阵地才

1959年5月15日,陈云
在中南海勤政殿门前

能站稳，站稳了才能更踏实地前进。会后，陈云致信毛泽东，将发言记录送给他看。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为1300万吨。他说：去年12月武昌会议决定的2000万吨钢，到了今年1月份，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难以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以改变。人们还想大干一番，要转为上海会议1600万吨钢不可能，转为现在定的1300万吨钢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转不过弯子。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结果，1959年钢完成了1387万吨，钢材完成了897万吨，与陈云提出的数字一致。

落实钢铁指标以后，陈云心脏病又一次发作，先后到江苏、山东、长春、辽宁等地休养。就在陈云养病的时候，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原本是要继续纠“左”，所以，毛泽东上庐山之初，对各协作区主任说：“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次序是重、轻、农，今后恐怕要农、轻、重。过去陈云同志说过，要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人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这个意见是对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所犯错误的根源及严重程度认识得并不彻底，所以，当彭德怀写信，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发言，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大跃进”的错误后，毛泽东便不能容忍了，将会议主题由纠“左”一变为反右，甚至认定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提出要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不仅使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批判，而且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掀起了“新的大跃进高潮”，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被进一步加剧。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陈云(正面一排左一)出席
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左”倾错误的发展,严重挫伤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加上从1959年起,中国连续遭受大面积的自然灾害;1960年,苏联为了向中国施压,又召回了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废除了两

1960年4月12日,陈云(正面左一)出席
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协议,致使新中国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陈云一边养病,一边密切关注着经济形势的变化。1960年,他在上海疗养时,为了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特意请青浦老家的两位联系户谈话,询问农村情况;还派人去安徽了解小化肥厂的建设情况。在这一年的4月和6月,他先后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再次讲到降低1959年钢铁指标的事情,指出:“1959年1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少一批而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压力,不肯改。”直到“(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7月,陈云从上海回北京后,很快又赴北戴河,参加讨论经济和国际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会后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调整最初仍处于徘徊状态。为了探索落实八字方针的具体途径,陈云于9月12日从北戴河出发,到河北、山东、河南、皖北、苏北、浙江考察,前后历时3个月。所到之处,他除了深入农村工矿,察看农田水利建设和工业支援农业的情况,还广泛与各级领导干部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共商渡灾的办法。陈云反复启发大家讲老实话,特别提出领导人和上级机关要给下面讲老实话的条件。他说:落

1960年10月24日,
陈云视察河南三门峡
水利枢纽工程

实产量,要先从省委落实,省委不落实,下面不敢落实,怕被说成是右倾,怕涉及到总路线、大跃进问题。领导机关听不到来自下面的意见,不了解下情,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

通过在下面考察,陈云对农村的困难局面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心中更有数了。首先,陈云提出了进口粮食的建议。进口粮食在当时是个政治敏感问题,提出来是有一定风险的。粮食部根据陈云的建议,向中央写了报告,但没有打印,而是抄写后直接送给了李先念,由李先念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以粮食品种调剂为理由请示毛泽东,得到了同意,这才决定从1961年起进口粮食。为了多进口,陈云提出要进一步压缩国内消费,多出口一些土特产品和布匹。他说:每人减少一尺布,就可以多进口50万吨小麦。

解决粮食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为此,陈云向中央提出了提高农产品价格和把养猪方针的“公养为主、私养为辅”改为“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意见。1960年底至1961年初,陈云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和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这两个会议批准了关于调整的八字方针，确定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经济生活，决定控制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提出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等“五风”，规定社员自留地占土地比例由 5% 调整为 7%，养猪以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并允许私养母猪，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会上，还决定拿出 10 亿元用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并决定成立以陈云为首的粮食价格小组，进行具体研究。1961 年 1 月 15 日，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报告》，建议从当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 20%，相应提高油、肉、禽、蛋的收购价格，使农民总收入增加 65 亿至 70 亿元；与此同时，粮食销售价格在一两年内暂不提高，职工工资也不动。这项政策出台后，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粮、养猪和饲养家禽的热情。

陈云为解决经济困难提出的另一个办法，是大量减少城镇人口。早在 1959 年 4 月，他就在写给中央财经小组成员的信中提出，必须认真精简 1958 年过多招收的 1000 多万工人，把他们安置到农村去。后来，由于开展反右倾斗争，多余的职工不仅没有减下去，反而又招收了不少工人。1961 年 5 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下乡问题作了专题讲话。他说：要解决粮食问题，一是继续调整农村政策，二是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四条中，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三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中央采纳了这一意见，于 1961 年减少城镇人口 1000 多万人，1962 年又减少 1000 多万人。这项决策为迅速扭转困难局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关于工业支援农业,陈云的意见是着重抓紧化肥工业的发展。早在1957年,陈云就提出,中国地少人多,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养猪积肥,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而不在于开荒。1960年10月,中央成立了以陈云为组长的化肥小组。开始,陈云把希望寄托在年产800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认为这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见效快,所以每到一省,都要去那里的小化肥厂视察一番。

1960年10月,陈云
视察芜湖联盟化肥厂

但经过调查,他发现小型氮肥厂在技术上没有过关,因此,从1961年起,把注意力转到年产2.5万吨或5万吨的大型厂上。4月4日至10日,陈云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化肥小组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专门就大型氮肥厂

的材料进口、设备制造、成套供应及建设规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尽可能把市场供应安排好,也是陈云为缓解经济困难想出的一个办法。当时,粮食定量一减再减,与此有关的东西都要凭证供应,糕点

1961年2月8日,陈云在北京参观
人民生活消费品分类展览会

也是按人口凭证分配,一些有定息收入的资本家以及高级知识分子想多买也不行。另一方面,由于求大于供,物价平均上涨 20%,同时,国家财政出现 30 多亿元赤字。陈云在 1961 年 1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充分利用进口糖和小麦做高级糖果、高级糕点,价钱定高些,只要有钱就可以买;今后猪肉多了,也可多开高级饭馆,卖高价的炒肉片、炒肉丝。他说:这样做,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外国也是这样的。按照这种“网开一面”的思路,商业部门实行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拿出了一批高价商品,既缓和了市场供应的紧张局面,又回笼了 60 亿元货币。

由于农村和农业形势的恶化,使毛泽东痛切感到必须了解真实情况。在 1960 年 12 月至 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届九中全会上,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赴农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主

1961 年 3 月,陈云(二排左二)出席毛泽东
在广州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

持起草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3月，中央先是分头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三南”(即华东、中南、西南)会议和“三北”(即华北、东北、西北)会议，然后两个会议合并在广州召开，讨论通过了《六十条》。陈云参加了“三北”会议和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他针对在安徽部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明确表示应当允许人家试验。

继毛泽东农村调查之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先后亲赴农村。六七月间，陈云用半个月时间，去青浦县的小蒸公社蹲点调查，着重了解养猪、双季稻和自留地等政策问题。他吃住在农民家里，除了听取公社领导的汇报外，还召开了有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参加的10次座谈会，多次到农民家里访问，视察公共食堂、工厂、供销社和仓库，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八届九中全会已经确定养猪的方针是私养为主，但对母猪是不是也以私养为主没有作出规定，不少地方仍然只准公

养母猪,造成产苗猪少、苗猪死亡多的现象。陈云在调查中了解,私养母猪比公养好。养猪问题座谈会结束后,小蒸公社根据陈云的意见宣布,从即日起,集体养猪场的母猪,统统由原饲养户领回私养。第二天,农民纷纷前去认领自家的母猪,有的还到别的公社抢购苗猪,掀起了养猪热潮。

“大跃进”运动中,上海郊区和江苏苏州、浙江嘉兴等历史上不种双季稻的地区,为了增产,要求农民改种双季稻和多种小麦。通过调查,陈云了解到,种双季稻,全面算账,比种单季稻“明增暗减,得不偿失”。另外,种蚕豆比种小麦产量高,用肥少,好处多。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取决于无霜期的长短和人口、耕地的比例等因素。种多少小麦,取决于地势和土质。他的结论是: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要轻易变动。

小蒸庄在高级社时期有自留地 700 多亩,占耕地的 3%,其中大田 500 亩,其余都是田边、路边、沟边等“十边地”。公社化时把自留地全部归公,《六十条》下达后又重新分给农民,但大田只占耕地的 0.5%。陈云召集座谈会,引导大家比较利弊得失。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补充口粮、种些蔬菜,便于养猪积肥、弄些零用钱,再加上包产落实、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等一系列措施,有利于提高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生产发展了,征购任务也就容易完成了。因此,他提出把自留地中大田的比重提高到耕地的 3.5%。

青浦调查结束后,陈云又就这几个问题到杭州、苏州进行了调查。在杭州,陈云还约见了正在那里的毛泽东,谈了自己的调查结果,得到毛泽东的肯定。8 月上旬,陈云前往北戴河列席中央书记处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会议。其间,他将青

1962年1月,陈云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浦调查后写的三个调查报告,即《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很重视,批示印发给8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克服当时存在的严重困难,产生了一定效果。

从1960年冬开始,经过1961年的努力,经济调整取得了进展,但由于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整个经济形势仍没有摆脱困境,使中央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委书记五级领导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总结“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书面报告,由地方同志对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其中讲

道：“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分别代表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作了自我批评。林彪则在讲话中突出个人崇拜，对纠正错误和发扬民主起了消极作用。毛泽东三次请陈云讲话，陈云表示他正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讲话。但2月8日，他在陕西组的全体会上作了一次讲话，重点是讲发扬民主和思想方法问题。他指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责任由谁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老传统，但这几年把这个传统丢了，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他说：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说，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要多听不同意见，通过交换、比较、反复，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

“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但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未能清理“左”的错误，经济困难的问题未能讲透。会后不久，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为了落实大会提出的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于2月21—23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会议开始时，发现过去几年财政赤字没有揭露出来。陈云就经济形势问题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系统发言。他指出：对存在困难这一点，大家认识是一致的。但对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认识并不一致。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接着，他分析了几种看法，

还分析了诸如目前是否有通货膨胀、农民手中钞票是否太多等问题,又分析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最后,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条具体办法。他说:第一,把10年国民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5年为恢复阶段,后5年为发展阶段。在恢复阶段,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第二,继续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第三,采取节约现金支出、增产日用品、增加高价商品、打击投机倒把等办法,制止通货膨胀。第四,采取每人每月供应3斤黄豆、每年生产几千双尼龙袜子、拿出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级馆子等办法,满足城市人民的生活需要。第五,采取多给棉农奖励粮、多给商品粮主要产区供应化肥、多拨一部分材料制造小农具等办法,促进农业增产。第六,计划机关主要注意力要从工业、交通方面转到农业和财政金融方面来。陈云发言后,大家感到讲得很好,刘

少奇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请他再充分展开讲一讲。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长篇讲话。由于他把困难讲够了，提出的办法也切实可行，所以讲话结束时，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事后，在刘少奇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以中央文件形式批转陈云的讲话。为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又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同意。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陈云的意见，刘少奇还组织几个人，把陈云1956年以来有关经济工作的言论收集编辑起来，准备印发。陈云知道后，几次表示不同意。刘少奇答复说：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发给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人看。这本小册子印出后，刘少奇还送给了毛泽东一本。

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迫切需要一个全国统一的经济指挥中心，因此，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恢复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刘

少奇、周恩来提议让陈云继续当组长，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陈云临危受命，不辞艰难，主持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工作。3月7日，中央财经小组开会，研究经济调整问题。陈云指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人民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他建议多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出海多捕一些鱼，使大中城市6000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他还提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是客观规律。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搞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从年度计划搞起，而不能从远景规划开始倒过来搞；必须按短线搞，而不能按长线搞。所谓按短线搞综合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好得多。会上，周恩来对陈云的意见表示十分赞成。他把陈云的话概括成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会后，按照陈云和周恩来的意见，中央财经小组对1962年计划进行了调整，并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从此，调整方针和措施得到了贯彻落实，很快取得了成效。当年年底，国民经济开始好转，粮食产量结束了3年连续下降的状况，财政收支也结束了4年连续赤字的状况。不过，经济困难还只是刚刚迈过沟底，艰巨的任务还有待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努力。

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之后，陈云由于过度劳累，心脏病复发，离京去南方疗养。这时，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

第十一章 逆境之中

陈云是在1962年3月10日到达杭州疗养的。在杭州，他一边养病，一边继续思考尽快恢复农业的办法。当他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后，非常重视，认为与他在农村看到的情况相符，立即请人去安徽，实地了解情况，回来向他汇报。他还两次约姚依林到杭州，同他商议，可否把国家征购粮的数字定死，超产部分归农民；可否在生产落后的地区采取分田到户的办法。4月中旬，陈云由杭州去上海疗养，正碰上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韶山调查情况。田家英在调查报告中主张，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办法，渡过暂时困难。陈云看了这个报告，表示赞成。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包产到户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有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实行《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号召，尽快恢复生产。6月底，陈云回到北京，分别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陈云打算把这个建议直接向毛泽东陈述，希望他能采纳。当时，党内对“包产到户”问题在认识上有分歧，毛泽东虽然同意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明显的偏差进行局部调整，但并不赞成搞“包产到户”。一些同志劝陈云再慎重考虑考虑，不必急于提出。陈云说：“我担负全国经济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怎能延误时机！”7月6日，毛泽东刚一回到北京，陈云便

写了封短信给他,说对农业恢复问题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他谈谈。毛泽东接信后,当天便约陈云去谈话。听了陈云的意见,毛泽东当时没说什么。但几天后,他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说,他很不同意陈云的意见。他还严厉批评邓子恢和田家英,说他们主张“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搞修正主义。消息传到陈云那里,他听后久久沉默不语。不久,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央起草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7月下旬,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陈云虽然去了北戴河,但因心脏不好而向会议请了假。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矛盾、形势的问题,把西楼会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批成“黑暗风”,把包产到户的主张批成“单干风”,把彭德怀写的申诉书批成“翻案风”。他说,现在有些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认为社会主义不行,只能单干。这股风越到上层越大。他点了邓子恢、田家英而没点陈云的名,据他事后解释,是因为陈云有了意见,只向中央常委陈述,向党的主席讲,没有对外宣传,组织上没有错。9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这次会议最终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从而使全会后的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能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

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时,陈云仍只身住在北戴河。从此直到1973年,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处于“养病”状态,未能恢复工作。毛泽东对于他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主张包产到户十分不满,但却接受了他关于综合平衡的观点,再也

不搞高指标了。1963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有人与陈云同志争论是否要提三大平衡问题,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正确的。1964年5月,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又说:他对陈云同志很怀念,在“大跃进”时,大家头脑发热,陈云在压低指标问题上多次提出意见。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这个教训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也不能再干了。1965年初,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时,再次提到1959年降低钢铁指标问题,说陈云的主张是对的,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并要周恩来到上海看望陈云时,把这些话捎给他。

由于八届十中全会后的经济调整工作没有受太大影响,因此,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已经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也在一步步严重地发展着,直到1966年夏天发动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那年8月,陈云出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严厉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关于向高等院校派工作组的决定是镇压学生运动。朱德、陈云等也在会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康生在攻击陈云的发言中说:“看看他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将原来的7人扩大到11人,并重新排列了次序,陈云被排在最后。会上并没有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但会后只有林彪被称为副主席,其他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实际上被取消。8月18日,陈云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文化大革命”的群众集会,同毛泽东在天安门

1966年8月18日,陈云同毛泽东
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

城楼大厅内进行了简短交谈。

1967年1月,陈伯达在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宣称在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批判以后,中央“起码还有个把人物未被揪出来”,暗示造反派揪斗陈云。这个讲话一传开,北京街头和造反派组织编印的小报上,很快出现了攻击陈云的大标语、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造反派还于半夜间进陈云在北长街的住宅内抄家,要把他的保险柜强行搬走,还要查抄他保存的评弹录音。当时,陈云住在西郊的一处地方,不在家中。周恩来闻讯后,一方面派人与中央文革小组联系,勒令造反派立即撤走;另一方面安排有关部门连夜将陈云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第二天,陈云的一个女儿来向他描述了抄家的情景,他不仅十分镇定,而且不时哈哈大笑,说:“红卫兵抓住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和他们评理就是了。”

1968年10月,中共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刘少奇所谓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会上,朱德、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再次受到围攻。谢富治在小组会上说:“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作了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当彻底批判。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刘少奇抬出陈云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从始至终笼罩着“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林彪、江青集团主要成员都进了政治局,而从1935年起就担任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却被排除在外,仅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

这次会后,按照毛泽东关于让一些老同志去工矿企业“蹲点”调查的指示,陈云同叶剑英等一批老同志被安排到由中央警卫团支“左”的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他每天上午去半天,先后参加了50多次职工“斗、批、改”学习班的会和10余次向工人学习的调查讨论会。1969年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局势可能急剧恶化、苏联可能对中国突然袭击的估计,中央要求一些在京老同志战备疏散到外地。陈云同邓小平、王震等人被指定去江西。10月20日,陈云与王震同乘一节公务车前往江西南昌。行前,他交待身边工作人员带上《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书,说到江西后要继续抽时间读书。此时,夫人于若木已去湖南的“五七”干校;五个子女,一个也去“五

七”干校，一个在大学等待分配，一个在北京郊区农村小学任教，一个到驻西藏部队工作，一个在北京工厂当工人，家中竟未能有一人偕行。到达南昌后，时任江西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的程世清前来招待所作礼节性拜访，交谈中批评陈云过去没有把经济管好，发展太慢；说江西准备年产六七万辆汽车，每年向国家上缴 100 亿斤粮食，把全国每年进口的粮食全包起来。对于这种说大话的人，陈云很反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陈云在一次会上提到这件事，说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像程世清，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那么多，哪有那么多钢板？江西全年只产稻谷 197 亿斤，折合大米 133 亿斤，如果把全国进口粮都包下来，那江西老百姓没得吃，还不造反！

周恩来十分关心陈云的情况，事先给江西省委打了电话，要求他们在陈云住的地方生暖气，让他在条件好些的工厂蹲点。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有关部门安排陈云到南昌市郊区青云谱的福州军区干休所 8 号楼居住，在住处安了暖气，并安排他

南昌市青云谱福州军区
干部休养所八号楼

到附近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中央办公厅为保密,让陈云给自己起个化名。陈云便从两个儿子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叫陈元方。尽管那时陈云仍被视为犯有“路线错误”,但这里的干部群众对他却十分尊重。他每天上午去化工厂,轮流到各车间参加班组生产会和学习会,找基层干部、工人交谈,了解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情况;下午和晚上,在住所读书。在江西的两年零7个月里,他不仅通读了两遍《毛泽东选集》,还重读了《资本论》等马列著作。孩子们去江西看望他,他谈得最多的是读书学习的问题,要求他们学好理论,特别是学好哲学。有一次,他收到远在北京怀柔县农村当小学教师的二女儿的信,得知她有了读书的愿望,十分高兴,立即回信,表示鼓励,并在信中教给她读书的方法,要她除了读几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外,还要坚持着《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看有关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书。在江西的日子里,他还抽出时间到周围一些机械厂、钢铁厂、氨厂、电缆厂、汽车厂、煤矿和城市的菜市场、百货公司参观,还到过几所中小学了解教学改革的情况,浏览了当时用的各种教材。

1970年8月底9月初,陈云参加了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由于身体不好,他住在山下的宾馆,只是召开全体大会和华东组大会时才上山。一年之后,发生九一三事件。

陈云作为在江西的中央委员，参加了江西省委于10月初召开的传达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活动的省委扩大会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粉碎林彪集团政变阴谋的各项措施，揭发批判了林彪历史上的一些错误。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使毛泽东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中。他一方面接受并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解放了大批老干部；另一方面，又不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批“极左思潮”，而支持江青、张春桥的主张，认为林彪的实质是极右而非极左，只许批右，不许批“左”。借着解放老干部的势头，陈云于1972年4月回到了北京，参加了“五一”节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游行活动。这是几年来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7月31日，他又出席了国防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军45周年招待会，并在第二天见了报。他还参加了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写出了揭发林彪历史错误的材料和说明“伍豪启事”

1972年5月1日，陈云在北京中山公园观看文艺节目。

前排右起为朱德、李富春、陈云、徐向前、聂荣臻

真相的材料,指出这个启事是当年国民党特务为瓦解共产党而制造的阴谋,有力地回击了江青一伙利用这个启事对周恩来进行的诬陷。会后,他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在江西“蹲点”的情况,并请求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或参加老同志学习班,到外地搞调研。毛泽东批示都可以同意,于是,陈云参加了由总理副总理及各综合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国务院业务组,并受周恩来委托,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当时,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以及中国重返联合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也纷纷与中国建交,中国的对外贸易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转机。陈云敏锐地看出了这一趋势,及时提出了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课题。1973年6月7日,他在家中约见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负责人,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国际经济及金融货币方面的10个问题,请他们用一个星期到10天的时间收集材料。他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位置。”

研究资本主义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而在“左”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要利用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同对“自力更生”方针的狭隘理解相冲突。那时,西方国家正经历新一轮经济危机,不少游资在找出路,中国人民银行有搞到十几亿美元贷款的可能,但却在国内碰到两个问题,一是这样做怕不符合自力更生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这样做要

变动“文化大革命”中定的规矩。陈云指出：首先要弄清这样做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找出变通的办法来。他对人民银行的负责人说：“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他的这篇讲话，可以说是大胆利用资本主义资金的先声。

要利用资本主义，碰到的另一个尖锐问题是，能不能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易所。1973年4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年内购买47万吨原糖。当时国际市场砂糖求大于供，货源紧张，价格趋紧。五丰行考虑，如果立即购糖，势必导致糖价上涨，可能出了高价也买不到现货，于是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的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每吨82英镑左右；然后于5月20日开始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阿根廷等国购买现货41万吨，平均每吨89英镑左右。过了两天，国际市场的糖价果然涨到每吨105英镑。五丰行因购买砂糖任务已经完成，遂将期货售出，除付中间商费用外，还多赚了240万英镑的收益。陈云听了五丰行关于这一问题的汇报后，当即给予肯定，指出：交易所是有两重性的，过去我们只看到它的投机性的一面，忽视了它的大宗商品交易所的一面。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里学会游泳。他在代外贸部起草的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后来，“四人帮”一伙攻击这样做是剥削了外国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陈云辩驳说：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场所，我们利用它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没有剥削

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

当时,美元同黄金已经脱钩,且比价不断下跌。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在同五丰行总经理谈话中又提出: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会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在银行中要吃亏,除进口一些生产所需的物资外,可考虑用外汇买些黄金存起来。后来,他把这个建议对李先念谈了。国务院接受了这一建议,用美元购买了大量黄金存在瑞士银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避免了国际货币动荡带来的损失。1983年,他针对有人认为国家黄金储备太多,不如换成美元购买商品的说法,回顾了黄金多的来历,指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须的,不算多。”

陈云在抓对外贸易工作时,十分重视利用中国自己的优势,进口原料,生产成品出口,多为国家创汇。当时,国内棉花歉收,棉布供应紧张,而国际市场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较低。如果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可以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赚取大量外汇。然而,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人认为进口棉花是依靠外国,违背了自力更生的方针。陈云在同商业部领导同志谈话时说:美国、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纺织工业过去很发达,但现在工资高,棉布成本也高,不会大搞棉布出口。印度、巴基斯坦、埃及等国虽然搞棉布出口,但纺织水平不如我们。我们棉花产量不够,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出口还有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和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另外,陈云还提出要进口化肥,增产粮食,出口大米和肉类。用他的话说:这叫“打大的算盘”。按照陈云的指示,经国务院批准,外贸部当年进口了1600万担棉花,为出口创汇、进口先进的工业设备

创造了条件。

能否多出口,关键在于出口商品能否占据国际市场。对此,陈云在听取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负责人汇报时,提出了“保持和扩大港澳、日本、新马市场,千方百计打开西欧、北美、大洋洲和其他市场”的战略方针,并为实现这一方针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他提出出口产品要适应国际市场的销路;要把华润公司变成“第二外贸部”,让它到国外办公司、设仓库;要在打开销路的前提下,照顾中间商,使他们有利可图;要以较低的价格进入新的市场,站稳脚跟后再逐步提价。为了推动出口贸易,陈云于10月初亲赴广东,视察和指导广州秋季交易会。回到北京后,他致信周恩来,说准备召开几个小型会议研究滞销商品问题,然后再研究提高商品质量问题。信中说:“我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工作全无知识,或者知之甚少,准备学几年,总能学到一点。”

1973年到1974年上半年,资本主义爆发了新一轮经济危机。对此,陈云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了及时而深刻的剖析。他在1974年7月写了两份座谈会的发言提纲,一个题为《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一个题为《这次经济危机与1929年危机的比较》。提纲指出:石油危机说明了第三世界的力量,但它只是加重了世界经济危机,并非危机的根源,根源还是生产力超过了市场购买力。美国的经济和金融霸权地位虽已结束,但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仍居首位。美国与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虽有矛盾,相互力求转嫁危机,但又不能不相互维持。解决危机的办法,比较大的可能是,较大幅度和较长时间地收缩通货,减少工时,降低库存,以引起新的投资。因此,我们要学会在跌价中做生意。

在批林整风初期,各方面工作都有所松动,国务院借着这股势头,报经毛泽东批准,决定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价值 43 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 13 套大化肥、4 套大化纤、3 套石油化工、武钢一米七轧机。对此,“四人帮”极为不满,从中捣乱。他们看毛泽东已批准进口,不敢再说什么,但却反对进口有关的附件,说否则就是洋奴。陈云在和外贸部负责同志谈话时,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缺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 300 万吨钢板。他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在陈云的协助下,国务院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又决定追加 8 亿美元的引进,使引进金额达到 51 亿美元,成为继 50 年代引进 156 项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

1973 年 8 月,陈云出席了中共十大,并继续当选中央委员。1975 年 1 月,陈云出席了全国人大三届四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由于国务院业务组被撤销,陈云

又一次赋闲在家。他像过去一样,只要一有空闲,便给自己制定学习计划。这一次,他决定通读《列宁全集》,而且为了着重研究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他决定从收有 1917 年十月革命前夕著作的第 23 卷开始看起。除了中间于 1975 年夏天先后到江苏考察南水北调工程、苏北油田和到黑龙江考察“一五”时期建设的老厂之外,他几乎每天在家看二三十页书,一直看到“四人帮”被粉碎,刚好看完了收有列宁逝世前夕著作的第 33 卷。在此之前,陈云还曾组织过一个家庭读马列小组,成员有于若木和在京的孩子们。于若木在干校期间,因贴大字报批判江青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陈云回京后给毛泽东写信,请求给她留在党内改正“错误”的机会,使于若木的“群众专政”得以解除并回到家中。为组织读马列小组的事,陈云还给在怀柔农村当教师的二女儿写信,欢迎她星期天回家时也参加讨论,并告诉她,第一篇学《实践论》,先自己看,把不懂的地方记下,集中讨论时提出来。

全国四届人大开过之后,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在叶剑英、李先念等担负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老同志配合下,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使 1975 年的形势出现了明显好转。但这年年底,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正在这时,身患癌症的周恩来于 1976 年 1 月 8 日逝世。从这时起,直到 4 月初的清明节,在北京及各大城市,广大群众怀着对这位人民的好总理逝世的悲痛、对“四人帮”种种恶行的憎恨、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忧虑的心情,自发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

活动,矛头直指“四人帮”,终于导致天安门事件的爆发。接着,朱德、毛泽东先后于7月和9月逝世。“四人帮”不满意在天安门事件后经毛泽东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总理的华国锋,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陈云虽然赋闲在家,但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以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 50 余年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清醒地意识到,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时刻到了。

第十二章 转折时刻

正当华国锋为“四人帮”的夺权阴谋而苦恼焦虑的时候，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叶剑英一方面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王震与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联系。王震到陈云家中商谈解决“四人帮”的办法。陈云曾考虑用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但反复研究了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后，感到没有把握。9月19日，叶剑英派人秘密接陈云去他在西山的寓所，向陈云征求意见。陈云到时，邓颖超刚刚同叶剑英谈完出来。叶剑英将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讲话拿给陈云看，问怎么办？陈云果断地回答：“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1982年8月6日，陈云同叶剑英在一起

10月6日,在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推动下,华国锋下决心,代表政治局宣布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随即他召集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了由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次日上午,王震兴冲冲地来到陈云住所,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陈云。当消息传出后,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这一伟大胜利。

“四人帮”的粉碎为纠正长期以来党的“左”倾错误,调动全国人民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然而,令全党失望的是,华国锋虽然主持开展了全国范围内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和清查他们帮派体系的运动,但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延续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并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当时,要使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彻底走出来,打开全党全国工作的新局面,关键要解决两件大事:一是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恢复邓小平在天安门事件后被撤销的职务。但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这两件大事一件也解决不了。怎么办?人们再一次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老一代革命家。

在老一代革命家中,叶剑英是中央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李先念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国务院常务工作,他们有些话不便在公开场合说。提出这两件大事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曾长期担任过中央副主席而现在只是中央委员的陈云身上。他没有辜负全党的希望,抓住了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机会,公开提出了解决这两件大事的要求。会前,他就与王震、胡耀邦、耿飚、王铮等人分头相约,要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言,并把发言字斟句酌地写了出来。会议开始时,华国锋便向各小组

召集人打了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涉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面对高压气氛,陈云仍按会前写好的稿子,一字不落地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他说:“天安门事件”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尤其关心周总理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与此同时,王震等人在小组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陈云的发言稿很短,连同标点符号总共三百零几个字符。然而,会议简报组却秉承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意图,将它搞成“摘要”,删去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话,送陈云过目,要他点头。陈云看后问:“为什么要搞摘要?”对方答:“因为有些话同华主席讲话口径不一致。”陈云说:“要登就全文登,搞摘要不行。”结果,这个发言竟未能在简报上刊出。其他人的发言简报,凡有这两个内容的也都被删去。尽管如此,陈云等人的发言还是不胫而走。在叶剑英、李先念的促进下,华国锋在会

1977年7月31日,陈云在庆祝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招待会上

岗位。这为接下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证。

这时在党中央居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两个凡是”的方针,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还只能是在徘徊中前进。1977年8月,陈云出席了中共十一大。会后,陈云应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邀请,前去审查中共党史陈列。他边看边讲,澄清了许多重要问题。他看到解说词中仍有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字样,明确地说:这句话不要再提了,这是见之于文件的,是1946年1月17日停战令上的话。他还说道:林彪没有垮台前,四野很吃香,尾巴翘到天上。林彪垮台后,四野有点抬不起头来,其实,四野还不是关里派去的部队,还不是党的军队?林彪是林彪,四野是四野。1978年9月,有人致信陈云,说“文化大革命”中把30年代上海文艺界中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上纲上到革命与反革命的论争,把徐懋庸等人打成反革命,希望他能回忆一下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是怎么说的。陈云接到信后,很快给正在担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写了封信,证明毛主席确实讲过徐懋庸给鲁迅的信是错误的,但说他还可以教书,而且确实被安排到抗大当了教员;从来没有听毛主席说过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论争,也没有听毛主席说过国防文学是反革命口号。信中还建议中组部、中宣部对上海文艺界30年代问题,对创造社和当时其他革命文艺团体,作出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作这些评价时,必须把是非功过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

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阻力之所以大,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人仍然以“两个凡是”的方针做挡箭牌。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驳倒“两个凡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

1983年7月27日,陈云同胡乔木交谈

路线。早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邓小平就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他复出以后,又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不能够从个别词句来理解。为了驳斥“两个凡是”,也为了呼应邓小平,陈云借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机会,请胡乔木帮助他写了一篇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发表在1978年9月28日《人民日报》上。文章指出: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和发扬他倡导的党的优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不是一个普通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今天还有一些领导机关和一些党员干部,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有些文章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不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分析问题的指南。与此同时,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代革命家

也纷纷在报上发表文章。他们的文章,有力地支持了从同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华国锋主张抓经济这一点与“四人帮”不同。但在如何抓经济的问题上,却重复了过去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的急躁冒进错误。1978年2月,全国人大召开五届一次会议,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再次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就在

1978年,陈云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期间
与宋庆龄(左一)交谈

这次会上,华国锋不顾国民经济在十年动乱后急需休养生息的客观事实,贸然宣布要从1978年到1985年,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钢、原油和粮食产量分别达到6000万吨、2.5亿吨和8000万斤。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进一步提出了大规模的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资金的计划,从而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态。对于这种“左”的指导思想下的“洋跃进”,陈云以他多年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敏锐意识到其危险性,并通过李先念提出了不同意见。在这一年的7月,国务院

召开务虚会,研究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问题。陈云看了会议简报,向李先念等人提议,务虚会能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他说: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8年、10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还指出:“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往。”这些意见虽然难以被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央所接受,但它毕竟是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对正在兴起的“洋跃进”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国务院务虚会还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李先念在作总结讲话时,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命题。这一命题不仅同50年代陈云提出的“三个为主、三个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设想一脉相承,并且同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认真阅读马列著作、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而得出的结论有关。说明陈云这一思想的

1962年4月,陈云
同李先念谈话

一个材料是,李先念在1979年2月22日听取人民银行汇报时的谈话记录。他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当时,市场经济一词与市场调节是混用的,都是指计划经济下的市场调节。说明陈云关于这一思想的又一个材料是,邓力群在1979年8月27日为国家经委企业管理班讲话时的记录。他说:“李先念同志在今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而最能说明陈云这一思想的,还是他本人在1979年3月8日亲笔写的一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他写道:“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他的这份提纲披露后,给理论界和经济学界以很大的启发,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正式议题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只是在邓小平的建议下,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会议进入正式议题前,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

题。显然,按照这种安排,“两个凡是”的方针还是不能触及,“左”倾错误还是得不到纠正。而“左”倾错误不纠正,党的工作重点就不可能顺利转移,已经徘徊了两年的历史航船还会继续在迷雾中徘徊下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陈云又一次挺身而出。

会议开始后的第3天,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他先从工作重点转移谈起,说:这是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然后,他用“但是”作了个转折,说:安定团结也是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此有顾虑。华主席说,揭批“四人帮”的遗留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解决,但对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遗留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解决。接着,他举了6个例子,即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反省院履行过出狱手续,经审查恢复了党籍,以及受党派遣在敌伪政权中任过职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叛徒的问题;陶铸、王鹤寿等在抗战开始后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或被定为叛徒,或在结论中留有尾巴的问题;彭德怀没有被开除出党,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问题;天安门事件应予肯定的问题;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随便点名批判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对中央各部和各地党政机关瘫痪状态负有重大责任的问题。发言中还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的中央专案组问题,提出专案组应将党内的材料移交中组部,既有中组部又有中央专案组的不正常情况应该结束。

由于陈云发言中提出的问题触及到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一关键问题,也触及到了“两个凡是”方针的问题,说出了绝大多数与会代表憋在心里的话,

因此,在简报上全文刊出后,立即引起了热烈反响,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各个组纷纷表示赞成陈云的发言,并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先后研究了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决定为“天安门事件”以及薄一波等 61 人案、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平反,对康生、谢富治问题进行审理,撤销中央专案组并把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地方性重大事件一律由各地报经中央后自行处理。至此,“两个凡是”的方针在事实上已被否定,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会上,代表们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一致表示拥护,但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却很少论及。华国锋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仍坚持“国民经济持续跃进”的提法,相当多的干部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也缺少清醒

1982 年 9 月 23 日,陈云同黄克诚、王鹤寿在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

的认识。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临近结束时,作了第二次小组发言,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既积极又稳重的方针。他先从大家都已赞成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谈起,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然后,他讲了五点意见:第一,建国30年了,还有讨饭的,因此,今后三五年内,每年应进口两千万吨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稳住。第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否则欲速不达。第三,要给各省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第四,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留材料上的缺口。第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这实际是“风景出口”,比外贸出口来得快。其中1、2、4点涉及经济调整的问题,3、5两点涉及改革开放的问题。这些意见再一次引起了代表们的注意,也为会议所接受。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目前国民经济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我们必须在这几年认真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基本建设必须循序进行,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这些话等于宣布了“洋跃进”的结束,表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面也开始得到恢复。

由于代表们要说的话太多,所以会议结束时间一延再延,直至12月13日才召开闭幕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对会议作了总结,也在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主题报告。华国锋在讲话中根据代表们的要求,对“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表了态。他在讲话中还代表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了增补中央领导人的名单,提请三中全会通过。这

陈云同邓小平、王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主席台上

个名单是会议期间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由代表广泛酝酿后提出的。其中,陈云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关于陈云重新参加中央核心领导问题,邓小平早在党的十一大前后就多次提出过,但一直被华国锋拖着不办。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华国锋再也阻挡不住了。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选举后,陈云同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主席台上就座,并发表了即席的简短讲话。他说: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

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希望这一次大家要坚持下去,争取在全国实现这种局面,从而保证安定团结和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这些话反映了会议的真实情况,也反映了代表们的共同心愿。因此,其中的主要精神甚至连一些语言都被写进了全会公报。

此时陈云已是 73 岁高龄,但全党还是选择他加入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在这个领导集体中,他和邓小平同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正是由于这一特殊地位,决定了他在以后的岁月中,将再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

第十三章 再塑辉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于 1978 年 12 月 25 日召开会议，讨论新增选的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分工问题，决定陈云分管中央纪律检查和政法工作。1979 年 3 月，中央又决定由陈云出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从这时算起近两年时间，陈云把自己的精力主要用在了抓国民经济调整和几个重大历史案件的审理、平反以及党风党纪的整顿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了要改变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要求在今后几年切实做好综合平衡工作，但并没有来得及对此深入讨论。因此，会议原则同意的 1979 年、1980

年计划安排,仍然存在着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定得过高、物资缺口较大的问题。会后,陈云在审阅这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时批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不久,陈云又将一份反映计划有缺口的新华社内参批转中央常委,指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收到这份材料后批示:“请计委再作研究。”于是,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重新研究和调整 1979 年计划。为了能切实贯彻全会关于解决重大比例失调问题的精神,邓小平提议在国务院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请陈云主持,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对此,叶剑英、李先念积极支持,终于促成了这一机构的成立。财经委员会成立当天,陈云与李先念联名致信党中央,建议用两三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并指出: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

紧接着,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1979 年计划和

1979 年 6 月,陈云在上海调查解决
宝钢建设中的问题

经济调整问题。陈云作了讲话,论述了调整的实质、目的和意义。他说: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先进和落后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存在相当长时期,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到2000年,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他还说:搞建设,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他在讲话中特别讲到钢的生产指标问题,他说:单纯突出钢,过去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冶金部想要多搞,可以理解,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哪有这回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规划在1985年搞到6000万吨,根本做不到。我不光看

你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品种要全。在讲话最后，他说自己体力不行，经验有限，也有反面教训，比如三门峡工程就不成功。因此，当国务院财经委主任是有问题的，要我做工作，只能做我认为必要的工作，量力而行。会议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在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将这次调整的方针进一步确定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要压缩基建规模，砍一批基建项目，首先遇到的困难是，一些大项目特别是像宝山钢铁厂那样的特大项目怎么办？宝钢是计划由日本引进成套设备的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钢铁企业，1978年12月已同日本签订了价值13亿美元的总协议书，并且已于同年12月底破土动工。宝钢工程是“上”还是“下”，是干到底还是半途而废，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由于事关国家重大经济利益和国际声望，在李先念的建议下，中央委托陈云决策。陈云受命后，从1979年5月中旬起，对宝钢问题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并于5月31日亲赴上海考察，听取上海市负责同志的意见。意见考虑成熟后，他于6月16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宝钢建设问题。会上，他提出了8点意见，总的精神是不要再举棋不定了，要干到底；既然干，就要干好，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掉；要买设备，也要买技术，买专利；要提前练兵，对焦炭灰分含量和铁矿粉含硫量的问题要及早研究。会后，中央批准了根据陈云意见制定的宝钢建设方案。1986年5月18日，陈云在宝钢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一年之际，亲赴宝钢，视察了炼钢厂、原料码头、焦化厂、炼铁厂和初轧厂，还为宝钢题词：“埋头实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调整初期，各级领导思想认识不统一，所以在执行调整方

针上行动迟缓,步调不一致,以至于对 1979 年计划尽管作了较大调整,但到年底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降下来,相反财政收支逆差 170 亿元,出现建国以来最大的赤字。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在 1979 年 9 月和 10 月先后召开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年度计划汇报会和中共中央各省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说: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基本建设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年年用发票子的办法来搞基建,到一定时候就会“爆炸”。在生产上搞一点赤字不可怕,但基建周期长,搞赤字我是怕的。现在谁也不反对借外债,但对所借外债要分析,其中买方借款占绝大多数,自由外汇很少,而且利息很高。每年能够使用多少买方贷款,不决定于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国内能拿出多少为它配套的投资数量。在汇报会上的讲话中,他还根据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两个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观点:一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要在现有基础上引进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二是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发展,但要求不要再折腾,我们应当探索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实现较快的发展速度。

就在 10 月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后,陈云被发现患有结肠癌。手术进行得很成功,但年纪毕竟老了,术后恢复比较慢,加之当时党内有更紧迫的问题要解决,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再具体过问调整问题。那次会议前,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曾任命他为副总理,并决定他不再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个安排显然是希望他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财经工作上。但

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也由于找到了更年轻的同志主持全国经济工作,中央于1980年成立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同时决定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从而使他摆脱了经济第一线的工作。那年基本建设投资定为241亿元,比上年减少110亿元。但实际执行中却再次大大超过,到年底,财政赤字仍为100多亿元,还多发了70亿票子,使物价继续上涨。情况表明,要想切实贯彻调整方针,使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清理急于求成的思想根源。

为此,陈云在1980年11月国务院向中央常委、书记处汇报调整1981年计划的会上指出:三年之内不要增加基建开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他针对有人说这样耽误了时间,明确回答: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再“耽误”三年有什么了不得。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那就再“机会主义”一次吧。他说: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邓小平表示赞成陈云的意见,说这次三年能缓过气来就不错。速度5%保持不住,4%也行。陈云插话说:4%并不丢脸,并不简单。在这次会上,1981年的发展速度定为3.7%,基建投资由原定的500亿元减为300亿元。

过了一个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在会议开始时,就经济形势和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问题发表了讲话。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当时正在实施的改革开放新举措,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处理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防止因头脑发热而出现盲目性,妨碍调整的进行。他说: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重要的政策措施,但要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卖的有些机器看起来似乎利润低,但把另一些机器和费用合起来计算,绝不会低于平均利润率,否则

为什么不把钱存在银行稳拿利息呢？我们有些干部很天真，所以要敲敲警钟，提醒他们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有警惕。他还说：经济体制改革出现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农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但他同时指出：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如各地盲目的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忽略必要的国家干预，该补贴的不补贴，该集中的没集中。他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在进行上述分析之后，他作出了一个关系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根本问题的著名论断：“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

对于陈云的讲话，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说：“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 31 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长期的指导方针。”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在经济工作中摆脱“左”的思想影响的转折点，为全面推进经济调整起了重大作用。到了 1981 年底，农轻重的比例基本趋于合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财政收支大体做到了平衡，物价也恢复了稳定。事实证明，这次调整不仅为 80 年代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基础，也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陈云重新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后，着重抓的第二件大事是解决若干在党内外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整顿

党风。中纪委刚一成立,便在陈云指导下,着手对刘少奇冤案和康生、谢富治案件进行审理。经过大量调查和核实取证,推翻了“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的罪名,为刘少奇彻底平了反;查明了康生、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参预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严重罪行,开除了他们的党籍。1980年5月17日,陈云由杭州休养回京的第二天,便出席了刘少奇追悼大会。在此之前,陈云还出席了中央先后为陶铸、彭德怀、张闻天举办的追悼会。根据陈云的指示,中纪委还通过大量调查,为

1980年5月17日,陈云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
向王光美表示慰问

瞿秋白、潘汉年的冤案平了反。1979年10月,陈云在做结肠癌手术前,时任中央副秘书长的姚依林问他有什么交待,他只说了潘案需要重新复查一事,并就此事给胡耀邦写了短信。出院后,陈云又就此事致信中央常委,建议中央对潘案正式复查,并交中纪委办理。第二年,中央发出了为潘汉年昭雪、恢复名义的通知。陈云不仅关注党内的历史遗留问题,而且十分关

心党外人士的冤假错案。例如,他于1979年6月将一份反映马寅初先生因人口论问题而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材料批转胡耀邦,明确指出:“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在中央的关怀下,北京市委和教育部先后为马寅初平了反,并任命他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

中纪委建立后,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同志向陈云请示工作方针问题,陈云当即回答:“抓党风。中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以后,当中纪委负责人问他对一次会议有何指示时,他又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起初,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陈云所说的整顿党风,主要指的是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党内民主的作风。有一次,他审阅一份报告稿,看到上面说“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民主集中制被破坏,民主生活很不够。他让秘书转告起草人: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他又讲:中纪委的基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也就是要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了从制度上保证这种局面得以巩固,陈云还指导中纪委草拟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要使党内生活正常化,不仅要为过去的冤假错案平反,而且要妥善处理犯错误同志和制造过冤假错案的人的问题。在这方面,陈云的所作所为,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例如,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有四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粉碎“四人帮”头两年犯严重错误的政治局委员提出辞职。陈云在会上一方面表示赞成他们辞职,提醒他们不要觉得委屈了,应该想一想,

是否可以不犯那样的错误；另一方面又提出，对犯错误同志要全面看，不仅看他犯了什么错误，也要看到他做过什么好事，还要看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不要揪住不放。还有一件事是，中央为了处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成立了有中纪委、中组部、高检院、高法院等部门人员组成的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他们在工作中碰到对一些跟着林彪、“四人帮”跑过的人如何处理的问题。对此，陈云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外，对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应该是使今后若干代的共产党人从中取得教训，从而对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由于他的这个意见，解脱了一大批人。即使对这两个集团里的人，他也提出林彪集团中的人过去有战功，在处理上要同江青集团有所区别，对年老有病的要保外就医；对江青集团的主犯，他同意判重刑，但反对用极刑，说如果开了杀戒，对后代不好交待。这些意见，对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民主集中制的逐步恢复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问题的日益突出，陈云抓党风的侧重点逐渐转移。1982年1月5日，他看到一份反映广东沿海地区走私猖獗、涉及一些党员干部的信访简报，引起他高度重视。他当即批转给其他中央常委，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并在他的批示旁加了几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在他们的推动下，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开展起来，震慑了党内少数以权谋私分子，保证了改革开放的健康进行。为了解决好以权谋私的问

题,他反复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要充分注意和防范改革开放带来的消极现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维护思想工作部门的权威。他还针对相当一部分错误汲取“文化大革命”教训,遇到问题绕着走,或“和稀泥”或做老好人的问题指出:“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高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为天安门事件及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平了反,这对于清除个人迷信,解放思想,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一些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人,却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搞自发集会,在街头贴大字报,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进而散布怀疑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潮。党内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支持。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态: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但他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又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分的道理。以后,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进一步倡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邓小平的这些主张,陈云不仅完全赞成,而且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例如,他对起草《决议》的人提出:决议要体现小平同志的意图,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60年中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决议》中

增加了回顾建国以前 28 年历史的段落。为了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陈云还针对一些报刊宣传中存在的片面性问题,结合当时发生的波兰事件,提醒大家注意,要把经济问题、宣传问题处理好。

党的政治路线从来需要组织路线的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问题,组织路线问题很自然地突出出来。一开始,陈云想到的还只是中央一级的干部,就是说,要找一些能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而且年龄上具有一定优势的干部,来顶替那些推行“两个凡是”方针的人,同时准备接老一代革命家的班。为此,他先在三中全会上表示应当成立中央书记处,承担起中央日常工作。会后,他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积极推动此事的进展,并认真酝酿人选。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上,他还提出要找几个四五十岁的干部来当“后排议员”的思想,让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书记处,他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从中央到县委各级都要主动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这些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他说:这个事情非常紧迫,再等下去就没有时间了。后来,由于存在各种思想阻力,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进展迟缓。陈云越想越觉得这个问题大,便于 1981 年 5 月在杭州休养期间,亲笔写了一份意见书,指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不警惕干部青黄不接的状况,在老干部陆续病倒、病死时,被迫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另一种是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让他们在领导岗位上锻炼,同时由老干部传帮带。在这份意见书中,陈云还提出了有关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几个具体措施,一是中组部要成

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二是各级组织都要设立辅助机构和辅助人员，如研究室、书记助理等；三是老干部退居二、三线后，在政治、物质待遇上要给予保证和优待。邓小平看过意见书说：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处理好。为此，陈云回到北京后，又召集中组部和总政治部的负责人开会，形成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不久，他的这份意见书和座谈会纪要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印发。会后，中央留下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开了3天会，专门讨论这两个文件。陈云对有关问题作了说明和阐述，邓小平则表示完全赞成，他说：我和陈云交过心的，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退实在心里非常愉快。但现在还不能退，除了要过问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以外，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这是最大的事情。

在这次会上，陈云一方面提出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成千

1981年6月27日，陈云同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一起

1982年9月6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

上万,一两百人不够用;另一方面,提出对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不能提。他说:对这些人不能只看现在一时表现好,他要爬上来,只能表现好,但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分子。他还着重指出: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此后,他把自己有关这个问题的观点作了进一步概括,并在中共十二大大会发言中,进行了集中阐述。他说:对提拔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的问题要讲两句话,一句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一句是一个也不能提拔。所谓一个不能提拔,指的就是“三种人”,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仅不能提拔,而且对已经进入领导班子的必须坚决清除出去。就在这次大会上,陈云第7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1982年8月14日,陈云同邓小平、李先念

在陈云家中谈话

除了革命化、年轻化、制度化外,陈云对新时期干部工作的方针还提出了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就提出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在杭州写的那份意见书中,他写道:“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在他的建议下,中组部向中央作出了加强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报告。

陈云不仅大声疾呼要对年轻干部大胆提拔,而且十分重视对他们的培养。他在1983年6月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建立党的第三梯队的思想,说老同志要真心诚意地帮助、

培养年轻干部,主动地给他们让位,“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一程”。每个同志在见马克思之前,都要努力把这件事办好,否则要负历史的责任。对年轻干部,他提出了许多殷切的希望,其中讲得最多的是两条:一是要加强学习,特别是学习哲学;二是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

中共十二大以后,随着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状况的逐步扭转,改革的重点由农村逐步转向城市,改革的步伐也逐步加快。对于改革,陈云从始至终抱有极大的热情。早在1981年9月的工作会议上,陈云就称赞正在搞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打破了“大锅饭”,其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专题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通过了有关的决定。他在大会发言中对3年前说过的那句话作了说明,他说: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要消灭剥削,正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要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上也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打破它将会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积极性,使我国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他同时指出:由于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因此态度要积极,步骤要稳妥。他在1981年说过,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工业、财贸也势在必行,但工业、财贸的内部关系、外部关系都要比农业复杂,因此要经过试点,逐步推开。

对于改革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东西,陈云也一直非常重视,经常提醒全党注意。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着重讲了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路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陈云着重讲了清理“三种人”和整顿党风、防止改革开放中消极后

果的问题。他指出：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这些人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经过教育不改的人，要调动他们的工作。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他表示赞成在关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一下“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和违法行为”的话，说对这些现象不必大惊小怪，但如果不注意，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陈云在大会上发言，强调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有些人，包括一些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投机诈骗，贪污受贿，非法致富，不顾国格人格。这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

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陈云写出《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后，并没有间断他的思考。1981年底，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又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纵观他在此前后的发言、批示、信件，不难看出他所说的这个计划经济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完全不同的。1982年底

1985年9月23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会上讲话

1982年12月2日,陈云同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在一起。握手者为沈鸿,右二为胡立教,右三为荣毅仁

的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期间,上海代表团部分同志去他家中与他座谈。他在谈话中着重讲了搞活经济与宏观控制的关系问题,并借用鸟和笼子的关系打比喻说:鸟不能捏在手里,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笼子就是国家计划。“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计划进行修改。但总要有个“笼子”。为什么一定要有个“笼子”呢?他在另一处讲话中说得很明白:“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

陈云在关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仍然没有忽略经济建设本身的问题。为了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二大确定在本世纪末力争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任务,并

在陈云的建议下,将这个战略分为两步走,即前10年打好基础,后10年进入经济振兴时期。但十二大开过之后,一些地方和部门急于求成的旧病复发,纷纷提出提前翻番的计划,不顾国家统一计划,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在和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时指出:“六五”计划是前10年的第一个5年,发展速度不能太快,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10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10年来办,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他还指出,为了给后10年比较快的发展创造条件,要由中央适当集中资金,加强能源、交通、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建设。1983年6月,鉴于一些地方乱发奖金、乱摊派,使资金过于分散,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太低,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办法。陈云在讲话中重申了他在两年前提出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他还幽默地对各省负责人说:现在中央手里的钱,除去行政、科研、文教、国防经费外,剩下的可以说办不了什么大事,所以有劳在座的各路诸侯跑一趟,把口袋里的钱再拿一些出来,支援重点建设。他特别关注农业问题,认为这也是重点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逐年大幅度增加,有些人出现了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过关了,农业不用再管了,农民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反复强调,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再减少,10亿人口吃饭穿衣是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对于金融问题,陈云也非常重视。1985年,他针对货币发行失控导致物价上涨的情况指出:钞票发行必须由总理或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不能由银行行长决定。

那时,有些人看到国家外汇储备 120 亿美元,认为太多了,提出要进口家用电器。陈云说:我们是个大国,从长远看,这点儿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由于年纪的原因,陈云对经济工作不可能再像过去抓得那么细了。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思考一些诸如资源、环境、人口等等有关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早在 1979 年 6 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不久,陈云就致信李先念、姚依林,提出水资源和工业污染是两个必须尽早注意的问题。同年 6 月,陈云赴上海考察宝钢问题时,在与当时上海部分负责人的谈话中专门谈到控制人口问题,提出了五条措施:一是大造舆论,造三五年的舆论;二是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三是加强避孕药物的研制、发放和相应的医疗工作;四是对独生子女实行优待政策,如在招工时先安排

等;五是实行社会保险,解决“养儿防老”问题。后来,陈云在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的复信中进一步指出: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在陈云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国务院 1980 年 9 月发出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党员、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大家带头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4 年 3 月 3 日,陈云
用显微镜观看集成电
路。左一为江泽民

1983 年 6 月,陈云在中央工

作会议讲话中谈到什么是建设重点时,除了农业、能源、交通、一批骨干企业外,还点到科学教育事业和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陈云一向重视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1984年3月,他约请当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和该部几位技术人员去他家,向他汇报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生产的情况,演示微机处理机的操作。他饶有兴趣地通过显微镜观看了集成电路的样品,并在谈话中指出:现在国内外都在议论,认为世界上即将出现新的技术革命,而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是这场革命的两个代表。从科技发展的角度看,这些说法有些道理。我国由于起步晚,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大,因此一定要像当年搞原子弹、氢弹那样,把电子工业搞上去,使电子技术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见到大成效。要发展技术,离不开知识分子,而80年代初,由于工资制度没有改革,中年知识分子工资收入低,生活、工作负担重,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陈云看到反映这个问题的材料,认为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立即批给中央常委,指出: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500多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亿元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日本、西德在战后所以恢复得那么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存了一批骨干,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因此,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在他和其他老一代革命家的关心下,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使一部分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条件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在教育方面,陈云关心比较多的是中小学教育。1981年春节,他出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首都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育工作者座谈会,勉励大家从关心祖国和世界前程的角

1983 年 8 月 4 日,陈云为少先队夏令营
活动点燃火炬

度做好少年儿童工作。1982 年 5 月,他在《人民日报》第八版上看到一篇反映少年儿童看戏难的文章,立即给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写信,建议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全国所有影剧院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礼堂都免费向孩子们开放。1983 年 1 月,他收到一位政协委员关于建议将民办教师一律改为公办、小学和初中实行义务教育、增加财政中的教育经费的来信,立即批转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认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很有远见,希望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提出方案。同年 8 月,团中央组织了一个“快乐的小队活动”夏令营,希望陈云能会见全体营员,为他们点燃夏令营的火炬。陈云愉快地答应了这一要求,并在中南海怀仁堂与大家亲切会面。1984 年 9 月,当他得知报考师范院校的毕业生越来越少时,指示有关领导,要重视老师待遇问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不久,

他又批示：要使中小学老师的工资标准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1986年春节，陈云把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请到自己家中做客，说中小学生学习将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同中小学教育有密切关系。他要求党和政府各级组织都要关心教师的工作和生活。

为了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陈云还着重抓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整理古籍。他指出，在继续办好理工科的同时，应加强大学文科教育；即使学理工科的也要有一定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知识；要从小学开始读点古文。因此，他主张，整理古籍不仅要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要有今译，做到多数人都能看懂。为了把这件事做好，他于1981年4月提出在国务院里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工作依托高等院校、由国家拨专项经费等7条意见。陈云抓的另一件事是对青少年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教育。他在1981年提出，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此要抓好青年人学历史的事，要一直抓下去。为了做出示范，他抓住《辽沈决战》一书的编辑方针和方法问题，谈了8次话，还提议组织了一个由老同志组成的编审小组。他指出，编这本书，不仅应该使读者了解战役的经过，而且应使读者知道取得胜利的多方面的

1984年12月24日，陈云在北京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中为薄一波、钱其琛

原因,从而起到教育下一代的作用。

作为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密切关注着国际关系,关心着祖国统一大业。1984年12月,曾在50年代担任过苏联在华专家组组长、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阿尔希波夫来华访问。陈云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南海接见了,向他传递了中方愿意改善和发展关系的重要信息。1983年12月,陈云还会见了一位来往于海峡两岸、向国共双方传递消息的人士。陈云对他说:我们两边吵架,但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将来我们老一辈不在了,接我们班的人仍然会坚持这个立场,但他们那边的老人不在时,接他们班的人是否会坚持、能否坚持住就很难说,因此要早做打算,先把国家统一起来。世界上并不是所有国家的人都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有人把台湾看成是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到时候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因此要提高警惕,采取防范措施。1983年5月,陈云在杭州休养,廖承志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前来汇报有关讨论收回香港主权问题的情况。陈云表示:“港人治港、50年不变”的政策很好,有了这一条,人心大定。他还指出:香港主权收回后,要尽量用当地人管理,包括用一些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

陈云不仅时刻关心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且也时刻关心着群众的生活问题和与群众利益有关的各种社会问题。例如,1982年10月,当霜降已过,即将立冬之时,陈云写信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提醒他们指示有关部门,做好北京冬贮大白菜工作,以避免烂菜。1983年1月,陈云看到《北京日报》社刊载群众来信,反映“烧煤难”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当即批转国务院领导同志,请他向北京市打个招呼,要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大龄青年未婚是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带

《陈云文选》1—3 卷版本

来的一个较严重的社会问题,陈云将有关材料批转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建议书记处议一下,并指定一个部门专门抓这项工作。

陈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和建国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大量著述,为了使它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充分发挥作用,中共中央书记处于 1983 年决定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名义编辑出版《陈云文选》。在文选的编辑过程中,陈云逐篇审阅了文稿。他指出,编他的文选,一定要保持历史原貌,要把它们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编建国后至 1956 年这一卷时,他还特别叮嘱编辑部门,在后记中要说明,他在中财委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他做了必要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许多重大决策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因此,大家在阅读时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他一个人账上。1984 年 2 月、7 月和 1986 年 6 月,《陈云文选》第一、二、三卷先后出版发行。这三卷文选,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和观点,是他向党和人民贡献出的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第十四章 鞠躬尽瘁

1986年10月，陈云与邓小平、李先念共同商定，为了党的事业的需要，在召开中共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但事过两

1986年10月30日，陈云同邓小平、李先念在一起

月，合肥、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出现学潮，引起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忧虑。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认为学潮的性质是很重大的事件，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胡耀邦对此负有重要责任，所以在翌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意接受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陈云出席了这次会

议并讲了话。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调查研究是书记处工作的重要方法，但调查研究不是 100 多个部一个一个在书记处会上汇报，也不是一个星期跑 22 个县，那种工作方法太简单。第二，党内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分开来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第三，五湖四海加上德才兼备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开拓型干部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

为了在老一代革命家退居二线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能够保持党的路线、方针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陈云就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这两个问题，于 7 月份同赵紫阳谈了一次话。陈云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国家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但他今年已经 84 岁了。过不了多少年，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为什么我把你们的担子看得这么重？因为，第一，我们国家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第二，我们国家是 10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在世界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才能把党和国家领导好呢？陈云认为，最要紧的是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次谈话后不久，中共召开十三大，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邓小平仍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而陈云则担任了原来由邓小平担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从 1984 年下半年开始，经济中出现了过热问题，1985 年至 1988 年，通货膨胀更呈明显加剧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仍于 1988 年夏季北戴河会议上原则通过了大步进行

价格改革的方案,导致全国性的抢购风潮。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会后不久,陈云再次同赵紫阳谈话,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小。在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要随时总结经验。然后,他对当时的经济工作提出了 8 点意见:第一,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第二,种田必须养地;承包工交企业必须确保设备完好率。对工农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掠夺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第三,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第四,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要平衡。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还是要一支笔。第五,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不应全部照搬,也不能一概否定。第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幅度,不能过高过快。第七,对储蓄搞保值是必要的,国库券也要保值。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第八,克服当前财政经济的困难,必须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作用。

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引起群众的不满,治理整顿中的暂时困难也使人们发生了某些误解和忧虑。党内外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这种形势,从 1988 年末到 1989 年初,陆续在若干大城市举行意在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集会、上书等活动。1989 年 4 月胡耀邦的病逝,进一步给这些人提供了策动大规模动乱的机会。他们散布谣言,煽动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聚众冲击中南海,占领天安门广场,举行非法游行。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发表“4·25”重要讲话,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

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但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却采取纵容和支持动乱的态度，使中央出现了两种声音。正在杭州休养的陈云，提前于5月7日返回北京，站在邓小平和中央常委多数同志一边，反对动乱。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宣布从外地调入部分解放军部队，以恢复首都正常秩序。赵紫阳拒绝出席，表明他同党的公开分裂。次日，陈云前往邓小平家中参加会议。23日，他把李先念、彭真、王震等老同志请到自己家中谈话。26日，他又主持召开了中顾委常委会议，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所作的正确决策。他说：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

1989年5月26日，陈云主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这条消息于第二天的各大报纸上刊登,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极少数非法组织的头头执迷不悟,阻挡戒严部队,焚烧军车,杀害解放军指战员,甚至妄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6月4日,戒严部队一举平息了北京的反革命暴乱,其他大中城市的秩序也很快得到了恢复。在此基础上,中共于6月下旬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鉴于赵紫阳的严重错误,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并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会后,陈云接连同江泽民等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谈话,对他们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他结合当时苏东局势的变化,深刻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突出出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他还致信中顾委负责同志,重提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议,指出这样做是为了带动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哲学。1990年1月,他在杭州休养期间,将事先题写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条幅赠送给前来拜年的浙江省委负责人,详细解释了这十五个字。在谈话中,他提出搞调查研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率工作组下乡下厂,另一

陈云 1989 年
书写的条幅

种是通过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常听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他说,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种办法比前一种更重要一些。

“八九风波”平息之后,在发生动乱和暴乱的地方,进行了党内的清查清理工作和党员重新登记。为了教育和团结犯错误的党员,也为了进一步稳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于1990年5月致信中顾委常委,指出:这场风波是建党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政治事件,也是我们党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声音,加上中央有些报纸进行了错误宣传,使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应该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来处理。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检讨了,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表示本人现在对错误的认识程度,就是记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他的这封信对于保证清查清理和党员登记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云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他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爱护,发现什么问题,总是从旁提醒。1990年4月,他看到几份有关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材料,即致信江泽民注意此事。信中说:“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现在是中央应该切切实实地抓一抓这件大事的时候了。在这方面必须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6月,他又将水利专家张光斗给他的信及张光斗等人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文批转江泽民、李鹏和国家科委主任宋健。

1992年11月16日,陈云在上海同江泽民交谈

批语中指出:“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此前,陈云还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写的《“卫星看不见的城市”——本溪市环境污染情况调查》、《四川排放污物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这两份材料批给李鹏、姚依林,并附信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1990年6月,陈云还就取消财政补贴等问题同江泽民谈话,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国策。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他的这些意见,都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使改革开放

市的党政领导每逢春节都要到陈云住地向他拜年。他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上海的发展情况,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发表意见。1994年春节,陈云在会见上海市领导时首先肯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说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后,他指出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接着,他表示赞成中央关于从当年起实行分税制的决定,说这样可以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另外,他又提出:“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最后,他充满深情地说:“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的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陈云的这番话在《陈云文选》再版时,被作为封卷篇收了进去,从而成为他留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遗言。

在离休以后,陈云坚持锻炼身体、练习书法和欣赏评弹,生活过得既宁静又充实。欣赏评弹是陈云从小培养起来的爱好,但自参加革命以后便放弃了。1958年,由于心脏病发作,为静心养病,遵照医嘱,他又开始听起评弹。那时,苏联领导人给每个中共中央的常委送了一台老式的录音机,他就用这个录音机听。后来,周恩来把自己那台也送给了他。他利用休养和公余时间,听了大量评弹节目,广泛接触了评弹艺人、创作人员和曲艺界的领导干部,并以他一贯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

作风,对评弹艺术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谈话、书信等形式,就继承与发展、思想性与娱乐性、普及与提高等带普遍性的问题,提出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被评弹界公认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80年代初,评弹界将他的谈话和通信进行整理编辑,正式出版,不仅推动了评弹的创作、演出和人才培养,也使其他文艺门类深受启发。特别是他提出的“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方针,照亮了整个曲艺界在新的历史时期前进的方向。

1979年2月,陈云
在放评弹录音

陈云一生清正廉洁,对自己要求很严。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出“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大力倡导言行一致的作风。他向来公私分明,一点小事也不放过。他给自己立了个不收礼的规矩,并要求工作人员,凡是有人来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有一回,陈云家乡送来一份精美的文房四宝,请他为准备开办但还没有正式批准的一家公司题词。陈云听了很不高兴,说这个词不能题,一题词,就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了。他让人将送

1989年4月,陈云
在写毛笔字

来的文房四宝如数退回，并嘱咐秘书向上海市委通报这件事。他吃饭十分简单，早餐是面包果酱、豆浆；午餐晚餐是一荤一素一汤，逢年过节也不例外。有一次到外地，当地接待部门为他准备了一桌酒席，他看到后，很不高兴，坚决要求他们撤掉，直到换上平日的一荤一素才肯吃饭。他穿的衬衣都是补了又补，一件坎肩，穿了40多年。他用东西也很节约，一个皮箱，是延安时期的，直到1994年还在用。他有一个刮胡刀，刀架是1935年由上海去苏联之前买的，3个刀片用了10年，而刀架一直用到他逝世之前。

陈云谦虚谨慎，淡泊名利。1951年，苏联政府送给中共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每人一辆“吉斯”牌高级防弹车。一天，陈云发现自己原来的车被换成了“吉斯”车，坚决要求换回来，说他不能同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和朱总司令一样待遇。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他们5位书记按规定应一律定为1级，但他却要有关部门把自己定为2级。他不愿意参加各种可以不参加的接见活动和外事活动，不同意对他个人的各种宣传。有关宣传他的文章，只要报到他那里审核，都要被他“枪毙”。他平时去外地，向来不准当地领导人迎送，也不让老朋友老部下到他家中做礼节性的拜访。用他的话说，叫做“不接不送”，“不请不到”。

陈云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有一个很好的家风。1949年，老家刚刚解放，他即给家乡一位老战友的儿子回信，提醒他和自己的表弟千万不要以功臣子弟自居。他说：“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洁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陈云的二女儿“文化大革命”中在农村当小学老师，几次提出想调回

城里,陈云始终未答应。恢复高考后,陈云对她说:“国家需要教师,你报考师范吧。”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了

50年代,陈云同全家人合影

国家机关,但在陈云的鼓励下,又回到了教师的岗位上,至今已有十几个年头。

1994年5月,陈云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在住院期间,陈云仍关注着国家大事。11月,他从新闻广播中听到中央号召为贫困地区捐赠衣被的消息,马上让于若木去办。全家除捐赠了几十件衣服外,还特意以陈云的名义捐赠了一条崭新的丝绵被子和床单。1995年春节,他的病情还比较稳定,精神也比较好。江泽民和李鹏分别来病房给他拜年,几句问候话后,就谈起形势与工作。陈云听得很认真,也很高兴。这时,他说话已经很吃力了,但还是伸出大拇指,说了一句“谢谢你们”。这句话,表达了他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极大信赖和深厚重托。

1995年4月10日下午2时零4分,陈云在同疾病顽强

首都各界群众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灵堂向陈云遗体沉痛告别

斗争了 321 天后,终因年事太高,各种脏器功能均已衰竭而不幸与世长辞。陈云的逝世,使全党、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4 月 12 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布了讣告,赞扬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指出他的一生是为中国各族人民彻底解放、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顽强奋斗的光辉的一生,他在 70 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讣告中还说,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4 月 17 日,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医院沉痛送别陈云。李鹏、朱

《陈云文选》(1—3卷)《陈云》画册出版暨纪念
陈云同志诞辰 90 周年座谈会会场

镕基、胡锦涛等陪同陈云亲属,护送陈云遗体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在灵车前往八宝山的路上,许多群众自发聚集在街道两侧,肃立致敬。数千干部、群众前往八宝山向陈云遗体告别。当天,陈云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一棵年幼的雪松之下。

凡是以自己毕生精力和卓越才智投身于伟大历史创造活动的杰出人物,他们的逝世留给历史和人民的都不会仅仅是悲痛。6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陈云文选》一至三卷、《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的全国各地专家学者,陈云生前的老战友、老部下及亲属200多人出席了座谈会。江泽民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陈云同志的业绩和著作,他的思想、品德和风格,属于我们伟大的党、国家和民族。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江泽民号

召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陈云同志的著作,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陈云的业绩和精神万古常青!